理解日本政府在维和议题上的“去安全化”行为

——以退出在南苏丹的维和部队为例

刘青尧

内容提要　自 1992 年至今,日本参与联合国主导的维和行动已历经 25 年。2017 年,日本政府决定撤回其部署在南苏丹的维和部队,并解释撤兵是由于该部队完成了在南苏丹的维和任务,同时相对淡化南苏丹恶劣的安全环境。加之“瞒报门”事件的发生,日本政府在维和议题上采取了一定程度的去安全化行为。本文以(去)安全化为理论视角,通过日本参与联合国在南苏丹开展维和行动的案例,具体分析了促成日本政府采取去安全化行为的条件。其中,非洲国家动荡的安全环境是去安全化行为产生的特定背景;日本政府在国内面临的舆论困境、日本与中国在维和行动中所处的竞争劣势,为日本在维和议题上采取去安全化行为提供了动力。

关键词　日本维和　去安全化　安全化

自 1992 年至今,日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已有 25 年。在联合国主导的维和行动中,非洲是重点地区。当前,联合国在非洲共部署 7 个维和特派团。[①] 其中,日本于 2012 年 1 月向南苏丹派遣一支自卫队工程部队以执行联合国在当地部署的维和任务——负责协助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是日本首次向非洲地区派遣本国参与维和的部队。然而,自 2017 年 4 月起,这支维和部队陆续从南苏丹撤退。从客观环境看,南苏丹国内的安全形势持续恶化,给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开展造成阻碍。2013 年底,南苏丹再次陷入内战。2016 年 7 月,首都朱巴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伤亡人数众多。外界认为,南苏丹恶劣的安全环境是导致日本采取撤回行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南苏丹的内战使得维和特派团将更多的重心放在保护平民上,同时,维和人员自身面临的风险有所增加,这最终导致日本在 2017 年上半年撤回其部署的自卫队工程部队。[②] 然而,日本政府的解释是强调本国部队已完成在南苏丹的维和任务,淡化南苏丹不稳定的安全环境所带来的影响。因而,日本政府在维和议题上采取了一定程度的“去安全化”行为。

事实上,基于 2016 年开始实行的新安保法案,日本政府并不需要回避安全形势的问题。至于日本政府为什么会采取这一行为,本文将以(去)安全化为理论视角,通过日本参与联合国在南苏丹开展维和行动的案例, 分析促使日本政府在维和议题上采取一定程度 “去安全化”行为的必要条件。

一、安全议程的取舍:国家的(去)安全化行为

在安全议程的设置上,(去) 安全化已成为不可或缺的动态过程。巴里·布赞(Barry Buzan)与奥利·维夫(Ole Waever)提出:“把某种东西叫做安全问题或威胁,这个行为本身就已经改变了这个问题,并因此开始进入了安全化的政治进程,独特的安全态势由此启动。”[③]

由此,安全化(securitization)被界定为一种“言语行为”(speech act),是一个“由发言人和听众通过群体共识一起构建出某问题属于安全问题的认识的过程。当听众接受了这一安全化行为时,这一问题就被安全化了”。[④] 去安全化(desecuritization)则与安全化相生相伴。去安全化就是“把问题由紧急事件模式转变到政治领域的一般性商谈的过程”。[⑤] 布赞和维夫指出,“行为体不再把彼此作为安全问题来对待,并开始作为朋友行事。它们仍然竞争,并时而感受到挑战,但是,它们会把这些作为常态的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问题来处理,而不是作为安全事务来解决”。[⑥] 也就是说,在哥本哈根学派看来,安全化与去安全化是两个相对的过程。不过,哥本哈根学派所描述的去安全化过程实质上是去安全化后的一种结果,即某一议题不再属于安全领域的范畴。

相反,巴黎学派强调去安全化并非是与安全化相对的过程,去安全化未必代表不安全感的减少。这一学派用两个因素来解释(不)安全概念的重塑:第一,通过可靠的话语或不同的保护技术, 去安全化并不总是减少不安全或增加政治方面的信心。安全不是不安全的对立面。第二,专业安全网络机构的出现与巩固通过权力与知识的关系垄断了有关危险与不安的真实情况。[⑦] 在该学派核心代表人物迪迪尔·彼戈(Didier Bigo)看来,安全与不安全共生。去安全化并不意味着不安全的减少,不安全是“安全化进程的结果,更准确地说是(不)安全化进程的结果”。[⑧] 虽然巴黎学派一针见血地指出安全与不安全并非对立,而是共生,但是,这并不足以否认安全化与去安全化不是两个相对的过程。作为(去)安全化的结果,安全可能与不安全共存,然而就(去)安全化行为本身而言,安全化与去安全化是两个朝向相反的过程。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去)安全化是一个动态过程,这意味着某一议题中所包含的安全属性在增加或递减。在去安全化的行为中,一个安全问题的强度会被降低。例如,在印度看来是“恐怖分子”制造的恐怖袭击,但在巴基斯坦看来这些人可能是“自由战士”。这种对同一种现象的不同认知实际上就体现了安全化与去安全化的两种行为。行为体采取安全化行为的程度越深,所涉议题距离安全领域就越近;反之,行为体采取去安全化行为的程度越深,所涉议题距离安全领域就越远。

在有关(去)安全化的具体研究中,乔治斯·卡里奥提斯(Georgios Karyotis)与斯特拉托斯·帕里基欧斯(Stratos Patrikios)将安全化研究涉及的核心问题归纳为以下四个:第一,谁(who)能成功地“制造”(do)安全或“提及”(speak)安全? 第二,关于什么问题(what issues)? 第三,在何种条件(what conditions)下?第四,产生何种效应(what effects)?[⑨] 简要概括就是“4W”问题。相似地,分析行为体的去安全化行为至少应包含以下几点:第一,“淡化”或“规避”一个问题中安全成分的行为体;第二,问题的内容;第三,在何种条件下采取去安全化行为;第四,效果如何。其中,促使去安全化形成的条件涉及两个基本内容:背景与动力。特定的背景是去安全化产生的基础,动力是决定去安全化行为是否产生的关键。结合上述理论,本文将着重分析导致日本政府在维和议题上采取一定程度去安全化行为的必要条件。

二、日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在南苏丹的“进”与“退”

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日本积极参与联合国主导的维和行动,尤其是在维和费用分摊比例上,日本的贡献较为突出。从图 1 可以看出,自 2001 年至 2018 年期间,美国分摊比例最高,日本长期居于第二位。从 2006 年开始,日本分摊费用的比例逐步下降,中国分摊比例显

著上升,并在 2016 年超越日本。尽管如此,日本分摊维和费用的比例仍然高于除美、中以外的其他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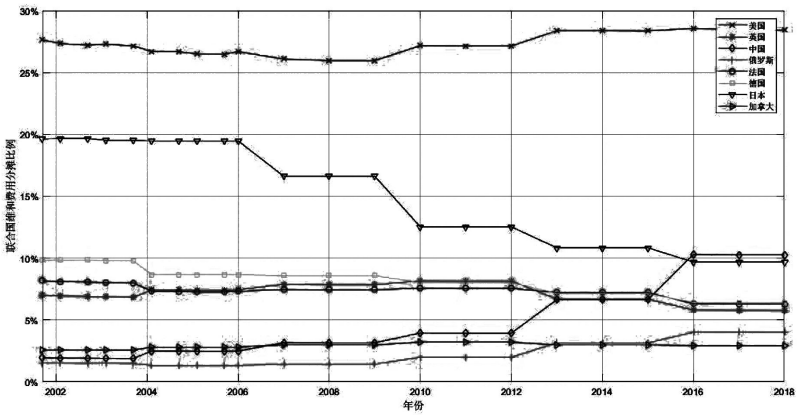

图 1　世界上主要大国分摊联合国维和行动费用比例(2001-2018)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官方统计数据整理得出,详情参见:https://peacekeeping.un.org/zh/how-we-are-funded。(上网时间:2019 年 5 月 15 日)

此外,日本也在法律层面为其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有利条件。1992 年 6 月,日本颁布《关于联合国维和行动与其他行动合作法案》(the Act on Cooperation with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nd Other Operations),即《国际合作和平法案》(the International Peace Cooperation Act),旨在增加日本在促进国际和平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一法案(后文简称"PKO 法案")建立了日本参与国际和平行动的"三根支柱":联合国维和行动、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行动,以及国际选举观察行动,强调日本重点关注联合国的相关事务从而为国际和平的工作做出贡献。同时,日本设立了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五大原则(简称"PKO 五原则")是:第一,武装冲突各方之间已经达成停火协议;第二,执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以及日本参与这些行动必须要获得当事国与武装冲突各方的同意;第三,行动必须严格保持公正,不支持武装冲突中的任何一方;第四,如果上述原则中的任一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日本政府可以撤回其自卫队;第五,武器的使用要受保护人员生命等最低需求的限制。[10]

非洲是联合国部署维和行动最重要的地区。相应地,日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也从亚洲扩大至非洲。自 2008 年以来,日本政府已向非洲的 13 个维和行动训练中心(埃及、马里、加纳、尼日利亚、贝宁、多哥、喀麦隆、埃塞俄比亚、卢旺达、肯尼亚、坦桑尼亚以及南非)提供了超过 3900 万美元的支持。日本的援助被运用到设施的修复、设备的供应,以及各种训练的设计与实施中。在人员派遣方面,日本派出 36 名专家到非洲的 8 个训练中心做讲座或作为顾问。[11] 2014 年,首相安倍晋三在联合国的一次讲话中表示,日本将在由联合国主导的在非维和行动中发挥积极作用。[12] 2018 年 9 月 25 日,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在联合国总部托管理事会会议厅发表讲话时指出,自 2015 年以来,在"联合国三边伙伴关系计划"(UN Triangular Partnership Project)框架内,日本为来自非洲的维和人员提供了操作重型工程设备的训练。其中,大部分来自肯尼亚的受训人员已被派往非盟驻索马里特派团(African Union Mission in Somalia, AMISOM),据悉这确实为特派团在当地的行动提供了支援。[13]

在参与联合国在非维和行动的过程中,日本于 2012 年至 2017 年期间,向南苏丹派遣自

卫队工程部队,这也是日本海外派兵的另一个标志性举措。在过去五年间,这支维和部队驻扎在朱巴,负责在朱巴及其周边地区修建基础设施。同时,其他士兵则与联合国及南苏丹当地机构保持协调,日本海上与空中自卫队为其他部队提供运输与补给。[14] 然而,日本政府决定于 2017 年撤回这支工程部队。对此,日本政府的解释是,该部队已经完成了在南苏丹的维和任务。日本政府指出,在南苏丹执行相关任务的 5 年来,这支维和部队为联合国在非维和行动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朱巴的土木工程建设能够走向新的阶段,因此,该部队将于 2017 年 5 月底从朱巴撤出。[15]

然而,日本政府的上述解释却引发了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日本政府淡化了南苏丹动荡的安全环境对维和行动的影响,突出强调自卫队在朱巴作出的巨大贡献,有掩盖撤兵真实原因的嫌疑。一直以来,不稳定的安全环境会显著增加了维和行动的风险,这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量减少向联合国维和行动派遣人员。大卫·希勒(David Shearer)曾指出,由于担心在参与联合国主导的维和行动中伤亡不断,陷入更多的冲突中,以及导致更多的成本产生,西方国家向联合国维和行动派遣的人员数量急剧减少。[16] 具体而言,根据联合国官方数据统计,在 70 年的维和实践中,有 3500 多人在行动执行期间遇难,其中 943 人因暴力致死。自 2013 年起,联合国维和特派团的伤亡人数激增。2017 年,至少约 56 名相关人员遇难,达到自 1994 年以来的最高值。维和人员死伤最严重的地区是非洲。[17] 这是联合国在非维和行动所面对的整体安全形势。在马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国内部,联合国维和人员也遭受当地武装集团的袭击,生命受到威胁。由此,维和人员也具备了双重身份,即安全的提供者与被保护者。由于日本向南苏丹特派团派遣了自卫队的力量,因此日本维和人员同样面临严峻的安全形势。不过,安倍政府却淡化非洲安全环境对本国参与维和行动的影响。例如,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否认是安全关切导致日本政府作出撤兵的决定。他强调,这一决定是源自日本政府的综合考量而非南苏丹正在恶化的安全形势。由于不愿意承认本国参与维和的部队所处的安全环境日渐糟糕,日本防卫省官员也因此受到外界抨击。[18]

日本政府在非洲维和问题上的“反常”,是一种“去安全化”的行为。尽管维和行动是国际安全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但随着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系统化,维和行动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涉及安全、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总体上,安全环境的变化导致维和形式发生转变——“从维持国家间战后停火和部队脱离接触的军事形式演变到内战结束后的危险时期里,利用军事和民事等许多因素共同建设和平的复杂形式”。[19] 因此,对于维和行动的认识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日本在维和议题上的“去安全化”正是表现为:在言语上降低自卫队参与维和行动的危险程度,相应提升正面的政治影响力。

三、日本在维和议题上的“去安全化”:背景与动力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联合国主导的维和行动中,出现了两种鲜明且相反的趋势:当有的国家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时(例如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有的成员国参与积极性却在降低(例如以美国为代表的众多发达国家)。其中,维和地区安全形势的恶化、维和人员伤亡率的攀升是导致发达国家减少向联合国维和特派团派遣人员的重要因素。詹姆斯·勒博维克(James H.Lebovic)认为,在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中出现了劳动力分工的现象,即“大国出钱,弱国出人”。[20]

相比之下，日本却在 2012 年至 2017 年期间向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派遣自卫队工程部队。日本政府认为，当时南苏丹面临国家建设的关键时刻，南苏丹的和平与稳定对于非洲的和平与稳定非常重要。因此，对于国际社会合力开展工作而言，支持南苏丹的国家建设与稳定是明显的挑战。事实上，自 2011 年 11 月起，日本政府在“PKO 法案”框架内为了回应来自联合国的需求，向南苏丹特派团派遣自卫队人员。[21] 然而，当联合国为了应对不断恶化的安全形势，要求维和人员在面对危险时应采取更加积极的姿态时，日本于 2017 年 3 月宣布将于 5 月底撤回其自卫队土木工程部队。

与常规的解释不同，日本在非洲维和议题上采取了一定程度的“去安全化”。这一行为的产生主要受日本维和所处的安全环境、舆论困境，以及日本与中国在维和上的竞争等方面的影响。其中，维和行动所处的安全环境是去安全化行为产生的特定背景；日本政府所面临的舆论困境、日本与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竞争劣势是去安全化行为产生的基本动力。

1.特定背景：南苏丹恶劣的安全环境

南苏丹动荡的安全形势是日本在维和议题上采取去安全化行为的特定背景。维和行动是国际安全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维和行动的部署势必要衡量当事国或地区的安全环境。对于受《和平宪法》与其他国内法律约束的日本，尤其需要关注开展维和行动所处地方的安全形势。从联合国维和特派团在非洲地区的部署与期限、维和人员的伤亡率，以及维和行动的不断系统化等方面来看，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安全局势依旧严峻。2013 年，南苏丹国内再次爆发内战，直至 2017 年日本撤回其自卫队，内战仍在持续。根据日本传统的“PKO 五原则”，南苏丹恶化中的安全环境显然对日本自卫队继续参与当地的维和行动造成了挑战。但是，中止自卫队参与南苏丹特派团的维和任务不符合日本政府的战略目标，这使日本政府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一方面，派兵参与非洲维和行动是日本外交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另一方面，南苏丹危险的安全环境给日本自卫队士兵造成安全风险，一旦出现人员伤亡，日本将陷入新的舆论漩涡。因此，面对非洲客观的安全形势，日本政府需要在非洲维和议题上采取一定程度的去安全化行为。这些行为具体表现为：在南苏丹再次爆发内战之后，日本政府未根据事实作出准确解释，将南苏丹国内的武装冲突描述为“小摩擦”，同时防卫省被质疑集体掩盖自卫队在南苏丹的维和日志，进而再陷“瞒报门”事件。[22] 因此，南苏丹变化了的安全环境为日本政府的去安全化行为提供了特定的背景。

2.动力：舆论困境与竞争劣势

第一，国内的舆论困境是日本政府在维和议题上采取去安全化行为的必要条件。这一舆论困境产生的基础是日本政府在海外派兵问题上仍然面临的合法性的问题。从背景来看，联合国根据维和行动开展的安全环境（尤其是非洲地区）对维和人员的行动提出了更多的要求。2017 年，对于联合国主导的维和行动而言是最危险的一年，重点表现在维和人员所遭受的袭击不断增加。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委托前指挥官克鲁兹（Dos Santos Cruz）调查如何能够在当今的冲突中限制维和人员所遭遇的风险。此后，联合国公布相应的报告《提高联合国维和人员的安全》（Improving Security of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ers）（即《克鲁兹报告》）。该报告要求维和行动应持更加积极的“姿态”，这需要维和人员在面对敌对势力时采取“能够制胜的力量”。不过，该报告所提倡的“更加积极与先发制人的”行动与日本对使用武力的法律限制相冲突。[23] 然而，日本政府已经为自卫队参与维和行动上提供了更多的法律支撑。2015 年，日本“新安保法案”相继在众参两院通过。其中，作为组

成部分之一的《国际和平支援法案》允许日本自卫队在特定背景下为海外武装力量提供必要的后勤支援与搜救，以共同应对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形势。就日本参与国际维和行动而言，参与的条件分成两个部分——联合国维和行动框架内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框架外。其中，在联合国主导的维和行动框架下，自卫队“部队行动基准”（Rules of Engagement, ROE）得以修订，包括武器使用的方面，以更好地符合当前联合国的标准。在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框架以外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合作中，日本的参与需要符合三个条件：第一，来自联合国大会、安理会或经社理事会的决议；第二，得到相关国际组织的请求；[24] 第三，得到维和行动开展所在地区所属国家的请求。[25] 由此，日本自卫队参与国际维和行动的范围与可执行的任务扩大，并且，“PKO 五原则”也被修订。但是，上述内容仍然与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的具体规定相矛盾，而修宪的门槛更高。此外，“PKO 五原则”早已普遍成为日本国内公众的共识。因此，尽管自卫队参与维和行动的合法性地位已大大提高，但舆论压力仍然使得日本政府考虑在南苏丹的维和行动中采取谨慎甚至撤并的决定。否则，“瞒报门”事件也没有产生的必然条件。

在日本国内公众舆论中，质疑本国政府派兵参与海外维和行动的声音仍然较多。一方面，日本民众比较支持本国参与联合国主导的维和行动。根据 2009 年一份政府的民意调查，在 1850 人中，超过 80%的民众支持日本的参与。但是对于非联合国主导的维和行动，日本民众的反对仍然较强。[26] 另一方面，对于国内一系列立法措施，为自卫队参与海外安全合作的“松绑”，日本民众之间的意见依然存在分歧。在 2014 年的一次舆论调查中，超过半数的日本民众反对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或者基于遭受袭击的盟友提供援助；相比之下，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支持上述行动。[27] 在近期的一次舆论调查中，有 54%的日本民众反对修订《和平宪法》第九条的内容。[28] 2017 年，日本政府按照惯例在民众中开展了针对日本外交的民意调查，受访人数为 3000 人，1803 人给予了有效的反馈。其中，就日本是否应该继续参与联合国主导的维和行动，以此作为向国际社会贡献人力资源的一部分的问题上，58%的民众认为日本应该继续维持当前参与的程度，这一比例较之过去有所上升；22.1%的民众认为日本应该比过去更加积极地参与；13.2%的民众认为日本应该参与，但是应该缩小其参与的程度，这部分比例有所下降。另外，只有 2.1%的民众认为日本不应该参与。值得注意的是，从 1994 年至 2017 年，认为日本应该维持现有参与程度的民众一直占最多数。（详情参见图 2）[29] 所谓“维持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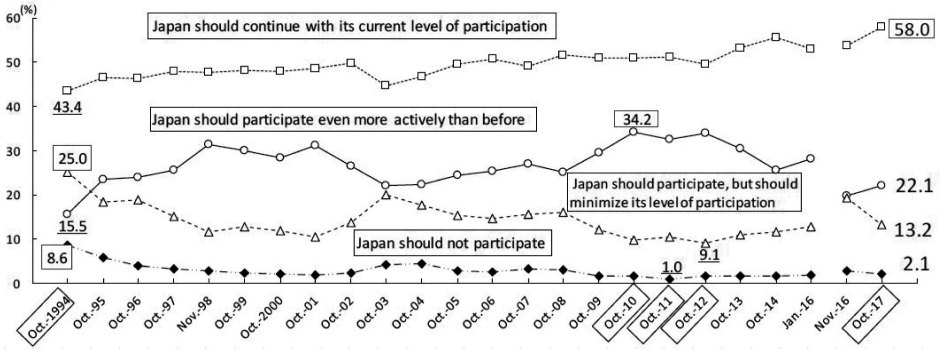

图 2　日本民众关于本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态度（1994–2017）

资料来源：Public Relations Office, Cabinet Office, “Overview of the Public Opinion Survey on Diplomacy”, Government of Japan, December 2017, p.22, https://www.gov-online.go.jp/eng/pdf/summaryg17.pdf. (上网时间：2019 年 7 月 6 日)

状”,可理解为至少日本民众相对支持本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但应该保持在当前的水平,不应继续提升其参与维和的程度。从民意调查来看,日本民众在本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上保持较为谨慎的态度。

然而,安倍政府不仅意在扩大自卫队承担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任务,同时派遣自卫队参与非联合国主导的维和行动。可见,日本国内的民意与政府的目标存在分歧。对此,安倍政府积极向国内民众解释政府的相关政策与行动。尽管在新安保法中,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只是组成该法案的一小部分内容,但丰田哲也(Tetsuya Toyoda)指出,日本政府却将其作为首个例子向公众解释新安保法。这表明日本外交部认为这一部分能给公众留下更好的印象。并且,网站上对相关法律条文的解释只提供了日语版本,这就明显地表现了日本政府更倾向于说服国内民众而不是来自国际上的观察者。[30] 然而,日本政府的举措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国内的舆论困境促使日本政府在维和议题上采取一定程度的去安全化行为。

第二,日本在参与国际维和行动上与中国展开竞争,且处于竞争劣势。与日本不同,中国在参与国际维和行动上所面临的阻碍更少。与日本开始参与非联合国开展的维和行动不同,同样是在 1992 年开始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至今仍然只参与由联合国主导的维和行动。但是,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法律束缚不及日本多。中国在参与维和行动时,面临的最大困境是如何处理好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理念、任务之间的关系。并且,国内民众普遍支持政府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无论是向联合国维和特派团派遣人员的数量还是分摊联合国维和费用的比例,中国的贡献都在逐步增长。2015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出席第 70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演讲。他指出中国将建立一支具有8000 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2019 年,中国完成了组建 8000 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以及两支常备维和警队。在支持联合国在非洲开展的维和行动上,2015 年,中国设立总额 10 亿美元、为期 10 年的“中国 – 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并为多个与 2020 年“消弭非洲枪声”(Silence the Gun in Africa)倡议相关的项目提供资金。[31] 2018 年 3 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马朝旭大使在安理会召开的联合国维和行动问题安理会公开会上,表示中国已成为安理会成员的第二大出兵国与出资国。在非洲地区,“中国向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派出了第一支直升机分队,积极落实向非盟提供无偿军事援助”。[32] 相反,日本于 2017 年 5 月撤回其部署在在南苏丹的自卫队工程部队。因此,日本与中国在参与联合国在非维和行动的竞争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这迫使日本需要通过一定程度的去安全化行为,为日后增强竞争力,甚至进一步推动其“争常”外交提供更多有利的条件。

非洲国家动荡的安全环境、日本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在国内遭遇的舆论困境,以及日本与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竞争中所处的劣势,为日本政府在参与维和议题上采取一定程度的“去安全化”行为提供了特定的背景与动力。日本政府采取去安全化行为,旨在为本国自卫队参与海外维和行动扫清更多的障碍。然而,这一行为带来的效果却未必能够令日本政府满意。日本时事通讯社的一篇报道指出,经历了 2017 年的“瞒报门”事件之后,由于日本政府未向民众提供清楚的解释,这导致民众对自卫队不断增加的作用失去了信任。自日本从南苏丹撤回自卫队工程部队之后,日本再没有向联合国维和特派团派遣自卫队部队。[33]

结　语

自 1992 年至今，日本参与联合国主导的维和行动已历经 25 年。在此期间，为了提升自卫队参与维和行动的合法性，日本政府在法律层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于 2016 年开始实施新安保法案。然而，日本政府决定于 2017 年撤回其部署在南苏丹的维和部队，并解释撤兵是由于该部队完成了在南苏丹的维和任务，同时相对淡化南苏丹恶劣的安全环境。加之“瞒报门”事件的发生，日本政府在维和议题上采取了一定程度的去安全化行为。本文以（去）安全化为理论视角，通过日本参与联合国在南苏丹开展维和行动的案例，具体分析了导致日本政府在维和议题上采取去安全化行为的条件。其中，非洲国家动荡的安全环境是去安全化行为产生的特定背景；日本政府在国内面临的舆论困境、日本与中国在维和行动中所处的竞争劣势，为日本在维和议题上采取去安全化行为提供了动力。

尽管新安保法的实施已经为自卫队参与海外安全合作提供了更多的法律基础，但是日本政府选择在维和议题上采取去安全化的行为，这表现出该国在推进安全战略过程中的谨慎态度。2019 年 4 月初，日本政府向驻扎在西奈半岛的多国部队与观察员团司令部派遣了两名陆上自卫队官员，这是日本首次参与联合国以外的维和行动。由于这一地区的安全风险系数相对较低，因此，这一“选址”也反映了日本政府在参与维和行动上的慎重。然而，日本政府在维和议题上采取去安全化行为的目的，是尽可能减少在推进新安保法案与修改宪法等议程上所遭遇的阻碍。也就是说，在不与民意直接对立的同时，通过在言语上降低自卫队参与维和行动的危险性，增加积极的正面意义，日本政府意在借助去安全化这一迂回方式，继续追求其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去安全化的行为也彰显了日本政府在推动本国安全政策上的决心，伴随着历史的记忆，这有可能导致日本在未来的外交中面临更多的困境。

注　释：

①这七项行动分别是：马里稳定团（MINUSMA）、西撒特派团（MINURSO）、联中稳定团（MINUSCA）、联刚稳定团（MONUSCO）、达尔富尔混合行动（UNAMID）、联阿安全部队（UNISFA），以及南苏丹特派团（UNMISS）。

② Luke Patey, Adam Day and Sebastian von Einsiedel, “China, Japan, and the Future of UN Peacekeeping,” *The Diplomat*, July 21, 2017, https://thediplomat.com/2017/07/china-japan-and-the-future-of-un-peacekeeping/. (上网时间：2019 年 7 月 3 日)

③[英]巴里·布赞、[丹]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潘忠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70 页。

④Shirley V. Scott, “The Securitization of Climate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How Close Have We Come and Would Full Securitization Enhance the Efficacy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Policy,” *Review of European Community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Vol. 21 No. 3 (November, 2012), pp.220-230.

⑤余潇枫，谢贵平：《“选择性”再建构：安全化理论的新拓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第 9 期，第 106 页。

⑥[英]巴里·布赞，[丹]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潘忠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版，第 55 页。

⑦ C.A.S.E. COLLECTIVE,”Critical Approaches to Security in Europe: A Networked Manifesto”, *Security Dialogue*, Vol.37, No.4, December 2006, p.453.

⑧ Didier Bigo,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in Paul D. William ed., *Security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124, 转引自李明月，刘胜湘:《安全研究中的巴黎学派》,《国际观察》,2016 年第 2 期,第 35 页。

⑨Georgios Karyotis, Stratos Patrikios,"Religion, Securitization and Anti-immigration Attitudes: The Case of Gree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47, No.1, January 2010, p.44.

⑩ "Outline of Japan's International Peace Cooperatio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May 14, 2015, https://www.mofa.go.jp/fp/ipc/page22e_000683.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7 月 4 日)

⑪ "Dispatch of a Self-Defense Forces member to the Ethiopian International Peace Keeping Training Centre (EIPKTC)",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https://www.mofa.go.jp/press/release/press3e_000034.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7 月 4 日)

⑫ "At U.N., Abe to Vow More Active Role for Japan in Africa Peacekeeping", *Japan Times*, September 24, 2014,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14/09/24/national/abe-vow-u-n-active-role-japan-africa-peacekeeping/#.XSBJa84zbIU.(上网时间:2019 年 7 月 3 日)

⑬ "Statement by Mr. Taro Kono,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at the High-Level Event on Action for Peacekeeping", Trusteeship Council Chamber, UN Headquarters, September 25, 2018, 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402508.pdf.(上网时间:2019 年 7 月 2 日)

⑭Michal Kolmas, "Japan's Security and the South Sudan Engagement: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straints on Japanese Military Rise Reconsidered", *Central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Studies*, Vol.3, No.1, p.77.

⑮"Revis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Plans for the International Peace Cooperation Assignment for United Nations Mission in the Republic of South Sud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March 28, 2017, https://www.mofa.go.jp/fp/ipc/page3e_000662.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7 月 3 日)

⑯ David Shearer, "Outsourcing War: Why Mercenaries are a Fact of Warfare",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 15, 1998, https://foreignpolicy.com/1998/09/15/outsourcing-war/.(上网时间:2019 年 7 月 6 日)

⑰ "UN Peacekeeping: 70 Years of Service & Sacrifice ", UN Peacekeeping, https://peacekeeping.un.org/en/un-peacekeeping-70-years-of-service-sacrifice.(上网时间:2019 年 5 月 15 日);Improving Security of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ers: We Need to Change the Way We Are Doing Business, UN Peacekeeping, January 2018.

⑱Mari Yamaguchi, "Japan to End 5-Year Peacekeeping Mission in South Sudan", *AP News*, March 11, 2017, https://apnews.com/b1179fd4e8914524a68f05bf56793b6d.(上网时间:2019 年 7 月 5 日)

⑲*Report of the Panel on United Peace Operations*, A/55/305-S/2000/809, UN, pp.19-25.

⑳James H.Lebovic, "Passing the Burden: Contributions to UN Peace Oper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this paper was prepared initially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New Orleans, February 2010.

㉑ "Extension of the Dispatch of the International Peace Cooperation Corps in South Sud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October 16, 2012, https://www.mofa.go.jp/announce/announce/2012/10/1016_01.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7 月 4 日)

㉒ "日本防卫省再陷'瞒报门'，涉嫌隐瞒自卫队行动性质"，新华网,2018 年 4 月 5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4/05/c_129844681.htm.(上网时间:2019 年 7 月 6 日)

㉓Emma Hutchinson, Adam Day, "Is the Cruz Report the End of Peacekeeping for Japan?" *Japan Times*,June 12, 2018, https://www.japantimes.co.jp/opinion/2018/06/12/commentary/japan-commentary/cruz-report-end-peacekeeping-japan/#.XSLD-M4zbIU.(上网时间:2019 年 7 月 2 日)

㉔具体而言,这些国际组织包括:(1)联合国;(2)联合国大会成立的组织,或者联合国专属机构,例如联

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以及由内阁命令指定的其他组织;(3)《联合国宪章》第52条所指的地区组织或者由多边条约成立的组织，为了和平与安全而开展国际协调合作以取得实际成效或具备专业知识，例如欧盟以及其他由内阁命令指定的地区组织。详情参见 Japan's Legislation for Peace and Security: Seamless Responses for Peace and Security of Japa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Government of Japan, March 2016.

㉕Japan's Legislation for Peace and Security: Seamless Responses for Peace and Security of Japa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Government of Japan, March 2016.

㉖Masamiito, "Greater Peacekeeping Role OK, not Truce Enforcement", *Japan Times*, March 23, 2010, https:// www.japantimes.co.jp/news/2010/03/23/reference/greater-peacekeeping-role-ok-not-truce-enforcement/#.XSb0Bs4zbIU.(上网时间:2019年7月5日)

㉗ "Over Half Oppose Japan Engaging in Collective Self-Defense: Survey", *Japan Times*, January 26, 2014,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14/01/26/national/politics-diplomacy/over-half-oppose-japan-engaging-in-collective-self-defense-survey/#.XSbkWs4zbIU.(上网时间:2019年7月5日)

㉘ "Poll Shows 54% Oppose Revision of Japan's Pacifist Constitution Under Abe's Watch", *Japan Times*, April 11, 2019,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19/04/11/national/politics-diplomacy/poll-shows-54-oppose-revision-japans-pacifist-constitution/#.XSbxlM4zbIU.(上网时间:2019年7月5日)

㉙Public Relations Office, Cabinet Office, "Overview of the Public Opinion Survey on Diplomacy", Government of Japan, December 2017, p.22, https://www.gov-online.go.jp/eng/pdf/summaryg17.pdf.(上网时间:2019年7月6日)

㉚Tetsuya Toyoda, "UN Peacekeeping as the Most Presentable Part of Japan's 2015 Peace and Security Legisl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Vol.20, No.1-2, pp.32-33.

㉛《吴海涛大使在"消弭非洲枪声——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合作"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上的发言》,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网站,https://www.fmprc.gov.cn/ce/ceun/chn/zgylhg/jjalh/alhrd/fz/t1642880.htm,2019-03-17。(上网时间:2019年5月15日)

㉜马朝旭:《积极参与联合国系统和平安全架构改革　更好履行维护世界和平职责》，人民网,2018年3月29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8/0329/c1002-29895923.html,2018-05-04。(上网时间:2019年5月10日)

㉝"Heisei in perspective: A look at the expanding role of Japan's Self-Defense Forces", Japan Times, April 28, 2019,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19/04/28/national/politics-diplomacy/heisei-perspective-look-expanding-role-japans-self-defense-forces/#.XSAJF84zbIU.(上网时间:2019年7月5日)

(刘青尧: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高　兰)

“议题投票”与日本政治变迁

——试析第 48 届众议院选举中的外交议题投票现象

孙贝芸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关于“外交议题如何影响选举”这一问题争议不断。在日本,伴随着选举体制改革以及政党轮替的实现,“政策”在选举中的地位日渐提高。尽管如此,外交议题通常在日本选举中分量有限。然而,2017 年 7 月开始,朝鲜先后进行导弹试射和核试验后,该事件不仅为安倍提前解散众议院、召开选举提供了契机,也构成了自民党竞选政权公约的首要问题。在竞选期间,日本公众高度关注“朝鲜对日本的安全威胁”,并认为自民党是最有能力管理对外事务的政党,朝鲜问题也成为了自公执政联盟获胜的重要助力。可见,在第 48 届众议院选举中存在外交议题投票行为。该现象既是地缘政治演变的结果,也是日本政党竞争的产物。在日渐固化的“一强多弱”政党格局中,在野党缺少成功处理对外事务的经验,政党间对外政策辩论模糊,这使得自民党能够凭借外交议题获取政治优势,形成了外交议题投票现象。

关键词　日本政治　议题投票　选举政治　外交政策

一、问题缘起:“朝鲜威胁”与日本第 48 届众议院选举

通常,外交政策并非日本国政选举的关键议题;然而,日本第 48 届众议院选举似乎有所不同。2017 年 7 月起,朝鲜先后进行了导弹试射和核试验。2017 年 9 月 25 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朝鲜对日威胁升级”的情况下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解散众议院、提前进行大选。他在发言中将“朝鲜的军事挑战”与“日本人口下降和老龄化”并称为日本所面临的两大危机。此前,安倍内阁支持率因森友学园、加计学园等丑闻曝光而骤然下降,但仍然在 2017 年 10 月 22 日的众议院选举获得了胜利。朝鲜问题被认为是此次自民党扭转颓势、赢得选举的重要因素之一。[①] 在 2017 年之前,除了 2012 年众议院选举外,外交与安全政策问题并未对日本国政选举产生显著影响。那么,应该如何看待 2017 年众议院选举中外交议题的突出与自民党的获胜?更明确地说,此次选举中是否出现了针对外交事务的议题投票现象?

在选举研究中,议题投票(issue voting)是一个颇具影响的投票行为解释模型。有别于意识形态投票(ideological voting)与价值观投票(value voting),议题投票更强调选民的议题偏好在投票决定中的作用。既有文献区分了议题投票的两种形式:其一为“接近投票”(proximity voting),即公民将自身的政策偏好与各党派立场进行系统比较,并以此为投票依据;其二为“单一议题投票”(single-issue vote),这是一种简化的议题投票方式,公民只关注他们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并支持他们认为最有能力解决这个关键问题的政党。[②] 在议题投票研究中,关于“对外事务议题的重要性”长期存在争议。通常,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几乎每位候选人都会用大量时间和精力来调查、讨论外交与国防事务,该现象引起了美国学界的激烈争论。阿尔蒙

德(Gabriel A. Almond)在1950年代提出,大多数美国人对外交政策的知之甚少,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国内政策上。[③] 此后二十年间的主流观点认为人们缺乏对外关系知识与信息,难以形成稳定的态度,只有在日常生活受到直接影响时才会深切关注这些问题。[④] 受制于这一基本认知,外交事务也被认为对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微乎其微。这一观点在20世纪70年代越南战争的背景下逐渐发生转变,学者们发现美国公众在能够区分候选人外交政策立场的差异,并且将此作为投票依据之一。[⑤]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阿尔蒙德观点已然过时。事实上,当前民调也仍然支持着他早期的判断,在2015年盖勒普调查中,受访者被要求在一系列议题中选出美国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贸易、恐怖主义、战争等对外关系方面议题都没有获得超过5%的关注。[⑥]

由此可见,日本第四十八届众议院选举中外交议题影响显著的情况,从日本选举过往情况来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学理上,该现象也属于投票行为研究中的争议性问题。本文以此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两个研究问题:第一,此次选举中是否出现了针对外交事务的议题投票行为?第二,如果存在外交议题投票,除了"朝鲜威胁"这一直接原因外,有何深层因素?下文将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分析。首先,回溯日本选举政治演变过程,分析不同阶段中"议题"的作用,构建第48届众议院选举的背景;第二,探究此次选举中"朝鲜问题"的角色,回答是否存在外交议题投票;第三,以日本选举政治与政党竞争变迁为背景,从政党、政策两方面剖析外交议题投票现象的深层诱因。

"议题投票"是西方选举研究的前沿。然而,囿于日本选举和政党竞争的特征,日本相关研究通常以自民党长期执政背后的投票逻辑为关注点,从"议题投票"切入的分析相对有限。本文选取了"外交议题投票"这一特定现象,试图从日本选举政治与政党竞争演变的角度来观察当前的日本选举,这将有利于深入理解日本政治发展现状以及日本对华政策的制定背景。

二、日本选举政治变迁中"议题"地位的提高

关于"1955年体制"下日本选举的研究,大多强调候选人及其社会网络在投票动员中的重要性。[⑦] 那么,"议题"究竟能对投票行为产生何种影响?在着手分析2017年的案例前,有必要对该问题进行基本阐述。下文将以1994年选举体制改革以及2009年政党轮替为时间分割点,观察日本选举政治变迁的三个阶段中"议题"地位的变化。

(一)1955年-1993年:候选人本位、利益诱导与派阀竞争

自民党自1995年末成立后,连续38年把持日本政权,直至1993年众议院选举落败。对此,学者们大多认同自民党在这个时期选举中善战不败的根源在于其政治自肥,即利益收买与依附。[⑧] 这个阶段日本实行的是中选区制。在该选制下,候选人忙于选区服务、经营个人后援会,以换取政选票支持,而候选人在政策议题上的立场并不关键。另外,受自民党"一党独大"格局的影响,党内阀派斗争甚至比党际斗争更激烈,竞选中往往缺少以政党纲领为中心的政策辩论,在政策决策与实施中也难以明确政治责任。[⑨] 与此同时,从日本二战后复兴到经济高速发展,日本的官僚都发挥了巨大作用。直到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之前,日本政治中都存在"官高政低"的现象,官僚在政策过程中占据了优势地位。此时,利益集团也更多通过游说官僚而非政党来影响政策,这也限制了"政策议题"对选举的影响力。总体上,在自民党政

治自肥和官僚优势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这个阶段日本选举缺少政策选择效用,候选人及其社会网络是影响选举投票的关键因素。

(二)1994 年选举体制改革后:“政策本位”初现

1994 年,日本开始实行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此次选举制度改革被极大地改变了政党竞争模式与选民投票行为。在中选区下,党内阀派争夺激烈,其声势胜于党际竞争;选举竞争是个人本位的,鲜有论及候选人所属政党及党派政策纲领。而新选制扩大了政党的作用,增强了党魁对竞选活动的影响,提升了政策的地位。[10] 政党的政策主张成为影响选民投票的重要因素。在 2005 年第 44 届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凭借“邮政民营化”政策取得了城市选民的支持,这就是一个突出案例。可以说,新选制的建立向日本公众明确传达了一个信息,即力图改变中选区制下候选人本位的竞争,选举将以政党的政策议题争雄;然而,此次改革并未完全实现这一转变, 尤其是选举动员的方式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20 世纪 90 年代大多数候选人仍依赖地方组织和社交网络动员选票。[11] 与此同时,政党之间政策交锋的范围与程度仍然是有限的。

(三)2009 年政党轮替后:“政策本位”趋势加强

在日本,长期的执政地位使自民党成为国家资源的垄断者,并将其用于向支持者分配利益以换取他们的选票,这限制了选民影响选举与政治决策的能力。2009 年众议院选举之前,大多数日本选民认为他们影响地方和国家政治的能力十分有限。2009 年,日本实现了首次真正意义上的政权轮替,逆转了这种情况,选民的政治绩效感大幅度提高。在此推动下,日本选举的“政策本位”趋势有所加强,“政策议题”成为了解释选民投票行为的因素之一。例如,2010 年第 22 届参议院选举中,消费税成为了最大的政策争论点,引发朝野政党之间的辩论,菅直人首相在竞选活动过程中有关提高消费税的一系列发言,促使部分选民阶层选择背离,放弃对菅直人内阁和民主党的支持,使得本来利好的选情趋向负面,加之普天间基地迁移的不利影响,民主党最终在此次选举中败北。[12] 2014 年第 47 届众议院选举,被认为是对“安倍经济学”的公投,安倍也公开表示自民党的胜利代表了选民对他及其经济议程的批准。对此,也有学者认为“安倍经济学”并非影响投票决定的主导议题,大多数选民对经济政策的偏好是相似的;相比之下,在宪法修订和集体自卫等非经济问题上,不同党派的支持者们表现出了显著的异质性。[13] 从上述案例来看,2009 年以来政党间的政策交锋在日本选举中的分量已然增加,议题投票成为了日本政治的现实,也进入了日本选举研究的视野。最后,仅就对外事务议题来看,由于战后日本防务处于特殊情况中,外交与安全政策议题在政治生活中突出,但对选举的影响却十分有限。近年来,随着地缘政治环境的演变以及日本选举“政策本位”趋势加强,这种状态有所改变,但外交议题通常并未进入日本国政选举竞争的核心。对这些情况的把握将为下文分析 2017 年众议院选举提供一定的基础。

三、日本第 48 届众议院选举中的朝鲜问题

在 2017 年日本众议院选举中,对外政策议题贯穿始终。尤其是在外交事务上具有经验优势的自民党,从宣布解散众议院、召开选举到政策论战,都不断强调“朝鲜问题”以及自身政策主张的有效性,借此扭转执政颓势,获取了选举胜利。

(一)选举背景:安倍内阁执政危机、朝鲜导弹试射和核试验

2017 年 7 月，朝鲜连续两次试射洲际导弹；继而在 8 月，试射的弹道导弹飞跃日本列岛上空；9 月，朝鲜推进了第六次核试验等。2017 年 9 月 25 日，安倍召开记者会宣布解散众议院，他在会上表示“朝鲜的挑衅在迅速升级，威胁已然变成现实”，他将朝鲜此次武器试验与日本少子老龄化问题并称为“国难”，表示要倾注全部心力与日本国民共同解决危机，并宣布解散众议院，以寻求在解决国家危机中取得突破。[14] 然而，在 7 月的朝鲜问题出现之前，安倍内阁已经遭遇了 2012 年以来最严重的执政危机，国民对其不信任度急剧增强。

2017 年 2 月，日本媒体曝光了安倍晋三夫人担任名誉校长的森友学园低价收购国有土地的事件，安倍首相遭到了民进党议员的激烈弹劾；该丑闻尚未平息，又曝光了加计学园增设兽医系的事件。同时，前防卫相稻田朋美被陆续曝出瞒报自卫队维和行动记录等问题。安倍内阁的支持率陡然下跌。时事通讯社的舆论调查显示，2017 年 7 月，安倍内阁支持率较 6 月下滑 15.2%，降至 29.9%，首次跌破 30%，创其 2012 年再度执政以来的最低记录；不支持率上升至 48.6%，超过了支持率，创下新高。[15] 安倍于 2017 年 9 月宣布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实际上是选择了对自民党最有利的时机。时事通信社 2017 年 9 月的舆论调查显示，安倍内阁支持率比 8 月增加 5.2%，回升至 41.8%；不支持率减少 7.4%，降至 36.7%，时隔三个月，内阁支持率终于超过不支持率，其主要原因在于安倍内阁应对“朝鲜威胁”的相关措施受到了日本公众的肯定。[16] 在安倍宣布提前进行选举后，最大在野党民进党却陷入了分裂危机，新成立的立宪民主党、希望之党都一时难以成势。综上，此次“朝鲜问题”为安倍重获民意支持、摆脱执政危机提供了契机，使其获得了召开选举的有利时机。

（二）朝鲜问题在竞选活动中的显著性分析

2017 年 10 月 22 日，日本举行了第 48 届众议院选举投票。在竞选过程中，执政两党、希望之党与日本维新会、立宪民主党与日本共产党及社民党三方展开争夺，围绕着消费税增税、核电、修宪等议题提出主张并展开辩论。尽管大多数政党并未在竞选活动中深入阐述安全与外交事务主张，但自民党对朝鲜问题的强调使得该议题在此次选举中凸显。在评估该外交议题是否影响此次选举结果时，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其一是政党态度的可及性，即选民能否得知政党在该议题上的政策取向；其二是选民态度，即他们在投票时如何考虑该议题。

首先，在“政党态度可及性”方面，安倍在解散众议院声明、竞选演讲中都持续呼吁选民支持他对朝鲜及其加速导弹发展计划的强硬立场。自民党在政权公约中再次声明“朝鲜威胁与少子老龄化是日本的两大危机”；并且，将“安全与外交”列为政权公约六大课题之一，强调要“保护人民免受朝鲜威胁”，突出了该议题的地位。[17] 相较之下，其他政党在朝鲜问题上并未提出足以一手运承的政策主张。在 2017 年竞选活动中，大多数在野党在朝鲜政策上表达了类似于自民党的立场，甚至日本共产党也主张加强制裁，赞同与他国合作强化对朝施压、推动朝鲜回归谈判桌的战略，这就意味着尽管在野党批评安倍利用朝鲜问题来获取选举优势，但他们却无法驳斥安倍的政策立场，也难以提出区别于安倍内阁现行政策的有效方案；换而言之，朝鲜问题使得安倍和自民党能够选择在“安全与外交政策”这一优势领域中与在野党作战。[18] 总之，自民党不仅在竞选活动中不断强调朝鲜问题的严峻性，而且凭借自身执政地位与外交经验优势，清晰地向选民表达强化对朝压力的主张。

其次，从选民态度来看，面对朝鲜频繁地进行导弹和核试验，日本选民表现出高度关注与警惕，普遍支持日本政府对朝施压的政策。NHK 在 2017 年 10 月 7 日到 9 日的民意调查发

现,选民投票时优先考虑的政策问题排名前三为:社会保障 29%,经济政策 18%,外交与安全保障 15%。[19] 这种关注度延续到了选举后,日本内务府在 2017 年 10 月 26 日到 11 月 5 日的民调揭露,83.0%受访者表示关注朝鲜的导弹试验,75.3%的公众关注朝鲜核试验。[20] 日本内务府 2018 年 11 月 18 日到 11 月 28 日的调查中,表示关注朝鲜导弹、核武器的日本公众占比分别为 66.7%、59.5%。[21] 两年相对比,2017 年朝鲜武器试验对日本公众的影响昭然若现。同时,在日本公众看来,自民党是最有能力处理这一问题的政党。有学者发现,一旦选民关注该问题,他们会倾向于投票给自民党而非在野党,朝日新闻在 2017 众议院选举后不久进行的调查证实了这一观点,83%受访者认为自明党是最有能力应对外交和安全事务的政党。[22]

(三)朝鲜问题对选举结果影响:是否出现外交议题投票?

2017 年,安倍政权曾陷入了严重的执政危机。此后,安倍通过内阁改组、调整自民党人事安排以及对朝鲜强硬表态,实现内阁支持率出现回升。他借机宣布解散众议院、提前进行大选。此后,在野党出现了党派分裂、重组现象,并在小选区相互竞争,分散了反自民党选票。最终,2017 年 10 月 22 日的众议院选举结果为,自公执政联盟获 313 席,控制三分之二以上绝对多数席位。与此同时,在野党势力羸弱,出现了一个弱小的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可见,日本现行的选举制度与在野党分裂是自公执政联盟此次大胜的重要原因。尽管如此,外交政策议题在此次选举中同样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朝鲜问题不仅是安倍解散众议院的契机,也是安倍主打的政策主张。同时,日本公众在整个竞选过程中对朝鲜的导弹试射和核试验表现出高度紧张与警惕,大多数人认为自民党是最有能力管理对外事务的政党。在此情况下,该议题也成为了外交经验颇丰的自公执政联盟最终获胜的重要助力。由此可见,尽管在前文分析中难以区分选民投票路径主要是“接近投票”亦或“单一议题投票”,但足以揭露此次选举中确实出现了外交议题投票现象。

四、外交议题投票现象的深层诱因

日本第 48 届众议院选举中出现了外交议题投票,朝鲜的导弹试射与核试验无疑是该现象的直接诱因。值得探究的是,这究竟是仅仅由地缘政治环境变化引发的一次“非常规”投票,还是日本选举政治与政党竞争变迁的合理结果呢?笔者认为,此次外交议题投票的出现并非偶然,乃是日本政治演变的产物。具体而言,在过去六十多年的日本政治中,选举逐渐由候选人本位、阀派斗争、利益诱导转向以政党为中心的政策竞争。在此过程中,选民政治绩效感增强,独立选民群体扩大,也都强化了“议题投票”对日本选举的影响。而“外交议题投票”的出现与自民党的外交能力与经验优势密切相关,这根源于“一强多弱”政党格局下自民党的长期执政。与此同时,日本政党外交政策立场的演变也是 2017 年日本在野党在“朝鲜问题”上政策主张趋近自民党的重要背景。前文已阐述日本选举政治变迁中“议题”地位逐步提高的过程,此节将从日本政党竞争格局、党际外交政策分歧演变两方面展开,分析针对外交事务的议题投票现象的深层诱因。

(一)“一强多弱”格局固化与自民党的外交事务优势

朝鲜问题是自民党在 2017 年日本众议院选举中获胜的重要助力,但这并非是安倍第一次凭借外交议题在选举中获益。2014 年 7 月 1 日,日本政府正式决定修改宪法解释,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引发了民众大规模示威抗议活动。随后,安倍于 7 月 3 日宣布日本将解除对

朝鲜的部分经济制裁,以换取朝鲜允诺重启对日本被绑架人质问题的调查,借此转移媒体争议焦点,实现内阁支持率回升;通过这种方式,安倍内阁和自民党淡化了由宪法重新解释引发的反对与不满,为该年 12 月第 47 届众议院选举中的压倒性胜利铺平了道路。[23]

纵观安倍执政时期的日本外交,诸多议题都争议不断,质疑与反对迭起。安倍内阁推动解禁"集体自卫权"、通过新安保法案以及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等举措,引发了在野党和市民团体的强烈批评。[24] 尽管如此,在日本公众看来,自民党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有着难以替代的优势。一方面,2009–2012 年民主党执政时期, 政府内部缺乏统一的外交与国防政策愿景,在诸多对外事务上处理不力。鸠山由纪夫时期日美关系因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而恶化。当时与奥巴马政府重新开始谈判时,民主党将国防和外交部门的官僚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随后出现了日美关系危机, 这导致了日本公众认为民主党政府即不了解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基本协议,也无法提出可行的替代方案。菅直人以及其后的野田佳彦时期,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冲突。对外关系管理中屡遭失败的经历,使得民主党难以获取公众信任。另一方面,在经历 2009–2012 年民主党执政时期后,自民党通过2012 年众议院选举重新上台,此后自民 – 公明联盟在日本国政选举中连续获胜,"一强多弱" 的政党竞争格局逐渐形成并不断固化。在此格局下,在野党大多数成员缺少组阁、执政经历,处理对外关系的经验甚至不如民主党,更无法提出持续性的外交政策纲领。

综上,在日渐固化"一强多弱"政党格局中,自民党在对外事务方面的经验与能力曾无与二。在此背景下,自民党倾向于在竞选中提高外交与安全议题的显著性,有意识地向选民强调自身在该政策领域的优势,从而增加竞选资本。

(二)政党外交政策立场演变:对立与趋同

通常,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外交政策是候选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相对于外交政策议题在美国总统竞选中频频现身,日本则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情况。在日本国政选举中,在野党很少碰触安全与外交政策领域,各政党难以在对外事务上形成真正的政策交锋。在 2017 年众议院选举,自民党将"国防和外交"列在政权公约首位,"安倍经济学"位列第二,其后依次为经济增长策略、育儿与教育无偿化、区域振兴与灾区重建以及宪法修正案。[25] 在野党的首要关注点与之不同,并纳入了一些未进入自民党政权公约的政策议题。例如,希望之党将消费税作为优先事项,并在竞选议程第六点中提及"性别平等"等事务;立宪民主党则将收入再分配列为第一要务,将政府透明度列为第四。[26] 总体上,各政党在竞选中重点关注的政策领域相去甚远,政策分歧主要出现在经济、社会政策以及宪法修正案方面。由此可见,尽管"朝鲜问题"在日本第48 届众议院选举中引人注目,但各政党在该议题上缺乏真正的政策交锋。

该现象的出现与战后日本政党外交政策辩论的演变密切相关。二战后,保守与进步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成为了日本政治的轴心。由此形成了以自民党为代表的保守阵营,以及以社会党为代表的革新阵营。两大阵营在日本是否要保留传统政治因素,是否应增加防御力量,以及是否要与美国建立防卫同盟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意见冲突。[27] 最突出的分歧在防卫与宪法问题上,两大阵营关于《日美安保条约》和自卫队的争论构成了该阶段日本外交政策辩论的主轴,保守派力主加强日美同盟、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而进步阵营则主张撤销安保条约,这与他们在宪法修订上的立场具有错综复杂的联系。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自民党与社会党联合政府的成立, 保守与进步意识形态对立在日本政治中的重要性下降了。有学者认为,1994 年自民党和社会党这对意识形态宿敌组成联合政府,这向公众

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1955 年制度”已经结束,但新的党派竞争轴心尚未出现。[28] 在外交政策方面,1994 年联合政府成立时出现了两党政策的趋同,更准确地说,是社会党立场的右移,社会党几乎放弃了整个外交政策纲领,接受了日美安保条约和自卫队。[29] 此后,日本政党之间外交政策分歧仍然存在,包括“加强日美同盟”与“摆脱对美从属关系”的对立,“在现行宪法框架内,以和平发展原则解决国际问题”与“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使自卫队海外派兵永久合法化”的对立,等等。但是,在意识形态淡化的背景下,政党出于选举的需要,在不同政策议题的立场选择上往来于左右之间,党际政策趋同与对立呈现出交错复杂的状况。例如,经过日本政界多次重组,在 2012 年左右,社民党在经历政策方向迷失后基本重回到过去社会党政策路线,左翼两党的政策位置变化不大;民主党基本上位于中位,但对“自卫队海外出兵”议题从完全反对转为中立;公明党的政策距离更靠近民主党,但在日本争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日美同盟议题上与自民党接近。[30]

综上,战后日本政党的外交政策立场是相对稳定的,自民党与日本共产党分别位于两端,其他政党分布在中间。随着政党政治保守 – 进步主轴的崩溃,外交政策辩论的模糊性上升。近年来,日本各政党在选举中实用主义倾向加重,竞相调整政策立场,政策持续趋同。在此趋势下,出现了 2017 年众议院选举中的局面:自民党在竞选期间多次强调自身对应朝鲜安全威胁的能力,以及管理日美关系、日中关系和提升日本国际地位方面的经验;而其他政党并未对自民党的对外政策主张与能力优势提出质疑,他们的竞选政策中也缺少具体的外交事务内容,只有自民党的执政伙伴公民党在竞选议程第 7 项重申了安倍政府的政策。[31]

五、结　语

在政治环境中,哪些因素影响着选民的投票决定?选举研究的解释通常指向选举体制、候选人以及政党与政策议题。回溯过去六十多年的日本政治,选举体制塑造着选民的政治参与和投票模式;而选举体制的变迁,改变了候选人、政党与政策在选民投票决定中的权重。1993 年前,日本选举制度与政党政治的某些因素增加自民党的优势优势,包括选区定额不平等、保守的农村选民、派阀关系等。[32] 此时,候选人需要建立后援会来获取投票支持,候选人本身及其社会关系网络、利益诱导对选举影响重大,缺少以政党为中心的政策竞争。1994 年中选区制废除以后,日本开始采取小选区与比例代表制并立的选举体制,选制和政党竞争都与此前截然不同,政党间政策交锋逐渐靠近选举前沿。在诸多议题中,经济与社会政策通常占据主导地位,关于宪法的争论也至关重要。战后,外交与安全政策议题在日本政治生活中十分突出,但通常并未进入选举竞争的核心。而2017 年众议院选举中,安倍却借由外交议题获胜。该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这既是日本的国际处境演变的结果,也是日本政党竞争的产物。对日本而言,亚洲的地缘政治环境变得愈发令人担忧,特朗普上台后日美关系中不稳定因素也有所上升;在此背景下,需要有经验的政党来驾驭日益复杂的对外事务局面。在自民党长期执政的“一强多弱”格局下,日本在野党外交经验相当匮乏,大多缺乏统一、持续的外交政策愿景。因此,尽管各政党在修宪议题上争锋相对,但对于地缘政治变迁所产生的安全与外交政策议题,缺乏清晰的辩论主轴与立场。由此可见,日本政党竞争格局、党际外交政策辩论模糊,使自民党得以在 2017 年凭借“朝鲜问题”获胜,这是外交议题投票现象出现的深层原因。

注　释：

①LAM Peng Er, "Japan in 2017: Successes and Scandals", *East Asian Policy*, Vol.10, No.1, 2018, p.115.

②Romain Lachat, 'Electoral Competitiveness and Issue Voting', *Political Behavior*, Vol.33, Issue.4, p.647.

③Gabriel, Almond,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0, p.69.

④Ole R. Holsti,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Challenges to the Almond-Lippmann Consensu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6, No. 4, 1992, pp.439~59.

⑤John H. Alerich, John L. Sullivan and Eugene Borgida, 'Foreign Affairs and Issue Voting: Do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Walts Before a Blind Audi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3, Issue. 1, 1989, pp.123-4,131.

⑥Katja B. Klieinberg, Benjamin O. Fordham, 'Don't Know Much about Foreign Policy: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Don't Know and No Opinion Responses on Inferences about Foreign Policy Attitude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14, 2018, p.431.

⑦Bradley Richardson and Dennis Patterson, 'Political Tradi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The Significance of Postwar Japanese Politics for Politic Scienc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 2001, pp.94-6.

⑧参见:[日]斋藤淳著,杨帆、张帆译:《政治自肥:自民党长期政权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Ethan Scheiner, *Opposition Failure in a One-Party Dominant State*, New York: Cambridge Press, 2006。

⑨Rei Shiratori, 'The Politics of Electoral Reform in Japa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6, No.1, 1995, p.84.

⑩Sherry L. Martin, 'The influence of Voters' in Alisa Gaunder, *Routledge Handbook of Japanese Politics*, Oxon: Routledge, p.84.

⑪Bradley Richardson and Dennis Patterson, 'Political Tradi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The Significance of Postwar Japanese Politics for Politic Scienc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 2001, p.108.

⑫徐万胜:《日本政权更迭析论》,北京:时事出版社,2016 年版。

⑬Horiuchi, Yusaku, Smith, Daniel M., Yamamoto, Teppei, 'Measuring Voters' Multidimensional Policy Preferences with Conjoint Analysis: Application to Japan's 2014 Election', *Political Analysis*, Vol.26, Issue.2, 2018, p.192, 207.

⑭安倍晋三:《安倍内阁总理大臣记者招待会》,日本首相官邸网站,https://www.kantei.go.jp/cn/97_abe/statement/201709/_00016.html,访问时间:2019 年 11 月 17 日。

⑮李垚:《日本第 48 届众议院选举后的政党政治格局》,《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18 年第 4 期。

⑯张伯玉:《日本第 48 届众议院选举:继续维持'一强多弱'政治格局》,《当代世界》2017 年 11 期。

⑰自民党:「政策パンフレット2017」,自民党网站,https://jimin.jp-east-2.storage.api.nifcloud.com/pdf/pamphlet/20171003_pamphlet.pdf?_ga=2.139026419.1915870070.1573967433-1811456507.1573967433, 访问时间:2019 年 11 月 16 日。

⑱Yasuhiro Izumikawa, 'The North Korea Factor in the 2017 Election' in Robert J. Pekkanen, Steven R. Reed, Ethan Scheiner and Daniel M. Smith edited, *Japan Decides 2017: The Japanese General Election*,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320.

⑲伊藤雅之:「衆院選公示　問われるものは」,NHK 网站,http://www.nhk.or.jp/kaisetsu-blog/100/281614.html,访问时间:2019 年 11 月 17 日。

⑳内閣府大臣官房政府広報室:《世論調査報告書 平成29年10月調査》, 日本内阁府网站,https://survey.gov-online.go.jp/h29/h29-gaiko/index.html,访问时间:2019年11月17日。

㉑内閣府大臣官房政府広報室:《世論調査報告書 平成30年10月調査》, 日本内阁府网站,https://survey.gov-online.go.jp/h30/h30-gaiko/index.html,访问时间:2019年11月17日。

㉒Yasuhiro Izumikawa, 'The North Korea Factor in the 2017 Election' in Robert J. Pekkanen, Steven R. Reed, Ethan Scheiner and Daniel M. Smith edited, *Japan Decides 2017: The Japanese General Election*,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323.

㉓Yasuhiro Izumikawa, 'The North Korea Factor in the 2017 Election' in Robert J. Pekkanen, Steven R. Reed, Ethan Scheiner and Daniel M. Smith edited, *Japan Decides 2017: The Japanese General Election*,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p.315-7.

㉔吴怀中:《需要重新审视日本的'保守政治'吗? ——比较政治学视野下的当代日本评价》,《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11期。

㉕自民党:「政策パンフレット2017」,自民党网站,https://jimin.jp-east-2.storage.api.nifcloud.com/pdf/pamphlet/20171003_pamphlet.pdf?_ga=2.139026419.1915870070.1573967433-1811456507.1573967433, 访问时间:2019年11月16日。

㉖Yukio Maeda, 'Public Opinion and the Abe Cabinet: Alternating Valence and Position Issues' in Robert J. Pekkanen, Steven R. Reed, Ethan Scheiner and Daniel M. Smith edited, *Japan Decides 2017: The Japanese General Election*,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p.140-1.

㉗Hirofumi Miwa, 'Voters' Left - Right Perception of Parties in Contemporary Japan: Removing the Noise of Misunderstanding',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6, No.1, 2015, pp.132-3.

㉘Willy Jou and Masahisa Endo, *Generational Gap in Japanese Politics: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p.3-4.

㉙Sven-Oliver Proksch, Jonathan B. Slapin and Michael F. Thies, 'Party System Dynamics in Post-war Japan: A Quant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of Electoral Pledges', *Electoral Studies, Vol.30*, Issue.1, 2011, p.120.

㉚周杰:《日本选举制度改革探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㉛Sheila A. Smith, 'Foreign Policy' in Robert J. Pekkanen, Steven R. Reed, Ethan Scheiner and Daniel M. Smith edited, *Japan Decides 2017: The Japanese General Election*,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334.

㉜Ray Christensen, 'Election systems and campaign rules' in Alisa Gaunder, *Routledge Handbook of Japanese Politics*, Oxon: Routledge, 2011, p.60.

(孙贝芸: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广涛)

日本对华文化外交中的国际日语教育

——以“大平班”为例

栾楚翘

内容提要 语言是人类交流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是文化和价值观的主要载体,当今全球化的趋势推动了越来越多的跨文化传播活动的发展,其中民族语言的国际推广既有利于一国扩大文化影响力,也有利于其提高国际地位、争取国际话语权,因此,许多大国都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建设,日本就是其中一员。同时,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理论开拓了权力理论研究的新视角,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反响。根据奈的观点,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来自三种资源:文化、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作为软实力的主要来源之一,文化对于一国国家形象和软实力有着重要影响,因而强调文化外交的核心在于与他国公众进行信息和观点的沟通,利用软实力资源提升国家的吸引力。作为日本软实力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国际日语教育的推广自实施起至今已取得相当的成效并积累了很多经验,中国的“大平班”就是日本对华文化外交中国际日语教育的典型事例。因此笔者试从软实力和文化外交的视角分析国际日语教育推广,并进而探索其对中国推广国际汉语教育提供的经验和启示。

关键词 文化外交 软实力 大平班 中日关系

一、日本的文化外交与软实力分析

自冷战结束后,无论从理论话语还是政治现实来看,国际关系都已经开始从传统的注重硬实力向关注软实力的方向演变,文化作为软实力的主要来源,对国际政治关系的重要影响力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共识。在此深刻的变革下,以文化为代表的软实力日益为世界各国所重视,文化外交也成为国际外交舞台上的新焦点。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是由一国政府所从事的、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对外文化交流。[①] 胡文涛通过对中外学者就文化外交的定义进行辨析,对文化外交从外交的主体与客体、目标与意义以及手段与途径等方面作出了较为全面准确的定义,他认为文化外交是政府或者非政府组织通过教育文化项目交流、人员往来、艺术表演与展示以及文化产品贸易等手段为促进国家与国家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相互理解与信任,构建和提升本国国际形象与软实力的一种有效外交形式,是外交领域中继政治、经济之后的第三支柱。[②]

在日本外务省的官方表述中,文化外交是为了顺利有效地推进外交政策,并促进日本人民与世界人民的跨界活动和交流、增加世界人民对日本的兴趣,同时加深他们对日本的了解、信任和亲近感所必不可少的措施。[③] 对于这一概念,日本外务省采用的日本表述是“広報文化外交(公共文化外交)”,而英文直接以“Public Diplomacy(公共外交)”称呼。

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这两个概念既相似又有重合之处,但两者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侧重点不同。公共外交的重点是向别国公众解释本国政府的

政策以实现政府的短期目标，因而功利性强，注重价值取向灌输，追求对他国民众全方位、彻底的心理和思想上的控制；而文化外交则更关注对方的需要和期望，注重通过教育与文化交流项目等来实现和促进国际社会之间的相互理解，致力于长期目标和长远利益，而非短期效应。[④] 二是行为主体不同。根据赵启正教授的观点，公共外交和政府外交组成国家的整体外交。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应包括政府、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社会精英和广大公众多个层面。[⑤] 而文化外交则是一国政府所从事的对外文化关系的总和，或者说，是以主权国家为主体、对外行使主权的官方文化关系。因此，一方面，二者是一种相互交叉（部分重叠）的关系，这个重叠的领域就是面向公众性的文化外交或者说文化上的公共外交。另一方面，它们又有彼此独立的领域，就文化外交而言，还有政府间（而非面向国际公众）的文化外交；就公共外交而言，还有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而非文化方面）的公共外交。[⑥]

作为日本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日本文化外交的主要方式有日语教育、留学生教育、青少年交流、国际文化学术交流、对外文化艺术交流、对外无偿文化援助项目等。其中，国际日语教育是文化外交中具有基础性作用的重要一环，这与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演变密切相关。战后日本选择了一条建立在日美基轴的基础之上、注重发展对外经济和文化关系的外交路线，战后各时期日本国家战略下的文化外交政策也随之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

战后初期，日本政府的重心还是经济发展，在这期间虽然也有进行一些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如 1964 年东京奥运会的召开等，但很难说有主动、宏观、明确的文化外交战略。[⑦] 上世纪 70–80 年代，随着冷战格局的变化，日本政府开始重新重视其外交战略的多元化发展方向，日本文化外交也随之迅猛发展。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竹下登等。1973 年 1 月 27 日大平外相在国会演说时，将“文化外交”置于日本外交政策的四大重点之一，这是日本政府对文化外交战略重要性的重新审视。[⑧] 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大平内阁深刻意识到“文化时代的到来”，1979 年 1 月大平在就任首相的施政演说中，认为日本已经从“经济中心的时代过渡到了重视文化的时代”。[⑨] 中曾根首相提出“文化大国”的概念，他把“璀璨的文化之国”和“国际国家”结合起来作为日本的国家战略目标，表示日本应该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进而在“文化上、政治上对世界积极地做贡献”。[⑩] 竹下登首相也是倡导国际文化交流的先锋。1988 年 5 月，竹下首相在伦敦发表“日欧新时代的开幕”演说，使日本的“国际协作构想”明朗化，成为日本政府推进文化外交战略的标志性宣言。竹下还设置了“国际文化交流恳谈会”用以探讨加强国际文化交流的具体做法。[⑪]

冷战后，随着冷战格局的瓦解和世界的多极化趋势，世界文化日益交融与碰撞，出现了以约瑟夫·奈的“软实力论”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代表的注重文化研究的作品，世界各国政府也开始更加重视文化这种“软实力”在对外关系中发挥的作用。同时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使日本民族心理内部出现深刻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此 1996 年 7 月，日本政府公布实施《21 世纪文化立国方案》，“文化立国”新国家规划出台，这是日本政府适应形势变化而进行的新的战略调整，也反映了国际文化合作的时代价值。[⑫] 新世纪，日本正在实践它所提出的“营建日本酷文化，打造日本国家品牌，赢得世界好感”的全新的外交理念。2011 年 6 月提出“酷日本”战略，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过去的文化产业政策。此外，日本虽然屡屡更换内阁，但其文化外交政策却保持着连续性。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学说以来，有关软实力的讨论和研究便风靡全球。奈将软实力界定为一种能力，“是一种依靠吸引力而非通过威

逼或利诱的手段来达到目标的能力”,并认为“软实力取决于塑造他人偏好的能力”,“软实力就是吸引力。”根据奈的观点,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来自三种资源:文化、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那么作为软实力的重要来源,文化这一概念究竟要怎么理解呢?奈本人对文化的定义是“为社会创造意义的一整套价值观和实践的总和”。其中文化又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侧重大众娱乐的流行文化,另一类则是迎合精英品味的高雅文化,如文学、艺术、教育等。[13] 文化作为软实力的重要来源,也日益受到各国重视。

日本的软实力现状又是怎样的呢?由于统计数据最多且调查的国家最多,波特兰公司公布的“全球软实力 30 强”的数量化统计获得的认可度相对较高。[14] 根据波特兰公关公司发布的“全球软实力 30 强”年度研究报告和排行榜,最近五年,日本的软实力排名一直稳居世界前十,去年更是首次进入前五,并且一直是亚洲软实力排名最高的国家。波特兰公关公司的指数建立在约瑟夫·奈所提出的软实力三大支柱的基础上,在研究方法上,该指数将六个类别(政府、文化、教育、全球参与、企业和数字)的客观数据与国际民意测验相结合,为软实力分析提供了全面的框架。其中,“文化”这一分类指数被定义为“一国文化输出(包括流行文化和高雅文化)的全球影响力和吸引力”,这与约瑟夫·奈的定义如出一辙。而“教育”主要指的是国内教育,具体来说则是“一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学术贡献以及对国际学生的吸引力”。[15] 在该公司的 2019 年度分析中,认为日本通过其软实力资产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尤其是“文化”分项指数表现出色,这表明日本确切知道如何利用其广泛的文化资产。[16] 换言之,文化为日本软实力的提高作出了很大贡献。

二、作为文化外交一环的国际日语教育推展

二战结束前的殖民地及占领区域的日语教育推展,主要是通过军事手段强力推进的。以在华日语教育历史为例,徐敏民通过比较考察了台湾、“满洲”和大陆这三个地区的日语教育发展和转型,指出在二战结束之前的中国,以将台湾“皇民化”为目标作为国语的日语教育、以“日满一体化”为企图作为准国语的日语教育和以大陆“亲日化”为企图作为外国语的日语教育这三者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具体表现如下表所示。

表 1　二战结束前台湾、“满洲”、大陆的日语教育比较

	台湾	满洲	大陆
目标	皇民化	日满一体化	亲日化
地位	国语	准国语	外国语
普及率	最高	较高	一般

资料来源:根据孫暁英『「大平学校」と戦後日中教育文化交流—日本語教師のライフストーリーを手がかりに—』一书第 33 页文字内容整理制作。

同时,他指出就当时中国的日语教育而言,由于日本的政治野心和侵略战争,这是在通过日语教育使殖民地、半殖民地和沦陷区的中国人被批量生产为日本的“顺民”、“傀儡”和“牺牲品”。此外,当时作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以其较高的日语普及率而闻名,这是因为在以“国语教育”为中心的公立学校教育中,日语教育得到了促进。然而,由于公立学校的入学率较低,自 1930 年以来,通过以“国语讲习所”为中心的社会教育的开展,日语的普及率开始增

加。换句话说,“国语讲习所”为那些没有上公立学校的人补充了日语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讲,除了学校教育之外,社会教育在日语教育的传播中也发挥了作用。[17]

战后国际日语教育推展的背景、基本方针和进程与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演进过程基本一致。具体来看,1945–1950 年代中期是国际日语教育的起步和转型阶段。二战后日本政府在美国占领当局的主导下,通过立法改革了近代教育体制中的非民主、军事性要素,确立了民主、和平的现代教育体制。[18] 国际日语教育的内容也被重新定义,以重建日本文化国家形象和复兴日语教育为目的。在战争期间推行奴化教育的日语教育振兴会被解散并重新改组为语言文化研究所,为美国传教士教授日语。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开始进入高速增长期。经济的高速增长,使日本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日本通过加入国际经济组织、举办大型赛事、实施贸易与金融自由化等举措,重返国际舞台,确立国际地位。与此同时,日语教育也成为日本扩大国际影响力的手段之一,受到日本政府的重视。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末,日语教育处于重新起步的“准备期”。这一时期日本政府通过确立相应的体制、建立相关机构,编纂日语教材,为推进国际日语教育提供保障。[19] 代表性事件是日本外务省于 1972 年 10 月设立特殊法人国际交流基金,专门从事与海外的文化艺术、日语教育、日本研究与知识交流等领域的国际文化交流事业。国际交流基金是日本唯一实施综合国际文化交流的专门机构,并于 2003 年 10 月 1 日成为独立行政法人。[20] 这一独立文化机构的建立,标志着日本政府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制定和实施文化外交战略的必要性, 这与该时期日本政府文化外交理念的转变方向是一致的。[21]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日本的国际日语教育全面展开。20 世纪 80 年代是国际日语教育的高潮期,这一时期,日本推行国际日语教育的主要举措为:1980 年 9 月日本政府为培养中国大学日语教师在北京设立了“中国日语教师培训班”(俗称“大平班”)。1981 年开始,日本政府的开发援助计划(ODA)将推广日语纳入预算,日语的普及事业急剧扩展。随着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中曾根内阁于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和谋求成为“政治大国”、“国际国家”的发展目标。与之相应,在文化教育方面,1983 年,中曾根内阁提出到 21 世纪初“10 万留学生接收计划”,日语学习者开始急速增加。[22] 1984 年,日本国际教育协会与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联合举办日语能力检定考试。1989 年, 国际交流基金开设日语国际中心,同时,日语教育振兴协会也于这一年成立。20 世纪 90 年代是国际日语教育的稳定增长期。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日语教育的高潮也渐渐消退,但全世界学习日语的人数依然持续增长。这一时期,日本政府通过提高国内外日语教师的水平、日语教育机构的教学质量、建立日语学习支援网络等方式,不断扩大对外日语教育。1990 年,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在曼谷、雅加达、悉尼开设海外日语中心。1994 年,国立国语研究所开始对国际社会中的日语教育进行综合研究。1996 年,日本贸易振兴会举办首次商务日语能力考试。[23]

21 世纪至今是国际日语教育的缓慢增长期。进入 21 世纪以来,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少子高龄化等问题给日本的未来蒙上阴影。尽管如此,全世界学习日语的人数依然缓慢增长。与此同时,随着日本对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视,文化外交也越来越受到关注。2007 年,日本政府提出文化产业战略构想,并提出六项具体政策措施,其中一项就是“推进国际文化交流、充实日语教育”。“日本文化产业战略”认为文化产业可以对外提升日本的国家软实力,扩大日本的影响,打造国家形象,“不仅有助于经济利益和日本品牌价值的增加,还可以加强日本与其他国家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2008 年,国际交流基金会开始构筑“JF 日语网络”,计划增加 100

个教育基地，通过与海外日语教育机构的紧密联系与合作，改善日语教育的环境，提高日语教育的质量。“10 万留学生接收计划”这一目标最终于 2003 年实现，达到 10.95 万人。日本政府随后又提出了在 2020 年实现接收 30 万留学生的目标。[24] 值得注意的是，约瑟夫·奈区分了三种类型的力量，即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软实力。Yonezawa Akiyoshi 由此认为纵观日语教育发展，教育本身已在近几十年来将军事和经济力量转变为软实力，并将其与军事、经济和软实力之间的关系转变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军事力量支持的教育（1868–1950）；通过经济发展在教育中积累软实力（1950–1980 年）和利用软实力转型为后工业社会（1980 至今）。[25] 这一划分也从侧面反映了日本国家发展的进程。

战后海外日语教育的拓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实践方面，如上文所述，为促进日语教育的国际推广，日本政府机构和独立行政法人等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一方面，政府大力支持国际日语教育发展，日本政府机构中推广国际日语教育的主力机构是文部科学省与外务省。另一方面，专门机构的强力推进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日语教育推广相关的专门机构主要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国立国语研究所日语教育中心等独立行政法人。成果方面，根据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最新统计数据，2018 年海外共有 1.8 万余个日语教育机构，7.7 万余名日语教师，日语学习者近 400 万人。而 1974 年当时海外共有 898 个日语教育机构，2254 名日语教师，日语学习者人数为 7.78 万人。[26] 在 40 多年的时间里，全世界日语学习者人数扩大了 50 余倍。

三、“大平班”：日本在华日语教育推展的事例研究

“大平班”的中文正式名称为“中国日语教师培训班”，日文名称是「日本語研修センター」（通称「大平学校」），它是 1980 年至 1985 年在北京语言学院（现为北京语言大学）进行的日语教师培训项目，每期招收学员 120 名，由日方派遣一流专家、学者前来授课，前后五期，共培训中国高校日语教师 600 名左右。[27] 该项目之所以被称为“大平班”，是因为它是在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倡导下设立的。大平正芳在担任外相时，和田中角荣首相一起共同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大平的外交重点是日美合作，同时注重对亚洲外交的平衡，努力构筑环太平洋政治秩序。大平本人并非世袭政治家，而是出身于香川县农民家庭，由大藏省官僚转型而来。大平非常重视日本的文化外交，也是由他最早提出“文化立国”口号。[28]

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不断扩大。1979 年 9 月，中国政府向日本提出请求提供日元贷款，经过数月交涉，同年 12 月 5 日至 9 日，大平首相正式访华。大平承诺为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自此，日本的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正式启动。当时大平正芳提出在北京建立“日本语研修中心”的计划，每年由日本为中国培训 120 名年轻的大学日语教师，用五年时间培训 600 名教师，这就是“大平班”计划的雏形。同年，中日间签署“中日文化交流协定”。[29]

那么“大平班”又是如何具体展开的呢？首先，日常学习的课程主要如表 1 所示。

由表 1 可知，“大平班”所开设的科目形式多样，涉及日语教育中的词汇、语法、对话、写作等各个方面，也有关于历史、文学等背景知识的讲授，同时不乏教育方法、教材研究等与日语教育直接相关的课程，可以由浅入深全方位帮助学员增进对日语和日本社会文化理解，同时提高日语教学水平。此外，为期一年的进修中除了日常学习外，外务省邀请的为期一个月

表 2 “大平班授课科目情况”

必修科目	日语学概论、教育方法、语法(一)、语法(二)、声音理论、文学、翻译比较研究、阅读练习、听力、口语表达、精读(一)、精读(二)、发音、对话、错误案例研究、文字表达、语法(三)、声音练习、发音指导方法、文学史
选修科目	近现代文学、古典文学史、古典解析、古典语法、教学方法研究、发音、听力、对话、口语表达、声音理论、翻译比较研究、近现代文学解析、近现代文学史、词汇、教材研究、日本近代史
研讨会	语法、语义学、类义语表达、翻译比较研究、声音指导研究、近现代文学、口语表达研究、教育方法、古典文学、声音理论、视听觉教育

图表来源:根据“大平班的授课科目”,第 93 页制作。

的访日研修之旅也是重头戏。

根据日本早稻田大学博士孙晓英的研究,“大平班”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确立在华日语教育模式;二是培养中日友好人才;三是构筑“互相学习共同体”。[30] 其中,所谓“互相学习共同体”,指的是“大平班”的日本老师和中国学员之间的一种互学互进的关系。因为老师和学员都是日语教师,因此双方有很多共同话题,并且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彼此的沟通和交流就显得非常重要。其具体内涵如下图所示:

图表来源:根据“大平班‘互相学习共同体’的构筑”,第 210 页制作。

“大平班”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后,中日日语教育的交流纽带却并未因此中断,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的研究生课程就是“大平班”的延伸与继续。1985 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设立了“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大平班由此迎来了新的转折点,它将以日语教师培训事业为起点,发展成为新型综合性日语研究机构。按年代顺序可分为以下五个阶段:日语教师培训班——“大平班”(1980–1984 年);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日语研修课程(1985–2000 年);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在职日语硕士研究生课程(2001–2004 年);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课程——日本语言·日语教育专业(2005–2007 年);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课程——日语教育专业(2008 年至今)。[31]

四、结　语

国际日语教育作为文化外交的具体表现形式,不仅传播了语言本身,更对促进海外了解日本文化、树立日本国家形象、加强国际文化交流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日语教育已经

成为日本对外宣传、展示国家魅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同时,国际日语教育还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交流。庞大的留学生计划带动了日本国内市场,使教育成为日本新型的经济增长领域。[32] 从近期来观察,日本经济难以实现高速增长,政治外交和军事外交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文化外交仍不失为日本政府全盘外交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国家形象是影响国家间行为的软实力之一,提升国家软实力对缺乏军事硬实力的日本而言尤为重要。因此未来日本仍将以文化外交为手段,与日本的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相协调,最大程度地实现日本的国家利益。[33]

1979 年 12 月 7 日,大平正芳在北京演讲时提出"语言是促进国民间相互理解的有力手段之一。"[34] 国际交流基金也认为"增加懂日语的人数意味着增加世界上理解日本的人数。让外国人学习日语有助于扩大日本对世界的了解和认识。"[35] 语言是人类交流的重要工具,同时也在传递价值、增进交往、促进和谐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中国而言,以语言架起中外民心相通的桥梁,同样能够加深我国与其它国家的相互了解。其中,作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象征之一,孔子学院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如今,孔子学院日益成为我国提升国家形象和促进国际合作的重要渠道,作为中国与海外重要的交流平台,如何通过孔子学院向世界更好地阐释中国的文化、历史和政治,回应外国的误解和质疑,减少因误解而造成的冲突,从而为中国树立更有利的国家形象,是未来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

日本是我国的近邻, 并且两国无论是在传统历史文化还是国家发展历程方面都有很多相似之处。日本的国际日语教育发展对于作为中外人文交流重要一环的中国国际汉语教育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未来我国可以借鉴日本官民并举的推广模式,从加大政府投入、鼓励民间参与、探索多元化的推广方式、因地制宜制定推广对策、加强教师培养等方面入手。[36] 通过学习和借鉴日本经验,或许可以为我国海外语言教育发展提供一些启发,进而推动中国软实力的提高和文化外交的发展。国际汉语教育的推广有利于增进世界人民对我国语言和文化的了解、发展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最终为推动多元文明包容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3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加强人文交流,需要语言铺路,这意味着我国需要推动孔子学院进一步发挥作用,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

注　　释:

①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②胡文涛:《解读文化外交:一种学理分析》,载《外交评论》,2007 年第 3 期,第 55 页。

③日本外務省: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culture/index.html

④胡文涛:《解读文化外交:一种学理分析》,载《外交评论》,2007 年第 3 期,第 57 页。

⑤赵启正:《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11 年。

⑥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⑦丁兆中:《战后日本文化外交战略的发展趋势》,载《日本学刊》,2006 年第 1 期,第 118 页。

⑧平野健一郎「战後日本外交における〈文化〉」、渡昭夫编『战後日本の对外政策』、有斐阁、1991 年。

⑨内阁制度百年史编纂委员会『内阁历代总理大臣演说集』、大藏省印刷局、1985 年。

⑩新华社东京电讯 1983 年 9 月 10 日。

⑪和田纯「东アジアにおける日本の国际文化交流と文化外交」、添谷芳秀・田所昌幸编『日本の东アジア构想』、庆义塾大学出版会、2004 年。

⑫丁兆中:《战后日本文化外交战略的发展趋势》,载《日本学刊》,2006 年第 1 期,第 121 页。

⑬Nye, J,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⑭游国龙:《软实力的评估路径与中国软实力的吸引力》,载《现代国际关系》,2017 年第 9 期,第 21 页。

⑮波特兰公关公司:何为软实力? https://softpower30.com/what-is-soft-power/

⑯波特兰公关公司:日本 https://softpower30.com/country/japan/

⑰孫暁英『「大平学校」と戦後日中教育文化交流—日本語教師のライフストーリーを手がかりに—』、株式会社日本僑報社、2018 年。

⑱臧佩红:《日本近现代教育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 年。

⑲程志燕:《日本战后日语教育国际化》,载《日本问题研究》,2014 年第 3 期,第 68-69 页。

⑳国际交流基金:https://www.jpf.go.jp/j/about/index.html

㉑丁兆中:《战后日本文化外交战略的发展趋势》,载《日本学刊》,2006 年第 1 期,第 123 页。

㉒丁兆中:《战后日本文化外交战略的发展趋势》,载《日本学刊》,2006 年第 1 期,第 123 页。

㉓臧佩红:《日本近现代教育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 年。

㉔程志燕:《日本战后日语教育国际化》,载《日本问题研究》,2014 年第 3 期,第 68-69 页。

㉕McConnell D L, Watanabe Y. *Soft Power Superpowers: Cultural and National Assets of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monk, N.Y.: M.E. Sharpe, 2008, p56.

㉖国际交流基金海外日语教育机关调查:https://www.jpf.go.jp/j/about/press/2019/029.html

㉗徐一平　曹大峰:《中日教育合作实践与成效研究:以"大平班"和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为例》,学苑出版社,2013 年。

㉘服部龙二:《大平正芳的外交与理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年。

㉙徐一平　曹大峰:《中日教育合作实践与成效研究:以"大平班"和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为例》,学苑出版社,2013 年。

㉚孫暁英『「大平学校」と戦後日中教育文化交流—日本語教師のライフストーリーを手がかりに—』、株式会社日本僑報社、2018 年。

㉛徐一平　曹大峰:《中日教育合作实践与成效研究:以"大平班"和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为例》,学苑出版社,2013 年。

㉜程志燕:《日本战后日语教育国际化》,载《日本问题研究》,2014 年第 3 期,第 72-73 页。

㉝丁兆中:《战后日本文化外交战略的发展趋势》,载《日本学刊》,2006 年第 1 期,第 128 页。

㉞大平正芳「迈向新世纪的日中关系——寻求新的深度与广度」,外务省『昭和 55 年版我国外交的近况』第 24 号,1980 年。

㉟国际交流基金手册:https://www.jpf.go.jp/j/about/outline/img/Pamphlet.pdf

㊱程志燕:《国际交流基金与日本日语教育国际化及其对我国汉语推广的启示》,载《科教导刊(中旬刊)》,2018 年第 2 期,第 64-65 页。

㊲钟英华:《孔子学院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载《人民日报》,2018-06-22[2019-06-25],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eory/2018-06/22/content_52996125.htm.

(栾楚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胡令远)

日本对华新媒体外交特征及其影响力来源

——基于上海日领馆2018年度微信推送消息数据的分析

陈锦萱

内容提要 本文从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馆2018年度微信推送数据出发,对其消息名称、类型、文章来源、形式等信息进行分类整理和可视化分析。其主要特征是以日本历史文化作为主要抓手,形成系列化、体系化运营;日领馆以原创文章为主,自主性强;切割高娱乐性信息与高政治性信息的形式,找到严肃与亲民之间的平衡。究其影响力的成因,首先,上海的日资企业作为经济主体,为其提供了资金与场地便利,实现了经济搭台、政治唱戏的辐散效应;其次,日领馆微信推送的重点与日本国内的"观光立国"战略相契合,可以依靠母国的旅游资源将其宣传效果成功化为对日本形象的正向反馈,从而形成良性循环;最后,高级政治议题较少的领事馆身份也为发挥其文化灵活性,为构建领事馆本身独特的自主性和吸引力提供了政策上的余地。

关键词 公共外交 新媒体外交 上海日领馆 微信 日本

一、导 论

随着时代的进步,以互联网和移动无线网络为载体的数字新媒体正在成为国际话语权争论的平台,"推特革命"、"网络政务"等新兴概念不断出现,各国驻华外交机构基于新媒体的外交传播策略研究方兴未艾。刚刚过去的2018年对中日两国以及中日关系是具有纪念意义的年份。从纪念本国各自发展历程的角度来看,2018年适逢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和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从中日关系来看,则有《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缔结40周年纪念、李克强总理访日以及安倍晋三首相访华三件大事。中日关系发展交流不断推进,给研究日本对华新媒体外交的新局面、新特点提供了丰富的话语素材和宣传路径。本文基于近年来中日关系企稳向好的背景,对日本对华新媒体外交的特征及其影响进行评析。

本文以2018年日本国驻上海总领馆(下文简称上海日领馆)微信推送消息数据为研究对象,对其消息名称、类型、文章来源、形式等信息进行分类整理和可视化分析。本文旨在解决如下问题:上海日领馆作为日本对华领事业务的前沿阵地,其媒体宣传的特征如何?它是如何扩大话语传播影响力,从而实现其政治目的的?为此,文章首先对数据进行分类整理,并对消息进行可视化描述,梳理其特点,最后从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互动的层面考察其影响力来源。

二、文献综述

首先,对于"新媒体外交"这个跨传播学与政治学领域的非传统外交概念,学界已经提出

了一些概念阐释,对其产生的历史和传播特点也形成了一系列泛化共识与假设。新媒体外交(New Media Diplomacy)研究与网络外交(Network Diplomacy)的概念外延互有重叠,[①] 二者紧密相关,但相较于强调网络本身属性造成信息弥散化的网络外交,新媒体外交更强调将依赖新兴技术传播的各种传媒本身作为相对独立的特殊外交主体、其信息发布与话语策略都致力于捕获和影响小部分特定的受众群体,其针对性更为明显。主流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网络外交研究中或多或少都探讨了新媒体外交的一些特点,阿瑟·霍夫曼(Arthur S. Hoffman)的《国际传播与新外交》(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New Diplomacy)、[②] 马尔库斯·霍莫斯(Marcus Holmes)等人编选的《数字外交:理论与实践》(Digital Diplomacy : Theory and Practice)都对网络媒体外交与传统外交形式的关系、[③] 新媒体外交中固有的潜在权力动态、网络外交规范或约束外交政策的条件做出了框架性的阐释,但对时效性强、交互设计不断更新的新媒体外交传播情境缺乏精细化考察,从而削弱了其理论框架的解释力。

同时,新媒体外交还在相当程度上被认为是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的全新形式。区别于以职业外交官为操作主体、封闭性决策谈判过程、以外交家为关键角色的传统职业外交,新媒体外交更加亲民、开放,交互性更强,外交主题也由高级政治转向弥散性的低级政治议题,互动主体之间的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更小,[④] 因此更具公共性质。此外,新媒体外交由于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穿透性,往往被置于国家外交和安全战略的框架下进行考察,通过引导性的宣传进而实现国家的战略意图。[⑤]

在网络外交研究大行其道、新媒体外交概念方兴未艾以及研究案例精细化考察不足的状况下,以日本为考察对象、以公共外交为大背景的新媒体外交案例研究领域已经涌现了一批学术成果。在传媒主体选择方面,研究者主要聚焦在微信和微博两大平台,赵新利指出日本外务省有意在中国开展"微博外宣"的外交风险值得关注;[⑥] 杨宏明从日本驻华大使馆微博入手,指出其内容分为日本概况、日本消息和大使活动版块,运营人员与中国民众展开良性互动,多层次地介绍了日本社会、国家的情况;[⑦] 窦一鸣通过分析 2017 年日本驻华大使馆微博议题及其呈现形式,指出立足本土、灵活择题是中国可以向日本借鉴的新媒体外交经验。[⑧] 田弘则对美、英、日三国驻华使馆新浪微博 2015 年 1 月至 6 月半年数据进行比较研究,认为相较于希望赢得中国民众好感的美国和重塑大不列颠形象的英国,日本官方将外交重心放在消除疑虑、和平发展。[⑨] 罗豪、谢梓飞则以日本驻华使馆微信公众平台 2017 年信息为抓手,认为其具有传播内容广泛,舆论回应迅速,议题设置巧妙和信息传递准确的显著特点。[⑩]

总的来说,既往针对日本在华新媒体外交的研究呈现出三大特点:首先是对去中心化较强的微博平台关注度较高,对新兴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文章关注较低。这一方面与微博平台的特点有关,数据开放性、传播即时性使得其积累了庞大数据,"反爬虫"等隐私安全机制少也使得其研究门槛较低,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新兴平台的热门程度与学术关注度不匹配,需要得到重视。其次是对大使馆的研究较多,而对领事馆、民间团体的研究较少,案例主体同质性高,不利于研究的精细化。第三是研究切口小,时效性强,以议题整理和浅层分析为主,对话语背后的政治意图分析还不够明晰。

从这三方面来说,通过年度累计数据研究上海日领馆在微信平台上的外交话语和政治风险都有其意义。本文将试图在汲取和继承网络外交研究较为成熟的基本框架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增加对新外交媒介、新外交主体的考察,为对华新媒体外交研究提供一个新案例,也为把握新时代的外交信息革命机遇,减少中日关系的疑虑分歧、行稳致远提供一定参考。

三、基于微信消息数据的描述性分析

（一）上海日领馆微信数据采集类型

本文针对日本国驻上海领事馆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微信公众号文章数据进行了收集整理，合计有效数据 297 条，采集信息类型分为发布基础信息（时间、标题）、发布内容信息（活动和信息类型）、发布来源信息（传播主体）、发布形式信息（外交形式）四个方面。具体类目为发布日期、名称、活动类型、信息类型、文章来源（原创、转载自商业公司、转载自其他团体）、文章形式，具体见下表。

表 1　上海日领馆微信外交数据采集分类

活动名称	示例：高岛屋人偶展 / 笈川幸司演讲 / 安倍总理春节致辞
文章形式	仅文字 / 文字与图片 / 文字与视频 / 文字、图片与视频
文章来源	个人投稿 / 民间交流类原创 / 领馆政治类原创 / 转载自商业公司 / 转载自官方发布 / 转载自其他自媒体
活动类型	日本饮食 / 日本音乐 / 日本艺术 / 行业交流 / 日本戏剧 / 日本体育 / 日本影视动画 / 日本语言文学 / 日本历史文化 / 领事出席活动 / 日本国内事务 / 旅游留学介绍
信息类型	日本饮食 / 日本音乐 / 日本艺术 / 日本观光 / 日本舞蹈 / 行业交流 / 留学介绍 / 零售业活动 / 日本影视动画 / 日本语言文学 / 日本历史文化 / 领事出席活动 / 领事政治信息 / 往期活动回顾 / 抽奖名单公布 / 国际活动信息 / 领事馆文化信息 / 公益人权慈善信息

（二）上海日领馆微信数据描述

我们将日领馆的 297 条消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领馆自办活动（即表中“活动类型”），直接目的是招募对日本相关话题感兴趣的个人，在领馆或主办地点进行实地体验；第二类是非自办活动的信息发布（即表中“信息类型”），用于间接宣传日本国家形象。

在全年 71 次自办活动中，日本艺术活动最多，举办共 14 次，占总数的 20%；其次日本历史文化讲座活动（12 次，17%），以及各类日本语言文学讲座（9 次，13%），这三部分内容占全年活动一半。除此之外，行业交流活动和饮食品尝活动各占比 10%左右。

上海日领馆在自办活动方面倾向于以日本文化作为主要宣传对象，其覆盖领域包括艺术、历史、文学等大众兴趣度较高的领域，特别是在艺术领域，不仅有表千家、里千家、小笠原流等高级茶道活动，也有诸如风吕敷包装体验、日本漫画阅读讲座等较为普及的大众活动，充分考虑到了受众知识文化水平的不同。人偶展、和菓子视觉艺术秀等活动与久石让遇上村上春树演讲、东京国立博物馆介绍会等活动交叉开展，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博取好感度，从而潜移默化地增进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兴趣，加深对日本的理解。和食免费品尝活动、日本酒试饮体验活动等更是成为其常态化运营手段，以门槛较低的标准来增加中国民众与日本文化相关内容的接触。

在全年 226 次信息发布或转载中，日本历史文化信息发布频率最高，共 39 次，占到 17%。日本历史文化信息板块除去零散文章，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运作模式：日本夏日祭文化系列（共 3 篇）、日本传统颜色系列（共 10 篇）、日本书信礼仪系列（共 4 篇）、日式纹样系列（共 2 篇）和最热门的日本方言竞猜系列（题目篇与答案篇各 9 篇，共 19 篇）。由于方言竞猜

的形式隔离了大部分兴趣群体，长期关注者往往有较好的日语水平，甚至有在日生活的经历，这种以视频为主体的方言猜谜形式提高了深度用户的参与度和媒体粘性，以答案公布、例句解读和日本地方美景介绍的答案篇也促进了这部分“知日者”对日本地方的深入了解。⑪

除历史文化信息外，日本艺术（28 次）、领事政治信息（25 次）、日本语言文学（23 次）和日本观光信息（17 次）各占信息总数 10%左右，较重要的还有领事馆文化信息与日本饮食信息，全年共发布 15 次和 13 次。在这些类别中也出现了知识连锁化、系列化的趋势，如日本饮食类目下的日本乡土料理系列和伴手礼食品介绍系列；领馆新闻文化中心的新刊上架推荐也成为推送长期主题，这使得领事馆本身的角色由传播外交信息与日本知识的单一中介转向文化认知意义上的独立主体，附加上了独特的文化意涵，延展了领事馆的政治外交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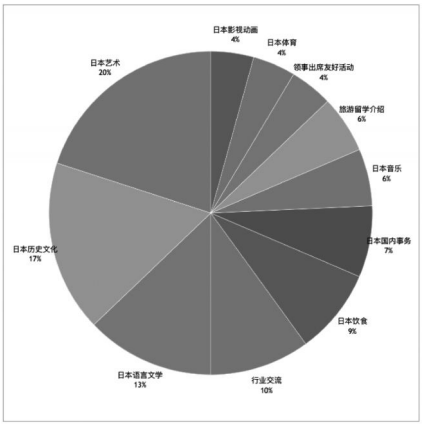

图 1　2018 年上海日领馆主办活动分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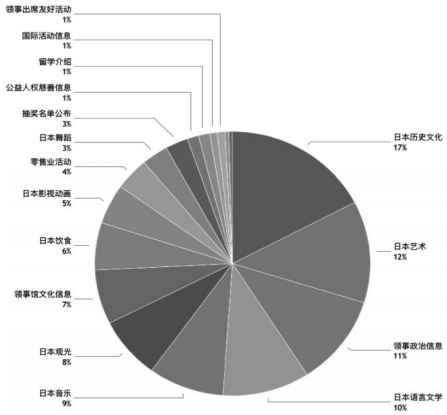

图 2　2018 年上海日领馆信息发布分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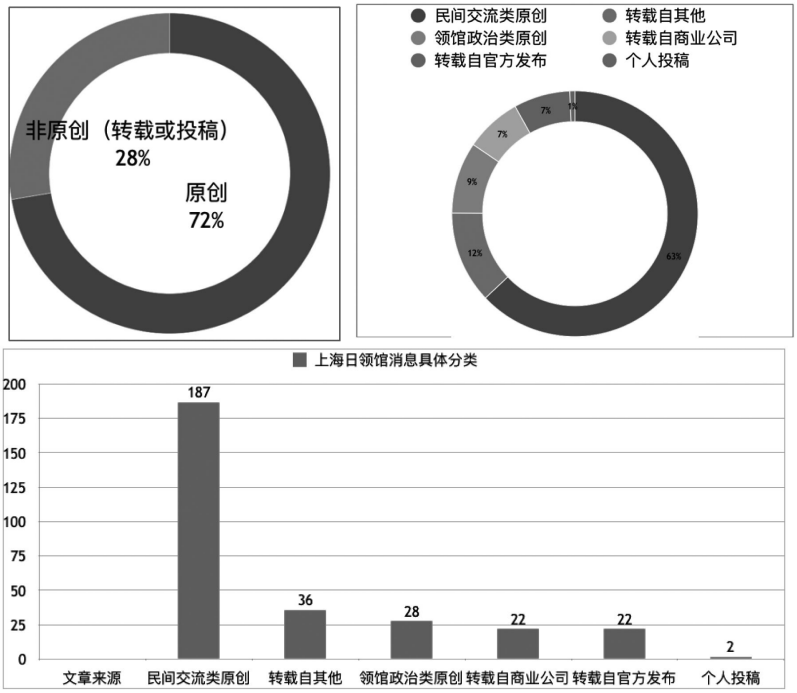

图 3–5　2018 年上海日领馆消息来源分类图

在文章来源方面，上海日领馆 70%以上文章均为原创图文，另有 30%来自其他公众号消息。在转载主体的选择上，除大使馆官方重要通知与致辞之外，上海日领馆倾向于选择两类主体：第一类是在华大型日企或商会组织，如“万代南梦宫中国”(Bandai Namco Games China)、“梅龙镇伊势丹百货”、“清保贸易”等，通过政商联结、经济搭台政治唱戏的辐散效应增强传播效应；第二类是华文民间娱乐信息自媒体，如“海日娱乐传媒”、“次元光线”、“锦辉传播”、“天协艺文展览”等，可见其官方政治化色彩较弱，亲民意味较强，希望将不了解日本或不愿了解日本的潜在受众引流分流到感兴趣的议题上，从而减少隔阂和分歧，塑造日本的正面形象。

具体来看，民间交流类原创消息有 187 条，比例达 63%；其次是转载自其他团体上网消息，占比 12%；政治类原创全年共有 28 条，占比 7%，条目较少，但涉及重大事件，因此外交重要性较高，其中有“为上海海外联谊会中日分会剧班总领事表彰仪式”、“日领事出席汶川大地震十周年纪念”、“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横井裕大使致辞”、“进博会期间新闻文化中心开放通知”等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转载自官方发布(即日本国驻中国大使馆)的信息占比较低，侧面说明上海日领馆并非完全是大使馆的政治传声筒，有自己的话语独立性。领事馆与大使馆在外交信息传播的政治分工中存在着显著差异。

另外，来源于商业公司的转载文章在消息中与来自官方的转载消息占比相同，这显示了日本驻华领事馆不仅需要密切关注官方消息，也需要与在华日商、日企保持联络，促进其发展，领事馆在承担政治任务的同时也承担着经济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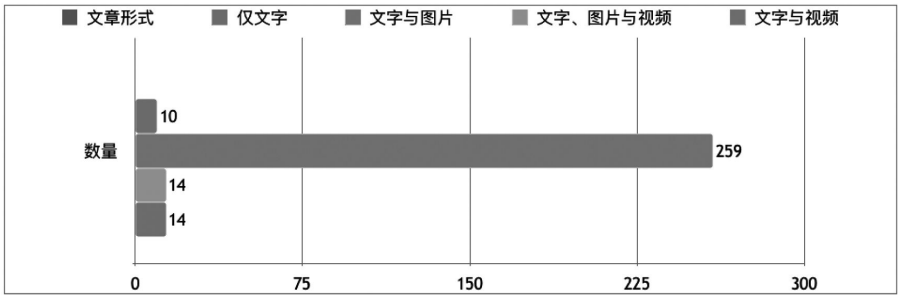

图 6　上海日领馆微信消息形式分类图

在信息形式方面，图文并茂，文字为主，视频为辅是上海日领馆微信文章的一大突出特点。以文字和图片为载体的消息议题覆盖面广，占绝大多数；视频往往作为辅助传播手段使用，出现较少，且往往出现在对日本流行乐团活动的宣传消息中；纯文字消息最少，但也往往与最重要、最正式的高级政治议题联系在一起，例如“2019 日本节假日安排及会议通知”、“进博会期间新闻文化中心开放通知”与“东日本大地震七年纪念致辞”都属此类型。含视频的消息绝大多数为日本音乐相关信息和方言竞猜系列视频，属于低级政治议题，仅有“福岛核电站情况信息”与“东日本大地震七年纪念致辞”在纯文字消息后另外推送一篇除简短介绍外的纯视频消息，由于视频形式增加了信息传输成本，会过滤掉部分受众，单独推送视频表明这两个议题不仅在高级政治上具有敏感度，也受到民众的普遍关注。

基于上述描述，上海日领馆在过去一年内自办活动以日本历史文化艺术活动为主，辅以行业交流、饮食品尝活动；普及日本历史文学和商业活动信息，及时发布领事政治相关通知，成为日本在华外交传播的中介者。同时，日领馆通过领馆新闻文化中心的图书区新刊推荐形

式,打造领馆自身独立的文化吸引力,旨在营造品牌,侧面提高民众对日本的兴趣指数和好感度。在信息转载主体与协办方选择上,领事馆与各商业主体之间政商连结的线索非常明显;在不同信息的政治意涵与类型的对应之间,日领馆也较好地把握了严肃性与娱乐性信息的分野,起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四、日本对华新媒体外交的优势与不足

通过对上文数据类型以及具体内容的分析,接下来我们将从三方面考察上海日领馆微信数据体现出的日本对华新媒体外交特点,从而更好地理解其获得和扩大话语影响力背后的支持因素。

(一)政商联结为领馆外交提供资金基础

首先,政商联结的强大后台是日领馆文化活动的资金保证和动员基础,其互动存在着隐含的利益交换色彩,同时提供了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产品,从而形成了互惠互利的良性循环。由于历史现实的种种原因,中国民众对日本国家态度总体普遍不佳,免费送出各类福利(包括书籍、演唱会门票、饮食、购物优惠)便成为了日领馆在华进行政治推销、拉拢对日兴趣指数原本较低甚至反感的中国民众的基础手段。但是,领事馆无法依靠自身提供日本在华广受欢迎的化妆品、动画产品、艺术品等产品,其与商业的连结就不可避免,也十分牢固。隐含在化妆品小样和大米优惠券的背后,是上海诸日企的强大经济实力及其实用拥趸,这就带来了政治传播所需要的关注度。

数据显示,"万代南梦宫中国"、"梅龙镇伊势丹百货"、"清保贸易"和"高岛屋百货"可以说是上海日领馆自办或协办活动背后的商业四巨头。万代南梦宫作为拥有海贼王、高达、数码宝贝、刀剑神域、火影忍者、JOJO、全职猎人等 IP 的日本老牌游戏动画公司,2015 年 1 月在上海成立公司,至此正式进入中国内地。[12] 这样的商业背景使得日领馆有机会借助其资源举办其主推的文化艺术类活动,吸引中国年轻人特别是学生了解日本,引导其建立日本国家的正面印象,例如日领馆直接以转载文章的形式支持了万代南梦宫中国"圣诞日本歌手 BBOX 演出"和"特殊儿童皮影展映会"的活动。同样,伊势丹(Isetan)和高岛屋(Takashimaya)作为老牌百货公司,在上海积攒了强大的人脉和商业实力,其优势主打是高端品牌百货,也为"嵯峨御流中日联合花道展"、"高岛屋人偶展"、"高岛屋大米试吃售卖活动"提供了活动场所。清保贸易(Shimizu)作为日本法人独资企业,更是担当了"第三回日本酒试饮活动"、"日本酒企业商业对谈"、"魅力日本再发现圣诞节特辑"等活动的主场布置。

(二)"观光立国"战略为领馆旅游宣传提供持续动力

领事机构的宣传重点与国内大局的相互匹配是保持领事外交信息富有持续吸引力的重要保证之一。日本早在 2003 年 4 月提出观光立国战略,[13] 其后又在坚持基本战略判断的基础上多次调整政策重心,2012 年日本国土交通省观光厅(Japan Tourism Agency)发布《观光立国推进基本计划》,[14] 2017 年自民党竞选政权公约也将"观光立国"作为其政策的重要部分,放在"经济再生"这一首要板块中。来自日本观光厅的数据显示,2015 年中国大陆访日游客占总比约为 25%,台湾地区访日游客占比 18%,总和超过 40%,是日本旅游第一大客户群体,同时中国大陆游客访日游客占比略有增加。

除观光厅以外,日本国家旅游局(Japan National Tourism Organization, JNTO)针对中国

游客推出从商业会议到散客自由行的多种旅游选择，[15]在春秋两季提供详尽清晰的樱花、红叶赏景时间预测与旅游指南，冬夏两季则以花火、雪景和灯饰作为主打，自 2015 年开始连续三年主办‘环游日本 VISIT JAPAN’中国人游日本摄影大赛，与中国官方媒体人民网联动推广旅游美景，[16]积累和输出了大量详实丰富、时效性强、图片精美的中文旅游介绍资料，这些都为领事馆制作信息量较小、旨在引起中国人赴日兴趣的旅游介绍提供了广泛的素材储备与关注热度。

总的来说，日本政府将中国游客作为招揽重点之一，以期提高日本全土特别是东北地区的旅游景气程度。上海日领馆作为推进“观光立国”战略的具体执行机构之一，通过推送的形式，配合日本政府大力开展赴日旅游的宣传活动，同时也提升了自身的影响力。

（三）领馆身份为营造主体自身亲民形象提供政策余地

日领馆发挥了在外交系统中独特地位的优势，以不断发布领馆新刊的形式踏出了塑造领馆本身文化形象的第一步，将自己的作用从传统中介者提升到相对独立的文化行为体。相比大使馆，领事馆承担高级政治领域任务（如接待国家首脑、进行军事安全领域磋商等）的机会相对较少，与容易激发国内强烈紧张动荡的议题联系较松散，这使得领事馆的外交身份与民间文化艺术交流等低级政治议题有强烈契合度，也给其自身带来了文化交流上的灵活性和相对独立性。一年来，上海日领馆在 2 月 5 日、4 月 13 日、4 月 20 日、5 月 17 日、8 月 16 日、9 月 3 日、9 月 20 日共发布了 7 篇领馆新刊上架消息，鼓励普通民众进入领馆区域读书借阅，这在一定程度上增添了领馆的亲民程度，消解了隔阂感。

目前中日关系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改善，根据中国外文局和日本言论 NPO 共同实施的 2018 年“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民众对日本持有好印象的占比约为 40%，创造新高。究其原因，中日关系缓和所起到的作用固然不容否定，诸如领事馆等公共外交在塑造亲民形象、引领中国民众对日认知等领域也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中国民众对日认知的转型。那么，从结果来看也为日本制定对华政策提供了较好的舆论空间。

总而言之，坚实的资金支持和商业伙伴带来的稳定流量；旅游推荐与本国重点战略的相互配合；灵活地发挥领馆身份优势塑造主体吸引力，这三点使得上海日领馆在日本对华交流信息发布及领馆自身文化形象塑造方面有独特优势。

五、结　论

本文从 2018 全年上海日领馆微信推送数据出发，对其消息名称、类型、文章来源、形式等信息进行分类整理和可视化分析，旨在解决以下两个在逻辑上连贯的问题：作为日本对华领事业务的前沿阵地，上海日领馆的微信新媒体外交特征如何？它又是如何扩大话语传播影响力，从而实现其政治目的的？对于第一个问题，笔者总结出以下几个方面：在文章内容来看，上海日领馆在自办活动方面倾向于以日本文化作为主要宣传对象，其覆盖领域包括艺术、历史、文学等大众兴趣度较高的领域，其历史文化信息与艺术类信息已经形成系列化、体系化运营；在文章投稿者方面，日领馆以原创文章为主，转载和个人投稿较少；在信息形式上面，日领馆将高娱乐性信息与高政治性信息切割开来，找到了严肃与亲民的外交平衡。

对于第二个问题，则可以作如下考虑：上海日企作为经济主体，为日领馆开展外交提供了诸多便利，特别是资金与场地方面，实现了经济搭台，政治唱戏的辐散效应；其次，旅游观

光、日本国内灾害信息通知与签证事务这些日领馆微信外交重点与日本国内的“观光立国”战略相契合,日领馆能够依靠本国旅游资源将其宣传效果成功化为对日本形象的正向反馈,从而持续推广,形成良性循环;高级政治议题任务较少的领事馆身份也有助于其灵活运用多样形式,提升领事馆本身独特的自主性和吸引力提供了灵活变通的余地。

对于进一步塑造中国的大国形象来说,日本的对华新媒体外交的经验无疑值得尝试,前文所述中国外文局和日本言论 NOP 的 2018 年舆论调查显示,虽然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印象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但是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好印象只有 13%,中国对日公共外交仍然有更多任务要做,而使领馆这种“接地气”的新媒体外交无疑有助于树立中国的正面形象。据此,开发更加灵活多变的外交路径,如政商结合、旅游先行、培养领馆自主文化,同时管控好外交话语投放的细节,真正做到保质保量,才能够使中国的国际形象更为饱满丰富,从而破除既往偏见,打破话语霸权,使得中国与世界各国关系行稳致远,为中国与世界发展创造一个友好和谐的大环境。

注　　释:

①关于网络外交和媒体外交的分野,可参见北京大学胡泳.新媒体时代的公共外交[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09):104-109;臧红岩.国外媒体外交研究的几个维度[J].广西社会科学,2014(05):136-140。

②Hoffman, Arthur 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new diplomac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8.

③Bjola, Corneliu, and Marcus Holmes. *Digital diplomacy: Theory and practice.* Routledge, 2015.

④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概念来自吉尔德·霍夫斯泰德(Geert·H·Hofstede)的文化交流理论,作者以大量的数据和事实,分析了全球范围内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五个维度上的差异,并运用五维度模型剖析了政治体制、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法律制度等的文化根源,权力距离表示的是地位较低的人对社会中地位较高的人的看法,也即对这种社会不平等的容忍程度和处理方法。笔者引用这一概念,是为了说明新媒体外交包含社会学意义上去中心化和社会平等的意涵。详见其《文化与组织:心理软件的力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

⑤吴限.日本新媒体对华外宣探析:战略、路径与特征[J].日本问题研究,2018:2.

⑥赵新利.新媒体视角下的日本对华“微博外宣”[J].青年记者,2014(28):54-55.

⑦杨宏明.“小国脖”织出“大外交”——以日本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为例 [J]. 青年与社会,2014,(13):

286-286,287.

⑧窦一鸣.日本对华公共外交策略探究——以日本驻华大使馆微博公众平台为例[J].新闻研究导刊,2017,8(20):117-118.

⑨田弘.外国驻华使馆微博外交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16.

⑩罗豪,谢梓飞.日本对华新媒体公共外交——以日本驻华使馆微信公众平台为例[J].国际研究参考,2018(04):21-26.

⑪方言猜谜篇的谜题和答案篇推送消息阅读用户数基本一致，由此推断其受众兴趣较为稳定，粘性较高。

⑫万代南梦宫是如何经营中国市场的？http://www.9game.cn/news/1879760.html,登录时间:2018年1月4日。

⑬観光立国ショーケース,http://www.mlit.go.jp/kankocho/shisaku/kankochi/kankouchiiki.html,登录时间2018年1月9日。

⑭観光立国推進基本計画:http://www.mlit.go.jp/kankocho/kankorikkoku/kihonkeikaku.html，登录时间2018年1月10日。

⑮日本国家旅游局(中国):http://www.welcome2japan.cn/,登录时间2019年4月1日。

⑯人民网·日本频道·2018中国人游日本摄影大赛:http://visitjapan-photocontest.people.cn/2018/GB/index.html,登录时间2019年4月1日。

（陈锦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本科生　　责任编辑:王广涛）

《你的名字。》的解读与启示

赵彦志

内容提要　日本动漫电影在亚洲乃至全世界都占有重要席位。2016 年 8 月由新海诚导演制作的《你的名字。》在票房及口碑上大获成功，创下了亚洲动漫的新纪录。当下，我国已成为世界电影不可忽视的重要市场，《你的名字。》的成功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本文将在解读影片的同时提供相关思考。

关键词　动漫电影　《你的名字。》　空间　时间　文化

新海诚导演的动漫电影《你的名字。》于 2016 年 8 月 26 日首映后，先后在全球 125 个国家和地区发行。该片最终获得了口碑及票房的双丰收，除了将世界多个重要动漫奖项收于麾下外，[①] 其全球总票房亦高达 2 亿 8100 万美元，这个成绩使它一度成为日本票房史上收益最高的电影，创下了亚洲动漫的新纪录。[②]

《你的名字。》讲述的是一个叫“宫水三叶”的乡间少女和素不相识的住在大都市东京的男高中生“立花泷”之间发生的灵魂互换的故事。这类题材电影在当下并非罕见，该片能卓然独立收获如此巨大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带着这个疑问让我们首先把目光聚焦到国际市场，包括真人电影在内，很多知名导演从不同角度对灵魂互换和时空转移题材进行过尝试。如：韩国导演李炫升曾拍摄《触不到的恋人》(2000)，受其影响美国导演亚历桑德罗?阿奎斯提拍摄了相同题材的《触不到的恋人》(2006)；以北美好莱坞制作为主的有《黑洞频率》(2000)、《变身辣妹》(2003)、《阿凡达》(2009)、《互换身体》(2011)、《X 战警：天启》(2016)、《九条命》(2016)等，我国近期有《变身男女 / 假如我是你》(2012)、《羞羞的铁拳》(2017)等见于各大院线。再回到日本，知名导演大林宣彦曾在 1982 年拍摄了《转校生》，[③] 他本人在 2007 年又重新进行了拍摄。新海诚导演曾公开表示自己是在尊重《转校生》及高桥留美子漫画《乱马》的男女互换身体情节的同时创作了《你的名字。》。[④] 该片前 45 分钟以“男女换身”为主，趣味性较强；后 45 分钟以“拯救镇民”为主，[⑤] 节奏感较强。新海诚导演以时间和空间为线索将前后情节有效地连接在一起，凸显了该片的特色，并最终获得了观众们的认可。

不管何种形式的灵魂互换，其本质探讨的都是有关生命体的“灵魂”与“肉体”是否可以分离的问题，无疑这是长期困扰我们认识自己的问题之一。在科幻类题材的电影里导演们可以尽情地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塑造出各种不同荧幕形象呈现给观众。当下这类题材仍然是各国争拍的热点之一，如何“拍出特色，推陈出新”则是成功的关键。

一、影片成功的原因分析

作为该片票房“主要贡献国”的日本(250.3 亿日元，约 15.3 亿人民币)，韩国(29.6 亿韩元，约 1.7 亿人民币)和中国(约 5.76 亿人民币)，各大媒体对其成功原因纷纷给予了关注：日本国家电视台 NHK　<クローズアップ現代 > 节目认为：[⑥] (1)新海诚导演至今制作了多部

描写青春男女爱情的影片,对这类题材比较熟悉。[7](2)网评数量在上映的前几周发生了戏剧性变化,起到了很大的助推作用。(3)画面美,满屏灵动的现场感,人物刻画生动活泼。(4)每个镜头平均 3.9 秒,画面总数达到了 1650 次,比一般的动漫有更强的速度感。能让观众在关键情节始终保持紧张状态,代入感较强。(5)年龄层方面突破了导演最初设定的 10 至 20 岁,上映后半场时年龄大的观众群也被吸引过来。(6)导演充分活用了平安时代日本文学中的传统换身故事,观众们有较强认同感。[8](7)经历了 3.11 东日本大地震等自然灾害后,日本国民在寻求复兴的过程中对于"集体生活,家族传承,羁绊"等概念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观众对片中"外婆"数次提到的"产灵"(結びmusubi)的意义产生了广泛共鸣。

韩国在线媒体 HARBOR BUSINESS Online 1 月 22 日报道:[9]《你的名字。》在韩国的观影人数已突破 367 万 3885 人,打破了宫崎骏导演《哈尔的移动城堡》(2004)创下的 301 万 5165 人记录,成为排名第一的日本电影。成功原因总结为:[10](1)影迷们被片中充满幻想与感性的情节所感动,顺利上映既满足了影迷们热切的期待也吸引了大批新的动漫粉丝加入,票房高开高走,为近期韩国电影市场带来了新的活力。[11](2)『新海誠、その作品と人』一书中刊载了新海诚和岩井俊二两位导演的对谈,[12]新海导演承认在影片中有多处对岩井导演致敬的情节。《你的名字。》在制作过程中恰逢岩井导演的《花与爱丽丝杀人事件》上映,对影片制作产生了多处影响。可以认为是两位导演的独特叙事手法感动了韩国影迷。(3)另外,还应该考虑到韩国目前盛行的御宅文化的影响。按照 1 月 20 日 CVG 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20 岁男性观众占比为 42.7%, 御宅人群的特点是会多次观赏影片,SNS 上甚至有人公布自己已经看了 17 次。另外,新闻报道显示有观众在观影中哭泣,或者一起歌唱,这样的报道也进一步助推了人数的增长。

《你的名字。》由彩条屋影业签约引进中国,华夏电影发行。送审通过后定档 12 月 2 日,是新海诚导演在中国上映的第一部动画电影。[13]每日新闻(2017.1.23)在市场调查结束后做出如下分析:(1)新海诚导演的纤细缜密的画面风格在中国有极高的人气。(2)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的秦刚教授认为:影片中表达的那种为了追求珍贵的东西而与现实抗争的热情,在国内的直面考试及竞争的年轻人群中产生了广泛的共鸣。(3)前期网络话题的炒作与扩散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仅微博里关于该片的评论就达到了 140 万条。(4)影片上映期的大幅度提前也助推了人气。为了尽早通过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审查,与北京光线传媒的合作是不可或缺的。光线传媒全国拥有 7000 多块屏幕,排片数量确保了观影人数的大量增加。

综上,《你的名字。》获得的巨大成功对于正处于探索中的中国动漫人来说具有什么样的参考意义呢?据中国产业信息网提供的数据,我国电影市场总票房在 2017 年达 599.11 亿元,超过北美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14]但纵观国内动画电影票房排行榜 Top10,仍处于被美国及日本影片占据大半江山的境地。本文试通过解读影片中的诸多疑点,探讨新海诚动漫《你的名字。》带给我们的启示。

二、关键词"名字"

"名字"无疑是该片的关键词,其中出现的人名与地名,既有真实存在也有虚构的,后者是需要我们积极关注的部分,其中往往隐含着推动情节走向高潮的重要线索。

(一)片名

《你的名字。》日文原名是《君の名は。》(kimi no na wa.),从日语角度分析,这是半个疑问句,且不是日本人生活中询问别人名字时的表达方式。[15] 从片名看,它与上世纪 50 年代日本热播的爱情剧《君の名は》几近重合,不同之处仅为最后的标点“句号”,这种特殊的命名方式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1952-54 年间,日本 NHK 播放了著名剧作家菊田一夫的广播剧『君の名は』,之后大庭秀雄导演在 1953-1954 年间先后拍摄了同名电影(第一,第二,第三部,共计 6 小时)大获成功,街头巷尾甚至出现了万人空巷的局面, 观影人数达到 3000 万 (当时日本总人口不到 9000 万),票房收入共计 9 亿日元。理论上平均 3 人中就有 1 人走进影院,这在现代社会几乎难以想象,它所反映的是日本国民对于纯真爱情的追求与向往。片名的几近重合可以推测新海诚导演在向 1953 版影片致敬的同时,基于观众的心理需求,拍摄出了同类题材的动漫电影并受到了再次的追捧。与 1953 版相同,《你的名字。》在正式上映前尽可能地做足了预热。除提前发行配乐外,[16] 导演亲自执笔的同名小说也早于影片两个月出版发行,一流的团队创作在预热上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从影片上映的前两周开始,网评数出现了直线上升的态势,这无疑是预热的效果显现。至此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时代有着较大差别,1953 版与 2016 版在前期预热的做法上如出一辙。两部影片唯一“。”的区别也隐含了迎合当下日本流行趋势的意图,近年很多艺人都在自己的艺名后加注了含有特殊意义的标点符号。笔者在网络上可以查到的各式艺名中含标点的数量多达 50 种以上。知名度较高的如:「モーニング娘。」(早安少女组。)「ゲスの極み少女。」(极度卑劣少女。)「藤岡弘、」等等。

(二)地名

故事发生的最重要地点 - 彗星坠落的镇叫「糸守町(itomorimachi)」。这个地方并不存在于真实世界,是导演虚构的。如将这一构词分拆来看:「糸(ito)」字是本片的主线,对应的是贯穿全片的关键词「結びmusubi」。「結び」译成汉语是“连接”的意思,为抽象义,表达的是世间万物的内在联系。这一概念在片中的具体物象为“头绳”,它连接起了男主与女主从而确保了换身行为的顺利进行。另一个是“守(mamori)”字,可以解释为“守护,守卫”的意思。片中提示:糸守镇是一个一千多年前曾遭受过彗星撞击的地方,这次天灾的到来是对人类的再次考验。一对青年男女通过换身行为觉察到了危险,最终合力确保了镇上人员的安全转移。“糸守”二字进而可以理解为导演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即希望年轻人能够保护并传承下去。

影片的另一地名「飛騨(hida)地区」是真实存在的,位于岐阜县且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著名的传统节日“高山祭”于每年 4 月和 10 月举行。重要的是这里还流传着各种妖怪的传说,是许多写怪奇小说的舞台。[17] 新海诚导演出生于长野县(与岐阜县毗邻),应该对当地的文化民俗活动早已有所了解。历史上曾有“飞弹国”,位于现今的岐阜县北半部分,与今天现实中的“飞弹市”不完全相同,古代的“国”级别相当于今天的县,一般面积要小很多。

(三)人名

对人类而言“名字”到底意味着什么,“姓”是归属是集合,“名”是个体是唯一。名字不仅仅是人类自身内在情感与品质的容器, 也是一个与他人建立联系, 让自己存在于世界的基石。现代社会的我们尽管除名字外,还有各种身份凭证具有很强的唯一性,例如:出生证明、身份证、护照甚至手机号码等。这些单纯的字母数字罗列仅仅显示的是个体与社会整体的关系,不能解释为个体间存在的连接意义。

男女主角的姓名分别为「宮水 三葉(miyamizu mitsuha)」「立花 瀧(tachibana taki)」。他们

在片中仅称呼对方的名字,即“三叶”“泷”。这种称呼方式虽然符合日本年轻人的习惯,但也因姓氏部分的省略使得观众未能注意到他们全名的巧妙之处。先看女主:“宫水”是家族的传统姓氏,是神社的继承符号,外婆是宫水一叶,妈妈是宫水二叶,妹妹是宫水四叶。片中宫水为神社的代名词,也可理解为供神灵使用的圣水。再看女主的名字部分,“三叶”的日文发音为「三葉(mitsuha)」,据『日本国語大辞典』里解释其原意为“水神,水的精灵”,[18] 至此可以看出“宫水三叶”与“水”有着颇深的渊源。片中出现的拖着长尾的彗星,其名字为「ティアマト彗星」(提亚马特彗星),提亚马特是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的海神,为女性,亦被称为“龙”。男主的日文名字为「瀧」,龙离不开水,也可视作水神;偏旁三点水既可表示与水的不可分割关系,也暗示了“三”的存在。男主的姓为“立花”,日文中与“橘”同音,后者原意是一种被称为“神木”的植物,现实中多生长在神社域内。[19] 此外还可以发现他们二人 “姓”与“名”的部分是彼此交错对应的。即“宫水与瀧”“三葉与立花”分别代表了水与木。当泷喝下口嚼酒(代表三叶的另一半,其成分亦主要为水)时奇迹终于再次发生,二人实现了最后一次换身。片中三叶跳巫女舞时,手持的法器及头饰上皆带有金龙图案,暗示了二人互为存在的关系;夜晚彗星拖着长尾划过天际及泷喝下口嚼酒跌倒时看到的彗星等场景,画面上均突出了龙的体型特征。

三、影片的制作特点

(一)清新画面

《你的名字。》上映前,日本国内动漫票房排名前十基本被吉卜力工作室垄断,对新海诚导演来说,如何突破既成模式是非常关键的。区别于吉卜力,新海诚作品一般不出现夸张的面部特写,人物刻画更接近真实的人类:害羞时的脸颊绯红,换身后对异性身体支配的不自然等表现均恰到好处,这些细节对于观众来说会有较强的代入感。

从舒适安静的田园高中到喧嚣的东京街头, 从拖着长尾的彗星划破天际到宏大的湖泊旋转式呈现,画面都是明亮且灵动,整体干净而不缺主次,让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与新海诚导演的前期工作经历不无关系。他曾在游戏公司工作多年,对画面的设计有自己独特的手法。

(二)浓厚的生活气息

片中出现的道具及其它情节设定都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例如二人换身过程中彼此联系的重要工具手机:2013 年三叶使用的是苹果 5,2016 年泷使用的是苹果 6; 泷和奥寺前辈一起约会时参观的飞弹影展:照片用的都是黑白色调,暗示了对那场灾难的纪念;泷在找到系守镇遗址时看到的警示牌:写着『災害対策基本法』这是 2011 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才成立的法案;片中的时间线索非常隐蔽:除手机外,还有的写在三叶教室的黑板上;三叶的国语老师是新海诚导演之前的作品《言叶之庭》的女主雪野百香里,配音演员同为花泽香菜。

(三)片中“三”的隐性表现

(1)首先“三叶(水神)”的名字设定即显示出古代日本人对这个数字的敏感度。(2)男女主角相隔“三年”;(3)初次及最后见面时均相差“三岁”;(4)从各方人物数量来看,宫水一家为“三人”,分别是外婆,三叶和四叶;(5)男女主角各自好友的数量皆为“三人”,三叶方有敕使和早耶香,泷方有司和高木;(6)寻找系守镇的路上有“三人”- 泷,奥寺和司;(7)故事发生的主要时间为“三个时间段”,2013 年,2016 年,2022 年。(8)此外,本片大致分为“身体互换”“寻找系守镇”和“拯救镇民”三个重要部分;新海诚导演之前的作品中也出现过三部曲《秒速

五厘米》。[20]

（四）合理且有新意的情节

影片前 27 分钟是三叶视角，后 78 分钟切换成了泷的视角，情节安排上由轻松欢快至紧张忐忑，整体松弛有度。影片在镜头的剪接上除空间变化外，时间上也出现了两条线的交叉进行，初次观看会有些理解困难。但即使不能充分理解细节，观影后“青春男女的身体交换”及“合力拯救镇民的紧张过程”两个重要部分已经让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对影片热度的持续走高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观众们不需要对整体脉络有清晰的把握，也可获得较强的满足感。

四、影片的叙事特征

（一）大量对比镜头的使用

（1）男女性别的对比：首次换身起床后的二人各自注意到的是生殖器官的变化。三叶每次换身都会从床上掉下，因为她平时都是睡在榻榻米上。一对男女尽管存在于不同的空间与时间，却因为头绳的连接而彼此存在。（2）田园与都市的对比：田园恬静美丽，湖光山色；相比之下城市喧嚣热闹，课余生活丰富有趣，片中并未对两地有所褒贬，而是展现了不同生活区域的特色。三叶在被同学奚落后曾想要离开乡村，但后来竭尽全力拯救大家的行为显示了她对家乡的情感。（3）传统与现代的对比：外婆与爸爸在神社的继承问题上产生了冲突，坚持传统的外婆最终将想要融入现代政治的爸爸赶了出去；跳完巫女舞的三叶对于来自同学们的评价也表现出极为矛盾的心情，一方面家族责任不能推脱，另一方面又羡慕大都市的丰富生活。（4）过去与现在的对比：三叶生活的时间为 2013 年，而泷的时间为 2016 年。泷开始时没有意识到彼此的差距，直到换身停止寻求答案时才发现灾难已经发生。

（二）文化信息的植入

影片中随处可见日本传统文化的影子。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产灵（結びmusubi）”，据外婆台词介绍：“musubi 是守护神的意思，可以表示人与人的连接，也可以表示时间的流动，这些都是神的力量。我们编织的结绳，也是神的作品，体现了时间的流动。将丝线汇集在一起，编织成型扭曲缠绕，同时又还原断裂再次连接，那就是产灵，那就是时间。”

（1）头绳：片中出现的关键信物是头绳。它为 musubi 的一种具象形式，被赋予了特殊功能。[21] 2016 年 10 月 2 日是两人换身的日子。泷（实为三叶）为了保证次日泷与奥寺的顺利约会费劲心思，手机里做了具体指示，但到了自己的时间 2013 年 10 月 3 日后，三叶突然发现其实自己已经喜欢上了泷。当天上学路上按捺不住心情就去东京找他了（影片将见面地点设定在电车上，暗示了电话不通的原因）。三叶发现原来自己时间轴上的泷只是初中生且不认识自己，一时伤心欲绝，离开前留下了头绳。回家后即让外婆剪断长发，不再使用头绳，以显示这段恋情的终结。在日本年轻恋人中，断发意义重大，心灰意冷的三叶此时已经完全意识到了与 17 岁的泷之间的绝对时间差。

据片中交代初中生的泷在电车上拿到头绳后，一直把它当做护身符系在手腕上，冥冥之中这一行为确保了从 2016 年 9 月 5 日开始的换身。对于巫女身份的三叶来说，换身是注定的（因第一次换身时头绳还未给出）。从泷的角度看却恰好相反，他是被三叶在电车上选定的人，接受头绳在先，整体的换身安排是有前期铺垫的。二人未能从 2013 年就开始换身，是因

为泷当时年龄小的原因，必须同龄才能实现。

（2）隐世：进入另外的世界时需要经过一片水域，泷在寻找三叶口嚼酒的时候是进入过的。据片中外婆介绍，这段水域是现世与隐世的分界线。新海诚导演之前的影片《追逐繁星的孩子》里有着类似的场景设定。[22]

（3）片中前后出现了与神社相关的『御神体』；与时间相关的『片割れ時』等词汇。它们均是与日本传统文化相关的专用词汇，尤其后者与现代日语已经有了较大差别（『夕方』），文化上的差异仅仅通过中文字幕很难翻译清楚同义词汇间的区别。

（三）复杂时间轴的设定

身为巫女且冥冥之中肩负家族使命的三叶与泷互换身体，二人的互换始于 2013 年 9 月 2 日（三叶时间）及 2016 年 9 月 5 日（泷的时间）。2016 年 10 月 3 日后突然中止，泷为寻求真相而展开调查，最终发现原来二人不仅身处不同空间，还处于不同的时间，泷此时也确定了理论上他们将永远不能相见。2013 年 10 月 4 日彗星坠落前因为处在黄昏这一特殊时刻的原因，二人终于在产灵的帮助下相见并合议了拯救糸守镇的计划。[23]

片尾显示二人见面的时间是 2022 年春。这一时间距彗星撞地球 9 年，距瀧喝口嚼酒 6 年。导演通过数字让观众误以为三叶时间已经进行了加速式填补。时间的发展会永远保持平行，所以即使到了 2022 年，那个曾经一起拯救小镇的三叶理论上存在于 2019 年，泷见到的仅是与自己处于同一时间的三叶（与电车上的三叶相同）。作为观众，我们内心期待的恐怕是山顶上曾经共患难的 17 岁的二人重逢吧。

与时间空间相关的概念早在第一次换身时即由三叶好友敕使给出了答案（影片 10′15″ 处）："埃弗雷特的多重宇宙理论"。[24] 该理论认为物理世界是一个多重宇宙，其结构是由其中的信息如何流动来决定的。在多重宇宙的许多区域，信息以半自治的方式流动，这样的信息流称为历史，我们把其中一个历史称为我们的宇宙。宇宙近似服从经典（量子理论之前）物理规律。但是我们知道多重宇宙的其余部分，并可以检验量子物理规律，这是因为存在着量子干涉现象。因此一个宇宙不是多重宇宙的一个精确特征，而是一个突现特征。多重宇宙最让人觉得不熟悉和反直觉的东西是可互换性。多重宇宙的运动规律是确定性的，表面上的随机性源于起初可互换的实例变得不同。在量子物理中，变量通常是离散的，它们如何从一个值变成另一个值，是一个涉及干涉和可互换性的多重宇宙过程。[25] 不难发现，以多重宇宙理论为题材的影片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认可，如克里斯托弗·诺兰指导的《盗梦空间》（2010）美国漫威影业制作的《奇异博士》（2016）《蜘蛛侠：平行宇宙》（2018）等。

（四）意料之外的结局

影片进入后半场，喝下口嚼酒的泷（换身为三叶）从御神体里走出来，发现了湖泊的变化，确认小镇已经毁灭。在山顶同一地点，黄昏开始的刹那间见到了赶来的三叶（实为泷），[26] 时空跳转二人终于相见（此时为三叶时间 2013 年）。黄昏很快结束，笔从三叶手间滑落的画面容易让观众误以为是三叶发生了转移，从当时天空中彗星的有无及湖泊数量的变化来判断，是泷重新回到了 2016 年的山顶，这也是影片中唯一一次发生的肉体转移，1:29–31 分处显示这个时刻的泷在彗星降落时正在家中和哥哥一起。

在泷的帮助下以三叶为核心，系守镇产生了蝴蝶效应，遇难人员的命运皆发生改变，得到了拯救。影片结尾三叶（26 岁）在楼梯处（实为须贺神社旁）见到泷（23 岁）的镜头，描写的是处于同一时空的二人相见，前世的记忆在楼梯口这一特殊地点（楼梯口在《转校生》中被设

定为男女的换身场所)被激活了。彼此间泪目是因为脑海中尽管忘记了对方的名字,但对红色头绳的记忆犹在。最后一句台词是两人异口同声地问「君の名前は?kimi no namae wa」,这句日语表达依然与日常生活不符(尤其是作为女性的三叶来说,现实中这种询问方式是不可能使用的),此时的中文字幕显示为“你的名字是? ”可见字幕亦未能准确拿捏住日文的真实含义。我们可将这句台词视作导演特意留下的某种暗示,暗示了圆满结局的非现实性,二人年龄差的存在也充分证明了三叶的不同身份。只是看到相见的场景时,观众们早已沉浸在灾后重逢的欢乐中了,时间的绝对差已被忘到了脑后,容易造成误判。

导演在结尾处给出的重逢场面,极大地满足了观众大团圆结局的心理诉求。不妨纵观新海诚导演此前的作品,如《秒速五厘米》(2007)《追逐繁星的孩子》(2011)《言叶之庭》(2013),其代表作的结局无不以“错过”为主题,从导演的视角来看的话,二人重逢的场面恐也难以称之为圆满。

五、结　语

新海诚动漫电影《你的名字。》的巨大成功,除水准极高的配乐及同名小说提前推出,产生了预热效果等原因外,我们认为还有以下几点可以考量。

青春男女, 本来就是对异性产生兴趣感到新鲜的时期。导演通过梦境里才能发生的置换,来刻画个人与这个世界的种种切不断的连结。梦的方式比起深山老林误入灵异世界的几率要大得多,再加上每人都有的做梦且很快淡忘的生理特征,代入感得到了强化。动漫主题的选择与真人影片一样,离不开观众的欣赏取向。

主题要满足不同年龄层的观影需求:孩子们眼中看到的是勇敢善良的人物形象,大人们看到的是深层次的主题内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动漫电影并不像简单的卡通片(cartoon)一样作为幼儿的视觉教科书使用,它是由一种历史悠久、发展成熟的动画手段制作而成的电影类型,并且作为独立的文化传播媒介和艺术符号承载了深刻的主题和美学追求。从结果看,该片的火热程度完全超过了导演的预想。在吸引到十至二十岁年轻人走进影院的同时,伴随着话题的热炒,票房一路攀升,已经远离影院的大龄人群也被吸引。他们在回味逝去的青春时代之余,更多地理解了文化传承的重要性。透过这部分观众群走进影院及参与网上话题讨论的现象,可以发现动漫电影票房的成功与否,与成熟人群的感受是分不开的。我们认为这种效应的产生与文化在片中的有效植入不无关系。时间与空间概念激活了大龄观众心中尘封的记忆,代入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大量的日本本土文化民俗结合来自西方的空间时间理论, 让整部影片有了较高的艺术效果。片中名字的精心设计,美丽的自然风光,无不体现了导演的匠心精神及理念:人类源于自然,对自然应有敬畏之心。从泷喝完口嚼酒跌倒瞬间眼前出现的画面可以看出:彗星撞地球亦犹如生命胚胎的形成过程。片中文化植入除了换身、产灵、黄昏、水域外,还有巫女舞、口嚼酒、組紐制作、茶茎直立等概念。新海诚导演在片中展现的是:人类与自然间是纽带关系,互为依存,不可切割。动漫电影需要在特定的文化土壤中才能浸润成长,才能实现民族印记的映射。

本文用了较大篇幅来解析《你的名字。》中的具体情节,在新海诚近乎完美的剧本创作中也存在细节上的若干问题,这里简要提及两点。(1)泷与前辈奥寺的约会时间是 2016 年 10

月 3 日,那天为周一,作为高中生的泷应该出现在学校里。(2)三叶与两位朋友敕使、早耶香一起策划了“炸电站”后利用“学校无线电广播”号召镇民转移的情节,这部分为日本防御自然灾害导致停电时的应急对策,片中还需要做出一些说明才能更有利于海外观众理解。

注　释:

①第 8 届 Newtype 动画大奖·作品奖第一名(剧场上映作品)(2016 年 10 月 09 日);第 49 回西班牙锡切斯·加泰罗尼亚国际电影节动画部门最优秀长篇作品奖(2016 年 10 月 17 日);第 18 届韩国富川国际动画节长篇竞赛部门特别杰出奖和观众奖(2016 年 10 月 25 日);第 42 届洛杉矶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动画电影;第 40 届日本电影学院奖优秀动画作品奖提名、话题奖(2017 年 3 月 3 日);第 11 届声优奖获 Synergy 赏(2017 年 3 月 18 日);第 26 届日本电影评论家大奖导演奖(2017 年 5 月 16 日)。

②该片在韩国和中国等地分别取得了日本票房第一的成绩,在北欧及英国,法国,意大利甚至北美也取得了一定的好评。

③同类型的日本真人影片还有 2007 上映的《父女七日变》。

④「過剰で疾走感のある映画にしたいと思った」空前の大ヒットを記録している映画『君の名は。』 新海誠監督インタビュー&レポート. ぴあ関西版 WEB[2016-9-1]

⑤影片全场 111 分钟,中间部分为“寻找系守镇”,约 21 分钟。

⑥日本 NHK 电视台长寿节目,中文可译为《特写现代》(第 401 回)

⑦如《秒速五厘米》2007、《言叶之庭》2013 等。

⑧日本古典文学中有名叫「とりかえばや物語」中文名《但愿顶替物语》这样一则很有名的故事,说的是把哥哥当女孩养,把妹妹当做男孩养,兄妹阴阳倒错的故事。

⑨引自《ⓒHARBOR BUSINESS Online 提供 聯合ニュースより》(2018-4-3)]

⑩引自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KOFIC)。

⑪新海诚导演也被冠以新生代的“偶像大师”“光束魔法师”等称号。同期上映的还有迪士尼动画电影《海洋奇缘》,如果考虑到当时韩国国内的反日情感因素,预估该片实质性影响将远远大于记录本身的意义。

⑫『新海誠、その作品と人』スペースシャワーネットワーク出版,2016。

⑬『每日新聞』(2017-1-23)。

⑭“中国产业信息网”(2018-3-12)。

⑮生活中常见的疑问表达是「お名前は? 」

⑯新海诚导演在小说《君の名は。》中如下称赞音乐部分:「それから、映画の音楽を担当してくれたRADWIMPSの楽曲たち。小説ではもちろんBGMは流れないけれど、RADWIMPSの歌詞の世界に、この小説も大きな影響を受けている。映画『君の名は。』においては音楽が担う役割は特に大きいのだけれど、それが映画? 小説それぞれどう演出されているか、確かめていただければ嬉しい。」(说到负责电影配乐的 RADWIMPS 组合。小说里当然不能播放配乐,但 RADWIMPS 歌词也影响到了本小说的完成。在电影中他们制作的音乐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电影和小说是怎样演绎的,希望大家分别确认。)

⑰新海诚导演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的文学系。

⑱『日本国語大辞典』、1324 页。「みずは([みつは]とも)水の神。水の精。また、水中の化物とも。みずち」古代文学作品公元 712 年的『古事記』(みづはのめのかみ)和 720 年的『日本書紀』(みつはのめのかみ)中也分别留有此水神的相关记载。

⑲『日本国語大辞典』、75 页。「…(6)葉が常に立ち青み、枯れることのない神木であるところから[神代

史の新研究＝白鳥庫吉]。」

⑳1953 版「君の名は」共拍摄了三部。

㉑片中后半部分在山顶上擦肩跑过的瞬间，夕阳照射下两人四周曾迅速闪过红色的 musubi，显现的时长低于一秒，很难肉眼捕捉到这个细节。

㉒宫崎骏导演的《龙猫》《千与千寻》中出现的通往异界的通道，其设定均是平面，而非垂直的。这符合日本传统文化中神域与人世的位置关系。

㉓山顶见面时泷大意地归还了头绳，这一行为意味着二人已再无相见可能。

㉔[英]戴维·多伊奇(David Deutsch)著、王艳红 张韵译《无穷的开始 世界进步的本源》，人民邮电出版社，2019 年版，第 329 页。

㉕同类型还有日本动漫公司 WHITE FOX 制作的《命运石之门》。

㉖此处泷有一次闭眼的动作，实为二人身体再次发生互换，彼此恢复了正常状态。

（赵彦志：复旦大学日文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徐静波）

试论指定管理者制度在日本公立剧场运营管理中的运用

高　洋

内容提要　由于长期处在管办一体化的体制下，日本公立剧场的运营管理出现了诸多弊端。指定管理者制度的导入希望通过引进民间资本的活力与专业技能来促进公立剧场的运营管理向着“管办分离”、“公设民营”的方向转变，以此来达到削减成本与提升服务质量的双重目的。在导入后的十多年时间里，指定管理者制度逐渐得到了日本公立剧院行业的认可，但是制度设计当初所要达成的预期目标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实现，并且在制度的运用过程中又出现了诸多的扭曲与乱象。如何弥补制度设计上的缺陷，改善与创新制度在实际应用中的方式方法成为左右指定管理者制度在公立剧场中发展前景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　指定管理者制度　公设民营　“箱物”　活性化

一、指定管理者制度的概要

（一）制度导入的法制背景

日本政府于1999年颁布了名为《关于利用民间资金促进公共设施的整备的法律》（1999年7月30日法律第117号，以下简称《PFI法》）。《PFI法》的施行标志着日本从此可以采用PFI（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或者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对公共设施进行设置、运营与管理。其中，PPP（公私合营）模式指的是通过活用民间的资本与知识技能，由官民合作来提供公共服务的体制。在此模式下，民间事业者从设施的设计、建设直到日后的运营、维护与管理的全阶段都在与官方的合作框架下参与公共事业的展开。而指定管理者制度正是PPP模式在日本公立设施运营管理中的一种具体应用形态。

2003年，日本政府对《地方自治法》进行了修正。通过此次修正（第244条之2第3项），原有的公立设施管理委托制度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新设立的指定管理者制度。相比于旧制度只能指定地方自治体出资的财团或者其他公共团体作为公立设施运营管理的被委托方（一部分公立设施仍由地方自治体直营管理），指定管理者制度将委托对象的范围扩大到了所有团体（不需要法人资格，但是个人除外），这就为民间事业者参与公立设施的运营管理打开了大门。

（二）制度导入的目的

由于长期处在官办一体化的体制下，日本公立设施的运营管理出现了“成本高昂、管理不善、效率低下、服务不良等诸多为人所诟病的地方”。[①] 为了解决这一官僚体制滋生的诸多弊端，指定管理者制度希望通过引进民间资本的活力与专业技能，以此来促进公立设施的运营管理从原来的管办一体向着“管办分离”、“公设民营”的形态转变。具体而言，行政成本的削减

与服务质量的提升乃是在公立设施中导入指定管理者制度的两大目的。也就是说,通过将设施的部分管理权限(使用权限包含在内)移交给指定管理者,[2] 民间企业的合理经营化理念与手段可以促成在原来的公家运营管理体系下难以做到的业务效率革新,从而降低公共资金的支出;而于此相伴的公共服务质量的改善又可以提高设施所在地居民的满意度,从而达到激发地方活力的效果。

(三)制度导入对于日本公立剧场的意义

就日本的公立剧场体系而言,[3] 指定管理者制度的导入被赋予了突破"箱物"困境的使命。"箱物"(ハコモノ) 化是对一些剧场会馆类日本公立文化设施存在形态的一种形象化描述,指的是这些设施由于业务形态过于单一(基本上以租场为主),"自身并不具有生产、创造、培育等方面的功能",[4] 从而使其本应具备的软硬件性能长期得不到有效利用与开发,整个建筑就像一个箱子一样被闲置在那里。而通过指定管理者制度来引入来自民间的活力与创意正可以打破公立剧场运营管理上的这种死气沉沉的局面,激发公立剧场从提供单纯租场服务的"设施"(facility)向着人的创造性与能动性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机构"(institute)的转变。[5] 这种公立剧场"活性化"的理念与思路也在 2012 年 6 月开始施行的日本第一部有关剧场行业的专项法规——《关于激发剧场、音乐厅等的活力的法律》(以下简称《剧场法》)中得到了更加具体与强化的反映。[6]

二、指定管理者制度在日本公立剧场中的运用现状

日本公益社团法人全国公立文化设施协会(以下简称"公文协")于 2017 年 3 月发布了最新版《关于剧场、音乐厅活动状况的调查研究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7]《报告书》的第二章"指定管理者度导入状况"针对指定管理者制度在日本全国的公立剧场中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最新一轮的问卷调查统计。[8] 以下,本章将基于《报告书》的相关数据来分类说明并分析指定管理者制度在日本公立剧院中的运用现状及其所呈现出来的趋势与特征。

(一)指定管理者制度的导入率

在接受调查的 1425 座国公立剧场中,有 834 座剧场采用了指定管理者制度,整体平均导入率为 58.5%。如果以不同统计标准对这些公立剧场进行分类并进而分析指定管理者制度在其中的导入情况的话,可以得到如下的结果(表 1)。

首先, 如果以行政区划规模为坐标来看指定管理者制度在公立剧场中的导入情况的话,那么政令指定都市的公立剧场中的指定管理者制度导入率最高,[9] 为 90.1%,都道府县级别的公立剧场的导入率为 87.8%,其下依次为:"市·特别区(30 万人以上)"(72.8%)、"市·特别区(10–30 万人)"(68.3%)、"市·特别区(10 万人以下)"(49.7%)、"町村等"(20.9%)。这样的导入比例排序显示行政区的人口规模越大,其所辖的公立剧院导入指定管理者的倾向总体上就越高。其次,如果从剧院规模来看公立剧场的指定者管理者制度导入情况的话,拥有 500 座以下的公立剧场中的指定管理者制度导入率为 55%,500–1000 座之间的剧场的导入率为 47.7%,1000 座以上剧场的导入率最高,为 76.1%。可以看出,就总体趋势而言,指定管理者制度在公立剧场中的导入率随着剧场所保有的坐席数量的增多而上升。最后,如果从演出活动情况来看公立剧场中的指定管理者制度导入情况的话,可以看出主办演出场次越多的公立剧场导入指定管理者制度的意欲也越强。另外,还可以看到接受补助金援助的公立剧场的指定

表 1　不同统计标准下的受访公立剧场中的指定管理者制度导入率

统计标准			剧场数	导入剧场数	导入率
全体受访剧场			1425	834	58.5%
行政区划	都道府县		115	101	87.8%
	政令指定都市		142	128	90.1%
	市·特别区	10 万人以下	151	75	49.7%
		10–30 万人	322	220	68.3%
		30 万人以上	451	328	72.8%
	町村等		244	51	20.9%
坐席数量	500 席以下		393	216	55.0%
	500–1000 席		589	281	47.7%
	1000 席以上		443	337	76.1%
演出场次⑩	1–3 回		185	72	38.9%
	4–10 回		273	144	52.7%
	11–20 回		204	151	74.0%
	21 回以上		302	254	84.1%
补助金援助			435	323	74.3%

资料来源：根据公文协《报告书》数据整理

管理者导入率（74.3%）也远高于整体平均水平。

（二）指定管理者的构成类别

从表 2 可以看出，在 834 座导入指定管理者制度的公立剧场中，其指定管理者的种类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主要的团体类别有财团、营利法人、NPO 以及由上述团体联合形成的共同体组织。其中，由公益财团法人和一般财团法人构成的财团法人负责运营管理的剧院占到了所有类型的指定管理者负责剧场数的一半以上（55.4%）。这些财团法人一般有中央与地方政府出资的背景，属于准公共团体。在 2003 年导入指定管理者制度之前，在中央与地方政府

表 2　受访采用指定管理者制度的公立剧场的指定管理者类别

指定管理者类别		剧场数	占比
财团	公益财团法人	375	45.0%
	一般财团法人	87	10.4%
	合计	462	55.4%
营利法人		145	17.4%
NPO 法人		44	5.3%
共同体	财团与营利法人	29	3.4%
	NPO 法人与营利法人	5	0.6%
	复数营利法人	93	11.2%
	其它	19	2.3%
	合计	146	17.5%
其它		37	4.4%

资料来源：根据公文协《报告书》数据整理

直接对剧场进行管理的直营模式之外，财团和其他公共团体一样，在管理委托制度下负责国公立剧场的运营管理。指定管理者制度导入后，大部分财团被选为指定管理者继续对原来所负责的国公立剧场进行运营管理。相较于具有公共性质的财团，由具有纯粹民间资本属性的株式会社、有限会社等营利法人全权或部分负责运营管理的公立剧院为 272 座，只占到总数的约 3 成左右（32.6%）。这说明，在指定管理者制度已经施行十多年的今天，公立剧场的运营管理主体仍然是那些公家设立或者有官方背景的财团组织，制度所期待的公立剧场运营管理的“公设民营”化目标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实现。

（三）指定管理者的选定方式

指定管理者的选定方式可分为“公开募集”（公募）和“非公开募集”（非公募）两种方式。在所有受访的施行指定管理者制度的国公立剧场中，有接近六成（59.8%）的剧场采用公募方式选定指定管理者。从行政区划来看，都道府县和政令指定都市一级的国公立剧院采用公募方

表 3 受访采用指定管理者制度的公立剧场的指定管理者选定方式

统计标准			剧场数	公募	占比	非公募	占比
全体受访剧场			834	499	59.8%	335	40.2%
行政区划	都道府县		101	74	73.3%	27	26.7%
	政令指定都市		128	98	76.6%	30	23.4%
	市·特别区	10 万人以下	224	138	61.6%	86	38.4%
		10–30 万人	220	112	50.9%	108	49.1%
		30 万人以上	110	49	44.5%	61	55.5%
	町村等		51	28	54.9%	23	45.1%
座席数量	500 席以下		216	143	66.2%	73	33.8%
	500–1000 席		281	172	61.2%	109	38.8%
	1000 席以上		337	184	54.6%	153	45.4%
演出场次	1–3 回		72	42	58.3%	30	41.7%
	4–10 回		144	90	62.5%	54	37.5%
	11–20 回		151	86	57.0%	65	43.0%
	21 回以上		254	125	49.2%	129	50.8%
补助金援助			323	149	46.1%	174	53.9%

资料来源：根据公文协《报告书》数据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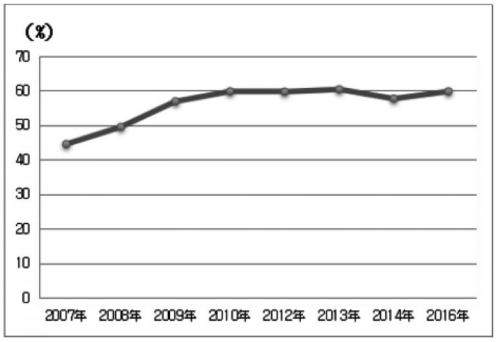

图 1　公立剧场指定管理者公募比例的历年推移

资料来源：公文协《报告书》

式的比例最高，分别为 73.3%和 76.6%。从剧场规模来看，可以看出拥有座席数量越多的剧场采用公募方式的意欲反而越低，但采用公募方式的剧场的总体占比仍然保持在 50%以上（表 3）。如果历时地来看指定管理者选定方式的变化的话，可以看出从 2007 年到 2013 年之间公募方式所占比例总体上呈现出平缓上涨的趋势。2013 年之后，公募方式的比例虽然略有下降，但是仍然在 6 成左右前后推移（图 1）。

（四）指定管理者的管理年限

从表 4 可以看出，公立剧场指定管理者目前最主流的管理年限为“5–6 年”，在全部 834 座国公立剧院中，有 619 座剧院的指定管理期间落在此区间内，占到总数的 7 成以上。历时地来看，采用 4 年以上中长期指定管理合约的剧院在全部指定管理者负责运营管理的剧院中的占比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趋势，从 2007 年的 41.4%一直攀升到 2016 年的 83.9%，在 10 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倍增（图 2）。较长期的管理年限有利于指定管理者立足于长远的视野对于剧场运营管理的各项事务进行可持续的规划与投资，这对于剧场长期稳定的发展至为重要。

表 4 受访采用指定管理者制度的公立剧场的指定管理年限

指定管理年限	剧场数	占比
3 年以下	16	1.9%
3–4 年	118	14.1%
4–5 年	61	7.3%
5–6 年	619	74.2%
6–7 年	3	0.4%
7 年以上	17	2.0%

资料来源：根据公文协《报告书》数据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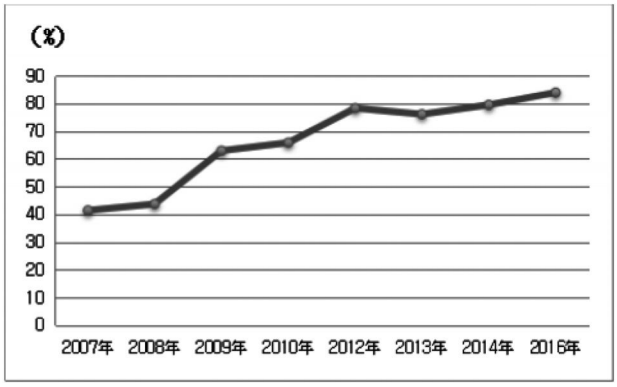

图 2　采用 4 年以上指定管理期限合约的公立剧场比例的历年推移

资料来源：公文协《报告书》

三、指定管理者制度所面临的问题

（一）政策目标与经济目标之间的非整合性问题

公立剧场在日本的法体系下属于公立设施，而公立设施的基本任务乃是通过提供各种公

共服务来满足人民的需求从而增进公共福祉。鉴于公立设施的这种公益属性,当民间企业作为指定管理者负责公立设施的运营管理时,其不仅要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还要同时考虑如何有效地提供能够满足人们各种需求的公共服务,以此来保证公立设施的公益性使命得到履行。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公立设施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对于民间企业来说并不能够转换成自身的经济利润,甚至在某些场合,还会出现企业的利益与公共福祉相背反的现象。这一点集中反映在指定管理者制度所要达成的政策目标与经济目标的非整合性问题上。

实际上,作为公立设施设置者的日本各级政府对指定管理者的期待并不是追求收益,而是如何尽量控制设施的运营管理成本从而实现财政的健全化;而多数企业参与指定管理者事业的动机却在于在传统商业领域之外拓展新的市场份额。[11] 随着少子高龄化现象的不断加剧,由此带来的经济规模的停滞和社会保障费的快速膨胀使得日本各级政府都面临了极为严峻的财政形势。在此社会经济背景下,虽然导入指定管理者制度的原始初衷是同时实现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与行政成本的削减,但是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各级政府主要所关注的还是指定管理者制度所具有的"成本削减工具"的作用,[12] 而更应该受到重视的服务质量在极大的成本削减压力下不仅得不到提高反而面临下滑的危险。基于对这种本末颠倒的结果的担忧,在指定管理者制度导入 7 年后的 2010 年,日本总务省发布了名为《关于指定管理者的运用》的通知(以下简称"总务省通知")。[13] 总务省通知中列举了 8 条指定管理者制度运用时的注意点和改善点。其中第 2 条明确指出各级政府在选定公立设施的指定管理者时不能秉承着价格招标的理念,而是应该以选出那些能够提供最佳公共服务的管理者为出发点。

虽然总务省通知指出指定管理者的选定过程不能等同于价格竞争原理主导的商业竞标,但是在为公立剧场选择指定管理者的实际过程中,指定管理费用的多寡仍然是决定指定管理者归属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为了满足政府极端的行政成本削减的愿望,通过恶性的价格竞争,往往是那些愿意以极为低廉的费用承担剧场经营管理的企业在指定管理者的选定上胜出。有些地方政府无视剧场管理运营在软硬件方面的特殊性,只是一味地在招标书中对管理费设定极为不合理的廉价数值。这使有剧场运营管理技能与经验的业者裹足不前,而那些毫无专业知识的写字楼物业公司却由于能在人事费和管理费上进行极端的削减从而大量接手了政府急于在财政上甩包袱的公立剧场。

(二)雇佣环境恶化的问题

如上所述,为了满足政府最大限度削减行政成本的欲望,业者要想在指定管理者的选定上胜出只好尽可能地压低向政府索要的管理费用。但是,剧场要维持正常的演出运营,在硬件设施的维护与保养上无论如何要投入一定的费用。那么,面对极为有限的管理经费,指定管理者要想在物力方面投入必要的支出就必须极大地压缩用于人事上的费用,而这对剧场从业者的雇佣环境造成了比较负面的影响。

指定管理者制度在公立剧场中所造成的雇佣环境恶化首先反映在剧场员工的非正规雇佣率居高不下这一点上。在日本的劳动雇佣形态体系中,正规雇佣指的是和员工签订不限定具体期限直至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约。这种雇佣模式一般应用在公司企业的"正社员"(正式员工)的雇佣上;而非正规雇佣是一种只和劳动者签订有限期间合约的雇佣形态,一般临时员工、派遣员工和小时工的雇佣会采用此种方式。相比于正规雇佣员工不受时期限制的稳定工作前景,非正规雇佣员工的职业前景则要面临着工作合约的到期和续约等不确定因素。如果非正规雇佣员工的数量在整个公司员工中占比较高的话,那么这个企业的人事构成将面临

着较大的流动性，这不仅妨碍了员工个人的长远职业规划，也不利于企业自身永续安定的经营发展。

从 2003 年导入以来的十多年间，指定管理者制度对公立剧院的人事体系所带来的最显著的变化就是非正规雇佣员工比例的快速攀升。有日本剧院从业者统计，在日本全国比较知名的，享受特别支援待遇的国公立剧场、音乐厅的雇佣体系中，非正规雇佣员工的比例已经从 2004 年的 43.8%爬升到 2012 年的 66.7%。[14] 这个数字说明在这些公立剧场的员工构成中，平均 3 个人当中就有 2 个人是非正规雇佣者。有论者甚至认为现在日本公立剧场的非正规雇佣员工的比例早已远超于 2012 年的“三人中有两人”的数字，而是已经非常接近于“四人中有三人”的程度，[15] 这要远高于现在日本整体的非正规员工雇佣率（37.7%）。[16] 在民间企业通过公募方式接手的很多公立剧场中，甚至出现除馆长以外的职员全部都是非正规员工的极端情况。[17]

非正规雇佣率居高不下所造成的劳动条件恶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三年雇佣停止”的问题。所谓“三年雇佣停止”（三年雇止め），指的是对剧场非正规员工的雇佣一般采取先签订一年合约，然后续约两次直到第三年到期不再续约的做法。“三年雇佣停止”的做法在法理上存在着很大的疑问性。按照日本的《劳动基准法》第 14 条的规定，“（关于）劳动合约，除了没有规定期限的合约或者规定了完成一定工作所需期限的合约之外，不得缔结超过三年的合约”。[18] 许多指定管理者制度下的剧院似乎将这条规定作为其对非正规员工施行“三年雇佣停止”做法的法律依据。但是，《劳动基准法》其实并没有规定员工的雇佣总期限不得超过三年以上，而只是要求一次劳动合约的签订期限不得超过三年，并没有在续约次数上有所规定。“三年雇佣停止”的做法显然是对《劳动基准法》的曲解。

为了具体贯彻与落实《剧场法》中所构想的各项政策措施，日本文部科学省于 2013 年 3 月 29 日发布了名为《关于激发剧场、音乐厅等事业的活力的指南》（以下简称《指南》）的公告。在剧场人才的获取与培养方面，《指南》明确提出“要从可持续性地不断提高业务水平的观点出发，在考量年龄构成的基础上，在各个领域合理配置必要的专业人才”。也就是说，合理平衡的，不偏不倚的人事构成是剧场能够持续保持高品质运营管理的重要保障。但是，指定管理制度下的公立剧场的人员结构却与这种各年龄层均等的人事配置理想状态相去甚远。由于年轻员工的雇佣基本采用非正规雇佣的形态，再加上“三年雇佣停止”做法的流行，指定管理制度下的公立剧场员工的年龄构成实际上呈倒金字塔型：有一定技术经验与社会人脉资本积累的正式员工的人数相对较少，他们基本上是指定管理者制度导入前入职的正社员，年龄大多在 45 岁以上；而人数众多的 20–30 岁之间的年轻员工则普遍是非正规雇佣员工。在“三年雇佣停止”的做法大行其道之下，针对这些年轻员工的培养计划与体制严重缺位，他们就像一次性消费品那样，三年期限一到，随着雇佣关系的解除，其在这三年间好不容易才逐渐积累起来的技术与运营管理上的经验与资本在一瞬间遭到“清零”。这对于剧院的长远发展乃是无可估量的损失与浪费。无怪乎有日本剧院行业从业者认为指定管理制度下的公立剧院现在在人才储备上就像抱着“定时炸弹”：[19] 如果“三年雇佣停止”的做法再得不到及时的纠正，那么再过 10 到 20 年的时间，日本的公立剧院很可能会面临人才枯竭与凋零的危机，届时日本的公立剧院则又会退化到被人所诟病的人的要素被完全排除的“箱物”状态中去。

2013 年 4 月，日本新修正的《劳动契约法》得以实施。新版的《劳动契约法》规定非正规有期雇佣劳动者如果在同一企业内的总工作年限超过 5 年的话，经过本人的申请可以转换成没

有规定年限的无期雇佣状态。新版《劳动契约法》同时还规定经过多次续约从而在同一家企业长期工作的非正规员工,其与正社员一样,没有合理的理由不得随意停止雇佣,而且在薪资与福利待遇上也应该根据工作内容与责任大小按照正社员的标准进行设定。[20] 新版《劳动契约法》上述规定的出台无疑对日本公司企业内的非正式编制人员的工作安全与权益是一个极大的促进与保护,为降低日本职场的非正规雇佣率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支撑。但是,新版《劳动契约法》的这些规定在剧院行业内的落实进展却似乎显得有些缓慢。根据公文协 2018 年版《全国剧场、音乐厅等艺术管理研修报告书》对 162 家公立剧场的统计,[21] 在新版《劳动契约法》已经实施将近 5 年的 2018 年 1 月, 仍然有超过四成的剧场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与对策来应对非正规员工的雇佣问题;即使在正在着手解决非正规雇佣问题的剧院当中,也有剧院以消极的态度来回应新《劳动契约法》的号召,例如,有 21%的剧院为了使有期雇佣员工无法申请到无期雇佣合同故意使其总工作年限不超过五年,[22] 而在被问到这么做的原因时,绝大多数剧院指出其所在剧院的指定管理者制度对非正规员工的雇佣期限有明确的上限规定。由此可见,指定管理者制度已经成为改善日本公立剧场员工雇佣环境的一个较大阻碍。

(三)选定方式上公募与非公募的合理性问题

指定管理者制度在日本公立剧院行业导入后,通过公开招募的方式选定指定管理者的做法逐渐得到普及,现在已经有接近 6 成的公立剧场采用此种方式选定指定管理者。一般认为,相较于非公开招募的方式,基于对复数候选者所提方案进行考评的公募做法更加具有竞争性和公开透明性。但是,用公募方式选定公立剧场的指定管理者也存在一些非合理性因素。正如前文所述的那样,公开的招募竞争往往演变成价格大战,致使那些愿意出低价却毫无专业性的业者赢得指定管理者的资格, 其结果是使剧院在软硬件上的维持与发展面临极大的限制。而且,由于面临着在下一次公开招标时是否还能被选上的不确定性,公募下的指定管理者往往倾向于只短视地关注合约期限内的运营管理事项, 而那些需要立足于长时段规划的修缮、维护与投资则遭到了忽视。这一点与公立剧场内的雇佣形态也存在着联动关系:由于指定管理者只能在其管理期间内雇佣员工,所以其招募来的职员只能采用有期雇佣的形态。

相比公募方式的公开竞争,非公募由于没有可视化的招标流程不免会有“暗箱操作”的诟病,但是如果从剧场运营管理上的特殊性来看的话,非公募方式也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正如在第二节所述的那样,在日本公立剧场的运营管理制度由管理委托制向指定管理者制转变的过程中,许多具有公家背景的财团纷纷无缝衔接地转换身份变成了指定管理者。这些由财团继续负责运营管理的公立剧场的多数在以后的发展中会采用非公募的方式指定原有的财团长期担任剧场的指定管理者。相较于资金有限且刚踏入剧院管理行业的民间企业,这些从指定管理者制度导入前就长期担负公立剧场运营管理的财团有着更加成熟的专业技能与丰富的实践经验。鉴于其准公共团体的性质,这些财团还能够从行政那里获得一定的政策与资金支持,从而缓解了经营压力。考虑到财团的这些优势,采用非公募方式让这些财团长时段地担负指定管理者的职责对于公立剧场的安定运营无疑具有积极作用:资金与时间上的充裕使这些指定管理者能够沉下心来,以长远发展的眼光对剧院运营管理所需的软硬件与人力资源进行持续稳定的投资,而这对于有自主艺术生产意愿的剧院来说则尤为重要。我们知道,剧院要制作自己的演出节目,要建立专业性极强的制作团队,要有周密的规划与布局,一些舞台演出门类(例如歌剧)的制作则要在很长的时间周期内耗费巨大的人、财、物力。对于民间资本充当指定管理者的剧场而言,由于往往只追求有限期间内的经验管理业绩,且人员配置上严重依

赖没有专业才识的非正规员工,自主的艺术生产对这些剧场来说显然是很难完成的事业。无怪乎日本滋贺县立艺术剧场琵琶湖音乐厅馆长山中隆明确指出以自主制作舞台节目为事业中心的公立剧场,其指定管理者的选定不适合公开竞争的原理。[23]

四、结语:指定管理者制度在日本公立剧场运用中的展望

纵观指定管理者制度在日本公立剧场中的实施历程,可以发现制度设计当初所期待的目标与成效很难说得到了令人满意的显现。一方面,制度所重点标榜的"公设民营"化的达成状况有些差强人意,如何进一步促进民间资本参与公立剧院的运营管理仍然是指定管理者制度实施上亟待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在那些由民间资本主导的,完全实现了"公设民营"的公立剧场中,又出现了服务质量的劣化、雇佣环境的不安定、薪资待遇上的压榨以及安全管理上的疏忽等乱象。有日本剧院行业从业者甚至直言以自由主义竞争原理为导向与归旨的指定管理者制度从根本上就与公立剧场的运营管理不相兼容。[24] 可见,指定管理者制度在日本公立剧场中的发展已经处在何去何从的关键节点上。如何弥补制度设计上的缺陷,改善与创新制度在实际应用中的方式方法成为当务之急。为此,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指定管理者制度在日本公立剧场中的发展前景做出展望。

(一)做到内部效率性与外部效率性的兼顾

和其他公共服务一样,公立剧场的运营管理也存在着"内部效率性"与"外部效率性"两个侧面。所谓"内部效率性",指的是通过抑制人事费、设施管理费等固定费用从而实现服务的低成本化;而"外部效率性"则指的是公共服务的质量在满足人们需求上的效率性。"内部效率性"与"外部效率性"的追求应该联动地进行而不是彼此割裂开来,也就是说,如果公共服务不能与人们所期待的需求相匹配的话,那么即使其成本再低廉也是无意义的。

现行的指定管理者制度虽然从表面上看似乎要同时达成"内部效率性"与"外部效率性"的提升,但是从其在公立剧场中的实际运用情况来看,通过削减成本来实现财政改革的"内部效率性"侧面被过分地强调,而通过提升服务质量从而实现行政改革的"外部效率性"侧面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要做到指定管理者制度在公立剧场运用中的"内部效率性"与"外部效率性"的兼顾,一个关键点在于如何行之有效地增加指定管理者的收益。只有让指定管理者处在能够确保一定收益性的状况下,剧场员工的雇佣与培训、舞台设施的维护管理以及内容生产这些对于提升剧场服务水准至关重要的人力与软硬件因素才能得到充实与改善。

为此,一个可行的做法就是采取指定管理费与使用费的并用制。正如在第二节所论述的那样,鉴于公立剧场天然所具有的社会公益性特质,指定管理者很难运用一般的商业逻辑与手段实现收益的增加。尽管如此,在确保人人都能够公平便捷地享受公立剧场所提供的基础服务之外,通过创意工夫积极地推出针对特定群体的额外收费项目和服务仍然可以实现可观的收益增长。事实上,根据公文协《报告书》的调查,八成受访的公立剧场目前已经采用了使用费制度。今后的一个课题是在维持合理费率的前提下如何进一步丰富与扩大收费项目的种类与范围,另外,还要考虑征收上来的使用费如何在指定管理者与地方行政之间进行合理分配的问题。目前有的地方政府要求其所管的公立剧场的指定管理者上交大部分甚至全部的使用费,这无疑严重地削弱了指定管理者的增收效果与积极性。

(二)建立科学合理的选定与考核机制

正如上文所论述的那样，由于过于重视“内部效率性”的实现，使得行政在为公立剧场挑选指定管理者时将节省管理经费的能力作为最重要甚至唯一的考量。这种偏颇的选定标准无疑是使公立剧场的指定管理者招募沦为单纯的价格竞争的直接诱因。今后，要在兼顾“内部效率性”与“外部效率性”的理念下，合理地分配与设定“成本控制能力”、“业务执行能力”、“劳动法令的遵守”、“雇佣环境的改善”、“个人隐私的保护”等评价因素在整个选定机制中的权重与比例。

在具体的考核机制的构建上，横滨市的做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针对市属公立文化设施的指定管理者的业绩考核，横滨市建立了一整套全方位多层次的评价体系，包括：(1)指定管理者的自我评价；(2)市政主管部门的行政评价；(3)观众、市民的问卷调查评价；(4)第三方机构做出的外部评价。[25] 其中，利用者评价与外部评价为指定管理者的考核体系增添了更加广阔多元的视角；尤其是后者，由于是由具有专门知识的评审委员组成，且独立于设施指定管理者和所管行政单位双方，因而能够保障其对指定管理者的业绩进行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三)强化官民的共同责任意识

指定管理者制度下的公立剧场的运营管理是官民合作的共同事业。为此，需要公立剧场设置者的地方政府和指定管理者在共同责任的意识下协同合作推进剧场的运营管理事业。要强化这种共同责任意识，首先要明确责任分工。在现有的将指定管理者制度普遍视作减轻行政负担的工具的风气下，有些日本地方政府存在着一种甩包袱的心理，以为将公立剧场交由指定管理者运营管理就等于放弃了所有的责任。实际上，指定管理者制度下的公立剧场运营管理中的一些弊端的出现与加剧就是行政的失政与不作为的结果。要扭转这一局面，行政与指定管理者双方要在明确各自权利与义务的基础上，秉着不推诿不扯皮的态度自觉承担各自应尽的责任，特别是地方政府要切实担负起监督指导的职责。其次，要目标共享。正如前文所论述的那样，指定管理者对公立剧场的运营管理并不是一种对单纯建筑物设施的管理，而是要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与主观能动性，针对每个剧院各自的特性明确其定位与发展使命。为此，地方政府和指定管理者应在事先整理与分析各自对所管公立剧场运营管理的期待的基础上，通过紧密的交流与协商，针对企划、实施、评价与考核等各环节共同缔结包含有具体目标值与配套措施的协定书。

注　　释：

①方军：《“活性化”原则与日本公立剧场》，《戏剧艺术》，2019 年第 2 期，第 148 页。

②在指定管理者制度导入前的委托管理制度下，委托管理者在和设施设置者的地方自治体签订契约的基础上只负责设施的具体管理事务及其执行。设施的管理权限以及责任继续归地方自治体所有，而且使用许可权限也不赋予委托管理者。相较之下，指定管理者制度规定设施的部分管理权限(包含使用许可权限)经过行政指定委任给指定管理者，地方自治体不行使这部分管理权和使用权，只是从设施所有者的责任立场上进行必要的监督指导。石井昇：《公の指定管理者制度と行政手続》，《甲南法務研究》，2017 年第 13 期，37 頁。

③在日本，“公立剧场”概念的内涵相对宽泛，除了专业剧场外，一般具备舞台演出功能的综合性公立文化设施(例如“公民馆”、“文化会馆”、“市民文化中心”等)也被囊括到“公立剧场”的范畴之内。

④方军：《“活性化”原则与日本公立剧场》，《戏剧艺术》，2019 年第 2 期，第 146 页。

⑤全国公立文化施設協会：《全国劇場・音楽堂等アートマネジメント研修会報告書（平成 28 年度)》，2017 年 3 月，24 頁。https://www.zenkoubun.jp/publication/pdf/afca/h28/h28_art2017.pdf.

⑥正如方军所指出的那样,指定管理者制度的导入是日本剧场“活性化”的第一次催化,而《剧场法》的实施则是第二次催化。方军:《“活性化”原则与日本公立剧场》,《戏剧艺术》,2019 年 2 期,第 144 页。

⑦全国公立文化施設協会:《劇場、音楽堂等の活動状況に関する調査研究報告書(平成 28 年)》,2018 年 03 月。https://www.zenkoubun.jp/publication/pdf/afca/h28/h28_chousa.pdf.

⑧公文协以邮寄问卷调查的形式对日本全国 2198 座国公立剧场设施进行了问卷调查, 从其中 1431 座剧场收回了问卷。其中,有 1425 家剧场回答了与指定管理者制度实施状况相关的调查(针对每一个具体设问的回答剧场数可能有所变动)。本章所有关于指定管理者制度的数据均源自此《报告书》,不再另行标明出处。

⑨政令指定都市指的是根据《地方自治法》由内阁政令指定的人口 50 万以上的城市。

⑩原《报告书》中没有指明是什么时间间隔下的演出场次数,笔者认为可能是月演出场数。

⑪望月信幸:《指定管理者制度における官民の目的の違いとその影響》,《アドミニストレーション》,第 22 卷第 2 号,2016 年,93 頁。

⑫《片山善博総務大臣閣議後記者会見の概要》,《朝日新聞》,2011 年 1 月 5 日.

⑬総務省自治行政局長通知(総行経第 38 号):《指定管理者制度の運用について》,2010 年 12 月 28 日。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096783.pdf.

⑭衛紀生:《指定管理者制度による雇用の不安定化と人材育成は両立するか》,2014 年 2 月 21 日。https://www.kpac.or.jp/kantyou/essay_161.html.

⑮同上。

⑯総務省統計局:《労働力調査(詳細集計)2019 年(平成 31 年·令和元年) 4 – 6 期平均(速報)》,2019 年 8 月 6 日。http://www.stat.go.jp/data/roudou/sokuhou/4hanki/dt/pdf/gaiyou.pdf.

⑰衛紀生:《指定管理者制度による二極化が進む公立劇場ホールの現状》,2013 年 7 月 20 日。https://www.kpac.or.jp/column/kan36.html.

⑱《労働基準法(平成二十九年法律第四十五号改正)》,2018 年 12 月 14 日。https://elaws.e-gov.go.jp/search/elawsSearch/elaws_search/lsg0500/detail?lawId=322AC0000000049#53.

⑲衛紀生:《「時限爆弾」を抱え込んでいる公立劇場·ホール—非正規雇用率の高い職場からは優れた劇場音楽堂は生まれない》,2013 年 4 月 29 日。https://www.kpac.or.jp/kantyou/essay_151.html.

⑳厚生労働省:《労働契約法の改正について》,2013 年 4 月。https://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koyou_roudou/roudoukijun/keiyaku/kaisei/index.html

㉑全国公立文化施設協会:《全国劇場·音楽堂等アートマネジメント研修会報告書 (平成 29 年度)》,2018 年 3 月。https://www.zenkoubun.jp/publication/pdf/afca/h29/h29_art.pdf.

㉒关于采用何种方式来使非正规员工的雇佣总年限不超过 5 年,主要有三种做法,一是限制续约次数;二是续约标准的严格化;三是在两次合约期间插入空白期从而重置总雇佣年限。

㉓全国公立文化施設協会:《全国劇場·音楽堂等アートマネジメント研修会報告書 (平成 28 年度)》,2017 年 3 月,22 頁。https://www.zenkoubun.jp/publication/pdf/afca/h28/h28_art2017.pdf.

㉔衛紀生:《指定管理者制度からみる包摂型事業の必然性》,2015 年 10 月 29 日.https://www.kpac.or.jp/kantyou/essay_181.html.

㉕藤崎晴彦:《指定管理者制度の現状と課題—横浜市の事例分析を中心二—》,《横浜市立大学論叢》,第 66 卷第 3 号,84 頁。

(高　洋:上海戏剧学院博士后　责任编辑:贺　平)

澳日种族矛盾成因初探

孙雪晴

内容提要 1868 年,日本明治天皇即位并进行了“明治维新”。同一时期,澳大利亚作为英国的流放地,欧洲殖民者也逐渐承担起自治的责任。澳日都开始注意身边更广阔的世界,成为各自历史上重要转折时期。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作为东亚强国的崛起对澳大利亚基于肤色和种族思想的“白澳原则”产生了重大冲击。澳大利亚自认是欧洲英国人,种族主义感极强;而日本,自明治维新起,通过模仿西方的先进思想与技术,放弃了之前的“攘夷”政策,变成了一个现代化国家,向欧美靠拢,其目的是增加国家繁荣并加强军事力量,其目标是希望以此赢得西方对日本的尊重。紧接着澳日关系于 19 世纪的下半叶进行了最初的接触, 由来到澳大利亚北部海岸线的日本探珠潜水员和来到昆士兰北部蔗糖种植园的日本契约劳工作为先驱。但是之后澳日关系之间的矛盾也渐露水面。第一个矛盾便是种族立场的对立。一系列事件促使澳大利亚从最初对中国的种族焦虑转向了对日本的种族焦虑。

关键词 澳日关系 澳大利亚 日本 种族

本世纪以来,澳日关系从以美国为“轴心”的三边关系,逐渐向强化日澳双边关系“微调”。2001 年 7 月,时任美国国务卿的鲍威尔在访问澳大利亚时提出,澳、日两国均是美国盟友,且两国关系紧密,应该强化三边安全合作。2007 年 3 月,安倍首登相位后,签署了《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正式确立了双边“安保关系”。同年 6 月 6 日,澳大利亚和日本举行了首次外长和防长“2+2”安全协商会议并使之成为机制。2014 年 9 月,双方开始就《访问部队地位协定》进行磋商。如果该协定达成,澳大利亚将成为首个可以在日本临时驻军的国家。

但是,澳大利亚和日本曾经有深刻的矛盾,在太平洋战争中更是展开过殊死搏斗。而种族矛盾是当年影响两国关系的主要矛盾之一。鉴于这个课题国内尚无人系统探讨,所以笔者对相关资料进行了耙梳整理,对该问题进行初步探究。

一

澳日关系是东西方接触和东方对西方扩张回应的一个侧面; 是欧洲帝国主义不断扩张而麻烦不断的传奇故事的分支;是欧洲国家在其文化和精神遗产的伴随下,在海外投射其技术和军事力量的一部分。从 16 世纪到 20 世纪初,欧洲人探索并绘制了地图,同时直接或间接地试图统治地球的每一部分。

当时,在欧洲人眼里,所有欧洲以外的世界中,东亚被视为最遥远、最神秘、最难以渗透和控制的地区。在这里,西方发现了高度发达并决心与“野蛮人”保持一定距离的文明。作为那时“世界中心”的中国,很难想象欧洲人除了向中国表达敬意之外,还会寻求其他东西。明清王朝的皇帝相信他们伟大的帝国能够战胜这些入侵者。另一边,日本作为一个岛国感到脆弱与孤独,在目睹了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干涉其内政的令人不安的结果后,在 17 世纪中叶

关闭了对外国人的港口,并将自己与世隔绝。直到两个世纪以后,西方列强才得以强行打开这两个国家的大门,并将东亚纳入它们的国际体系。但即便如此,西方也从未征服过中国和日本。虽然中国内部朝代更替,但却从未被征服。至于日本,则通过吸收西方成功的秘诀而顺应了近代化潮流,并通过"尊王攘夷"而走完了形成传统民族主义的最后一步,成为世界新秩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澳大利亚是欧洲帝国主义时代的最后一个产物。这个英国殖民地建立在世界另一端的南太平洋地区,是西方全球霸权的重要象征。对于定居澳大利亚的欧洲移民来说,日本是他们了解亚洲和定义自己的中心。在 19 世纪后期,熟悉日本的少数澳大利亚人被这个"东方"民族所吸引,认识到这个民族没有屈服于欧洲帝国的强大力量,而是通过学习西方把自己转变成一个近代化国家,并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

澳大利亚之于日本从未比日本之于澳大利亚来的重要。日本在寻求西方化和定义自己与西方对抗时,直接把目光投向了欧洲和美国。因此,澳大利亚只是英国的殖民地,是原始文化的一个边缘分支;澳大利亚人与欧洲人和美国人相比,显得微不足道。日本在向世界开放并鼓励移民和贸易之后,遇到了澳大利亚。如果说澳大利亚在日本人心目中是突出的,那就是在"白澳政策"下给日本带来最大耻辱的西方国家。

澳大利亚人和日本人最初的交往发生在 19 世纪下半叶。此时,日本人正从幕府统治下的长期隐居中走出来,澳大利亚殖民者正在他们的新土地上扎根,承担起自治的责任。它们都开始注意到周围更广阔的世界。[①] 对澳大利亚和日本来说,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期,一个冒险和进取的时期,是它们各自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在日本,随着打开国门的压力越来越大,德川幕府观察到欧洲列强迫使中国屈服后,最终决定接受西方的要求,而不是使日本被外国人的超级武器摧毁。1853 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Matthew C. Perry)指挥的一支海军中队抵达江户湾(东京湾),使日本开放门户的问题进入到紧要关头。美国政府指示佩里说服日本人开放他们的港口,向商业、煤炭供应和船只失事的海员开放。[②] 佩里第二年回到日本时,和日本签署了《神奈川条约》,根据条约,日本同意向滞留的美国海员提供庇护,允许在规定港口进行贸易,允许华盛顿任命一名领事。然而,美国对日本这些有限的让步并不满意。四年后,日本被迫与美国签署了一项商业条约,即《美日通商条约》,规定交换外交代表,向美国开放更多的贸易港口,为进口设固定关税,并给予美国人根据本国法律在自己的领事法庭接受审判的"领事裁判权"。随后,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西方国家也要求享有同样的特权,日本别无选择,只能给予这些国家类似的条件,形成了所谓"安政五国条约"。[③]

日本的闭关锁国时代在西方的威胁下结束,令当时幕府统治下的封建社会深感不安。在一场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反对德川统治的倒幕运动之后,幕府被推翻了,天皇重新掌握了权力。1868 年明治天皇重新掌握权力后,日本的改革者意识到,欧美人是不可能被赶走的。日本维护其主权的唯一途径,就是掌握西方的知识,把日本变成一个近代化的国家。因此,日本的新政权沿着西方的路线重建了国家和社会。"五条御誓文"不仅宣布日本人应该有自由从事自己选择职业的权力、国家利益应该高于一切,而且应该抛弃旧日的基本习俗并在全世界寻求先进知识。为达到这一目的,日本政府向欧美国家派出了考察团,以了解西方先进的秘密,特别是技术和科学方面。1860 年至 1890 年间,日本政府派遣了约 900 人到国外学习,同时聘请了 3000 多名欧美专家来协助日本国内的改革计划。在 19 世纪末的 30 年里,日本传统的

等级制度被废除，日本政府引入了现代工业和金融体系、现代化的交通和通讯手段、中央集权化的国家管理制度、全民义务教育计划和全国征兵制度。日本改革者的意图是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希望以此赢得西方对日本的尊重。[④]（本段翻译的痕迹明显，建议调整表述）

起初，许多日本改革者都曾寻求“文明开化”以及物质进步和成功，他们认为日本的风俗、价值观和哲学是过时的。于是，日本改革者在衣着、发型、饮食、娱乐和建筑方面都推进沿袭欧美的风格，他们甚至试图将欧美的社会思想融入日本的法律、政治和教育机构。在明治维新初期，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相当流行的思想。然而，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日本人就开始反对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西方化。日本人经历了欧洲人的傲慢，目睹了他们的帝国统治和敌意。此外，与之前的欧美人一样，日本人发现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变非常令人不安。[⑤] 虽然在德川时代结束时，日本改革者开始认为日本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但直到19世纪末的明治维新社会变革之后，这些思想才变成了一个民族神话。这一神话将共同的种族传统，人格化为天皇的神圣形象，将这个流动的、充满活力的社会，锚定在一种日本特性的确定性民族的特性中。日本可以借鉴欧美以获得物质和军事力量的手段，但不应放弃其民族本质。通过向西方学习而获得的力量，后来被日本用以实现国家目的，以确保自己的独立，甚至可能是整个东亚的独立。[⑥]

二

从19世纪80年代末起，日本开始采取极端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1889年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了新的政体，天皇被尊为绝对神圣的君主。虽然宪法表面上遵循了德国的模式，但它所体现的精神却是日本的。虽然政府的形式是西方的，包括首相、内阁、议会，但其运作方式是日本的。[⑦] 日本希望西方列强能平等地接受日本的愿望，并因此助长了民族感情的高涨。日本人痛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欧美国家对其的“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实际上剥夺了日本的主权，使日本处于弱势国家的地位。日本人对这种侮辱的愤怒是非常强烈的。因此，日本历届政府均急于接受西方制度并采用西方法律和商业法规，以证明自己也是“文明国家”。

1894年，随着《日英通商航海条约》的签署，日本取得了证明自己的第一次突破。根据条约的规定，英国同意放弃其领土外的权利。此后不久，其他大国也同意效仿英国的做法。[⑧] 英国的决定是对日本文明进步的承认。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击败了中国，之后向俄国发出挑战，在台湾和澎湖列岛获得了殖民地，并在朝鲜半岛获得了主要影响力。这使英国不敢小觑日本。因此，英国开始认为日本可能是其在亚洲对抗俄国的盟友。1900年，日本与西方主要国家一起向北京派遣军队，帮助平息义和团运动，这表明了日本在国际上的新地位。《日英通商航海条约》预示了日本在东亚和世界上的新角色。正如一名日本官员当时总结的那样，“我们可以庆幸自己一举扫除了过去二十年的耻辱并大步迈进了‘国际关系’队伍”。[⑨]

在这段时期，虽然澳大利亚也经历了类似的建立自己与亚洲达成协议的过程，但澳大利亚和日本的经历有明显的不同。首先是规模问题。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时，人口只有300万，而日本有4900万。澳大利亚不能假装是一个地区强国。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与日本不同的是，澳大利亚没有把欧洲视为其独立的敌人。澳大利亚不属于亚洲，澳大利亚人在新大陆建立西方制度时，并不认为这些形式和结构是外来的；相反，作为一个欧洲人定

居的社会,即使在实现自治后,他们仍然继续认同自己的英国传统,并向英国寻求文化价值和国家安全。虽然澳大利亚人越来越意识到他们靠近亚洲,且这导致了他们与祖国在移民、国防和太平洋政策等问题上的分歧,但是却强化了他们的“种族爱国主义”,他们对亚洲的焦虑主要集中在 1888 年著名的自由改革家亨利·帕克斯(Henry Parkes)所说的如何“保持英国特色”。与日本不同的是,澳大利亚并不是出于保护一种造成其和西方之间紧张关系的国家本质的愿望,而是因为澳大利亚的英国人担心,他们的母国会认为他们是可以牺牲的,并将他们抛弃在数以百万计的亚洲人中。[10]

澳大利亚作为殖民地于 1788 年建立,当时作为英国的囚犯流放地。到 19 世纪中叶,澳大利亚吸引了许多自由移民,他们被羊毛和黄金带来的机遇吸引到了南方大陆,开始着手在另一个半球创建一个“新不列颠”。这些移民把土著居民赶走,占领了土地,并开始大声要求获得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他们主要是英国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的后裔,他们不仅带来了英国文化,而且还带来了英国的自由主义愿景,尤其是体现在民主宪章运动中。[11]

19 世纪 50 年代,澳大利亚殖民地在古典自由主义的鼎盛时期获得了地方自治。英国当局认同这些自由主义的假设,一致认为殖民地是母国的负担。英国当局从美国独立战争中吸取了经验,承认距离会产生利益冲突,被殖民者不会长期屈从于伦敦的统治,殖民地会不可避免地像帝国树上的成熟果实一样掉落。殖民者不必为自治而斗争。相反,英国人非常高兴自己摆脱了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开销和责任。[12]

然而,这个“新不列颠”正在一个亚洲的世界里生根发芽,从这个时候起,亚洲开始像地平线上的乌云一样出现。尽管在西方列强入侵之前,亚洲各国人民都步履蹒跚,但欧洲殖民者却不得不为他们与这个陌生大陆的接近而感到不安。从这些澳大利亚人第一次接触另一个世界,即通过中国移民,他们听到了焦虑的声音,质疑这可能预示着什么。早在 1851 年,《悉尼先驱晨报》就对这种危险发出了警告:“由于殖民地是‘英国臣民的社区’,他们不应该欢迎来自世界任何地方的大量不断的外国人进入殖民地。其中,中国人尤其感到气馁,他们与英裔澳大利亚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肤色、语言和习俗,实际上除了人性之外,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无法被带入英国人所理解和珍视的真正文明。”[13] 澳大利亚殖民者担心亚洲会像他们自己征服土著人一样征服他们。随着在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发现黄金后大量中国人的涌入,这些担忧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形式。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维多利亚州约有 42000 名华人,新南威尔士州约有 15000 名华人;也就是说,每七个维多利亚人中就有一个是华人,而在新南威尔士州男性人口中,每十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华人。欧洲矿工们对不得不与中国旷工竞争感到愤恨,经常诉诸暴力将他们逐出采掘区。但掘金者们很难调和他们的宪章信仰和他们的行为的矛盾,即信仰是“所有人生来就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行动是将中国人排除在金矿之外。在 1854 年维多利亚皇家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他们的一位领导人坚称,这一原则不适用于中国人,因为“他们不文明”。当有人指出他们认为自己是“高度文明的人”,并被问到谁来评判文明的问题时,矿工代表只能提供以种族为中心的答案,即“整个欧洲历史和亚洲部分地区的历史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文明”。[14]

三

19 世纪末,澳大利亚人和日本人一样,经历了一场社会心理革命,这场革命改变了他们

对君主制、民族和种族的看法。随着澳大利亚殖民地像日本一样,经历了运输和通信、商业和工业、教育和意识形态等现代化的全面影响,他们成为了一个以城市为主导的大众社会。在澳大利亚,与日本和其他较晚实现近代化的国家一样,国家在推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修建铁路,保护制造商,调节劳资关系,建立全民教育和征召士兵。澳大利亚人效仿其他近代化国家的模式,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新的、强烈的身份认同,这使他们能够应对这些令人深感不安的变化。与日本人不同,澳大利亚人由于社会革新的迅速和地理文化环境的特殊性,采取了一种更为极端和排外的民族主义。[15] 为达到这一目的,澳大利亚人响应了新一代英国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号召, 首先把自己定义为盎格鲁 - 撒克逊或盎格鲁 - 撒克逊 - 凯尔特种族的成员。这些新帝国主义者谴责自由主义抛弃了散居海外的英国人,"大不列颠"散布在全球各地,他们与自由主义者不同,他们敦促帝国重新整合。他们鼓励英国人对"种族"和"血统"感到自豪。议会制度被视为英国人民特殊才能的体现。王室不再是宪法的首脑。君主被重塑为英国历史和遗产的象征,是英国民族思想的个人体现。在这些情绪的影响下,英国政府于 1887 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 50 周年之际,将帝国各地的代表带到伦敦,召开了第一次自治殖民地会议。[16]

在澳大利亚,这种"种族爱国主义"学说受到极大的欢迎。通过普及义务教育而崛起的一代被社会化,成为帝国的信条。教室里的教科书,操场上的仪式,都有助于传播英帝国主义的准宗教。大众媒体在接触新一代有文化的群众时,宣扬了帝国的理想。1888 年 1 月,随着悉尼皇后广场维多利亚女王雕像的揭幕,迎来了欧洲殖民 100 周年庆典仪式。[17]

种族忠诚的新精神,最明显地体现在殖民者对帝国战争的支持上。1885 年,新南威尔士州殖民地总理派遣一支军事特遣队,帮助恢复英国在苏丹的威望。他宣称:"我们不会停止质疑,我们只知道英国人的鲜血、澳大利亚人的鲜血已经流出……我们也会做出相应的反应。"同样,在布尔战争期间,澳大利亚首任总理埃德蒙·巴顿(Edmund Barton)宣称:"澳大利亚人参战无论对错都是为了大英帝国。"[18] 超过 16000 名志愿者在南非为帝国事业而战。当帝国处于战争状态时,民主和平等主义的澳大利亚对异议的容忍度低于传统的阶级结构的母国。为了纪念这种新的世俗信仰,澳大利亚在 1905 年设立了帝国日,比英国早了十年。可以说,英国的种族观念在重塑澳大利亚的社会认同方面比英国本身更成功。

从 1871 年普鲁士击败法国开始,澳大利亚就认识到国际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一个民族之间而不是王朝之间斗争的时代。正如《悉尼先驱晨报》的社论所言:"这开启了一个种族战争明显已经开始的时代。澳大利亚再也不能免受世界冲突的影响。距离已不再是抵御外来威胁的安全保障。澳大利亚,以及所有其他国家和大陆,都被卷入了'国际竞争的大网'中"。[19] 起初,英国的欧洲对手将他们的帝国野心扩展到了太平洋,法国人在新赫布里底群岛,德国人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部,俄国人在东北亚。借鉴美国的做法,澳大利亚呼吁英国支持"南太平洋门罗主义",其目的是阻止其他所有大国在该地区获得殖民地。根据这一原则,他们希望创建一种防御外部威胁的警戒线。

但到 19 世纪末,澳大利亚更关心的是觉醒的亚洲,而不是欧洲的入侵。查尔斯·皮尔森(Charles Pearson)是一位英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约在普法战争期间移居到澳大利亚,后来成为维多利亚时期的教育部长。他在《国民生活和特性:预测(1893)》一书中概况了澳大利亚对亚洲的许多焦虑,此书在有关"白澳政策"的辩论中经常被引用。皮尔森在澳大利亚的生活使他认识到大众民主、国家社会主义和种族同质性的美德和必要性。他承认,在近代社会,

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取代了对当地社区和君主的忠诚。对他来说，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是“把同种族的人联系在一起”，它培养了任何奇特事物的存在，比如独特的文学，礼仪，服饰和性格；在民族主义下，国家和社会趋于融合，公民被要求为了整体利益而牺牲财产、自由或生命。[20]

澳大利亚对亚洲的恐惧最初集中在中国。在 19 世纪 80 年代，由于华人移民数量的小幅增长，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移民的敌意再次出现。尽管华人在殖民地的比例比早期淘金热时期少得多，但澳大利亚人的反应却表现出毫不妥协的态度。这种对中国人更大的敌意，部分源于殖民当局意识到清朝的国力及其保护国民的决心，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敌意是由种族主义情绪激发的。反华联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兴起。虽然这些联盟往往是由新兴工人运动的领导人领导，但却得到社会的普遍支持。[21] 在 1888 年的一次会议之后，澳大利亚殖民地通过了统一的法律，几乎禁止华人移民和华人入籍。殖民地政府为这些措施辩护时，并不是根据具体情况，而是根据种族的绝对原则即“白澳原则”。皮尔森就此解释说：“澳大利亚民主所珍视的对中国移民的恐惧，实际上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是由澳大利亚过去的经验总结所得。”[22]

四

在阻止中国人入境后不久，澳大利亚的焦虑就转向了日本。19 世纪 90 年代初，日本人开始主导澳大利亚北部海岸线沿线的採珠潜水员，同时在昆士兰北部的蔗糖种植园当契约劳工。几乎同时，《英日通商航海条约》迫使英国各殖民地正视日本移民问题。英国政府在与这些自治殖民地就中国移民问题经历了困难之后，决定让各殖民地自行决定是否加入该条约。澳大利亚表示不愿意加入，因为对条约中允许日本人“进入、旅行或居住”在大英帝国任何地区的这项条款感到不安。澳大利亚不愿再容忍另一个中国问题，尤其是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击败中国之后，日本已崛起成为亚洲强国。因此，澳大利亚通过在法律中体现他们对社会的种族观点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法律禁止所有“有色人种”进入澳大利亚。因此，导致澳大利亚歧视日本人，认为日本人是亚洲和非洲“不文明”的民族之一。[23]

1896 年初，在一次旨在主要处理国防和不良移民问题的殖民地总理会议上，这两个紧密相连的主题，除了缺席的西澳大利亚之外，所有殖民地都一致拒绝加入《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并同意通过统一立法，禁止所有“有色人种”移民到澳大利亚。这项针对“有色人种”移民的全面禁令主要针对日本。正是日本的能力使殖民地看到了最大的危险。新南威尔士州议会的一位主要成员支持《有色人种限制和管理法案》，该法案旨在成为所有殖民地的典范，他宣称，“我们建议将一个在能源、智力和物质资源方面进入一流水平的日本拒之门外。”[24]

日本政府对这种“种族歧视”感到不满，认为澳大利亚将日本人与低等、未开化的有色人种混为一谈，与欧洲人被区别对待。在赢得西方大国的尊重之后，日本发现自己在这些自治的小殖民地手中也蒙受了同样的屈辱。日本人向英国政府提出抗议，这是一个感情问题，事关日本的自尊。在日本外交人员的斡旋下，在伦敦的压力下，澳大利亚的《有色人种限制和管理法案》被驳回，但是在 1897 年，其《移民限制法案》却得到了通过，这是第一部旨在将所有有色人种排除在澳大利亚殖民地之外的总则。[25]

并不是所有的殖民地都以新南威尔士州为榜样。令其他殖民地反感的是，昆士兰食言并加入了《英日通商航海条约》。昆士兰希望享有贸易优势。但是它坚持认为，作为遵守条约的

一个条件,应该有一项限制劳工和契约劳工入境的君子协定。到 1900 年,殖民地昆士兰与东京达成协议,这类日本人不能超过现有的 3247 人。[26]

然而,尽管澳大利亚各殖民地未能维持统一战线,但到 1901 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时,各州就保护"白澳政策"达成共识,这一术语在 19 世纪 90 年代流行起来。事实上,英联邦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整个殖民地对国防和移民、国家安全和种族纯洁性等相关问题的关注。在第一次联邦选举中,所有的政党都争先恐后地证明他们对"白澳政策"的忠诚。当联邦政府将《移民限制法案》作为其第一项主要立法提交议会时,没有一个反对种族歧视原则的声音。唯一值得辩论的问题是法案的规定是否足够严密,以确保预期的结果。澳大利亚首任总理埃德蒙·巴顿引用了皮尔森关于种族竞争的警告, 当时的总检察长阿尔弗雷德·迪金(Alfred Deakin)明确表示,该法案的唯一目的是维护"我们种族的纯洁",又一次,日本人被澳大利亚认为是对这一原则的最大威胁。[27] 这种对中国人的怨恨,同时向日本人辐射,并因此激化了澳日之间的种族矛盾。

注　释:

①Neville Meaney, *Towards a New Vision: Australia and Japan through 100 Years*, Sydney: Kangaroo Press, 1999, p.11.

②Arthur Walworth, *Black Ships of Japan*, New York, 1946, p.71.

③W. G. Beasley, *Japan Encounters the Barbarians: Japanese Travelers in America and Europe*, New Haven, 1995, pp.37-38.

④Neville Meaney, *Towards a New Vision: Australia and Japan through 100 Years*, Sydney: Kangaroo Press, 1999, pp.11-12.

⑤Albert M. Craig, *Japan: A Comparative View*, Princeton, 1979, pp.3-8.

⑥Ronald P. Toby, *State and Diplomacy in Early Modern Japan: Asia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kugawa Bakufu*, Princeton, 1984, pp.219-246.

⑦G. B. Sansom, *The Western World and Japan*, New York, 1970, pp.362-366 and 464-465.

⑧Ian H. Nish, "Japan Reverses the Unequal Treaties: The Anglo-Japanese Treaty Commercial Treaty of 1894",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Vol.13, 1975.

⑨Ian H. Nish,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The Diplomacy of Two Island Empires, 1894-1907*, London, 1966, p.11.

⑩Neville Meaney, *Towards a New Vision: Australia and Japan through 100 Years*, Sydney: Kangaroo Press, 1999, pp.13-14.

⑪Neville Meaney, *Towards a New Vision: Australia and Japan through 100 Years*, Sydney: Kangaroo Press, 1999, p.14.

⑫Neville Meaney, *Towards a New Vision: Australia and Japan through 100 Years*, Sydney: Kangaroo Press, 1999, p.14.

⑬*Sydney Morning Herald*, 6 November 1851-11-6.

⑭C. A. Price, *The Great White Walls are Built*, Canberra, 1974, p.10.

⑮Neville Meaney, *Towards a New Vision: Australia and Japan through 100 Years*, Sydney: Kangaroo Press, 1999, p.15.

⑯D. Cannadine, *The Context, Performance and Meaning of Ritual: The British Monarchy and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in E. Hobsbawm and T. Ranger, eds.*, Cambridge, 1983, pp.101–164.

⑰Neville Meaney, *Towards a New Vision: Australia and Japan through 100 Years*, Sydney: Kangaroo Press, 1999, p.16.

⑱N New South Wales, Parliamentary Debates: Legislative Council, 1884–1885 Session, 1885–3–17 (XVI), pp.5–9; New South Wales, Parliamentary Debates: Legislative Council, 1889 Session, 1889–10–19 (C), pp.1495–1496.

⑲*Sydney Morning Herald*, 1870–12–31.

⑳Charles Henry Pearson, *National Life and Character: A Forecast*. London, 1893, pp.89–90, 115, 190–191, 197, 200.

㉑Neville Meaney, *Under New Heavens*, Melbourne, 1989, pp.402–403.

㉒Charles Henry Pearson, *National Life and Character: A Forecast*, London, 1893, p.17.

㉓Neville Meaney, *Towards a New Vision: Australia and Japan through 100 Years*, Sydney: Kangaroo Press, 1999, p.17.

㉔Neville Meaney, *Towards a New Vision: Australia and Japan through 100 Years*, Sydney: Kangaroo Press, 1999, p.17.

㉕Isami Takeda, *Australia–Japan Relations in the Era of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Sydney: Univ. of Sydney, 1984, pp.15–44.

㉖Peter Drysdale, Hironobu Kitaoji, *Japan and Australia: Two Societies and Their Interaction*, Hong Kong: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81, p.41.

㉗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 1901–1902 Session, 1901–8–7 (III), p.3503; 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 1901–1902 Session, 1901–9–12 (IV), pp.4812–4816.

（孙雪晴：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胡令远）

婚姻的空壳

——大庭美奈子《三只蟹》论

王天然

内容提要　短篇小说《三只蟹》(1968)是日本作家大庭美奈子(1930-2007)的成名作,首次发表在1968年7月的杂志《群像》上。该作品以20世纪60年代美国阿拉斯加的一个小镇为背景,讲述了旅居于此的日本人由梨所经历的围绕婚姻家庭与社会关系的彷徨与挣扎。作为作品的题目,"三只蟹"这一意向具有重要意义。本论文欲在现行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符号学、身体论等研究方法,探明"三只蟹"这一符号背后的含义,以期对作品进行新的把握。

关键词　大庭美奈子　三只蟹　家庭场域　婚姻

短篇小说《三只蟹》(1968)是日本作家大庭美奈子(1930-2007)的成名作,首次发表在1968年7月的杂志《群像》上。该作品以20世纪60年代美国阿拉斯加的一个小镇为背景,讲述了旅居于此的日本人由梨所经历的围绕婚姻家庭与社会关系的彷徨与挣扎。作品凭借其对异国生活的全新展现和女性出轨的独特内容,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新鲜感,[①] 获得第59届芥川文学奖。迄今为止的先行研究,或着眼于战后、客居美国等关键词,对"自我"、"身份认同"和"故乡"、"归属"等问题进行探讨;或着眼于女性出轨的内容,分析作者对母性、生育等问题所进行的解构,鲜有对本作品题目所选用的"三只蟹"这一意象的解读。作家在处理不同国籍的人物时,自动过滤掉了语言障碍,可见作品的表现重点并非客居、归属问题;对母性、生育问题的解构只是作品的局部展现,并不能从整体对作品进行把握。而作为作品的题目,"三只蟹"这一意象的重要性无需赘言,先行研究之中却鲜有与其相关的深入分析与探索。因此,本论文拟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从符号学、身体论的角度入手,通过文本细读,试图通过解读"蟹"这一意向,探明"三只蟹"这一符号背后的含义,以期对作品进行新的把握。

一、由梨的家庭之场

作品采用倒叙方式展开,在开头部分便着重强调了"蟹"的意象。"蟹"的出场有赖于主人公由梨的一场逃离,这场逃离则从由梨所处的家庭之场而始。

生活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由梨一家是典型的美国新式家庭:丈夫武拥有体面的工作,是名产科医生;妻子由梨是全职家庭主妇,对一家人的起居照顾有加;夫妇俩育有可爱的女儿梨惠,时年十岁。夫妇俩结交了一群生活在美国的中产阶级朋友,并会在周末举办家庭桥牌会招待他们。这些朋友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其身份分别是文学研究家、物理研究家、教堂神父、画家等等。由梨一家男主外女主内的核心家庭是战后美国中产阶级的典型家庭模式,由梨扮演的便是被大众传媒塑造的"幸福的主妇"这一形象。[②] 然而冠冕堂皇的表面之下,由梨感受到的则是一地鸡毛。丈夫武对她的内心感受不管不顾,习惯性地站在高处对她的行为

进行评判和指导,打击由梨的自信心,并借此来彰显自己的能力。女儿梨惠对母亲感情冷漠、甚至嫌弃。由梨与丈夫和女儿之间并不存在家庭成员之间的温情,看似幸福的核心家庭仅仅维持了一个表面的形式。

周末,丈夫武会招揽朋友到家里开桥牌会,为此忙前忙后的却是妻子由梨。作为女主人,由梨表面上尽心尽力张罗丰富的茶点给诸位客人,实际上则毫不情愿。

"由梨混合着做点心的面粉,胃里隐隐作痛起来。她机械地打鸡蛋、混合黄油,掺入烘焙粉和盐,感觉自己像是要孕吐了一般,唾液都涨到了喉咙眼里。"(大庭美奈子:262)[③]

由梨不喜欢丈夫办的桥牌会和前来参加的朋友们,连为他们准备点心的事情都让她产生了生理厌恶。她以胃痛为由,借口有急事要出门,想要逃离这场聚会。丈夫武则拘泥于形式,认为桥牌会必须要有女主人在场。

"哪有女主人缺席的桥牌会呀。"(大庭美奈子:264)

无奈之下,由梨为这场聚会准备好了点心酒水,并客气地打电话,拜托自己向来讨厌的松浦小姐扮演女主人的角色。由梨表面上为桥牌会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但还是忍不住向丈夫吐露了她内心的诅咒。

"(由梨对丈夫说)'我在这个点心上只有一个梦想,就是让那个萨莎和松浦小姐胖成猪,得心脏病。'"(大庭美奈子:267)

对此,武则选择无视妻子内心的不满,并在之后当着由梨最讨厌的萨莎和松浦小姐的面对由梨冷嘲热讽。由梨编造谎言,声称要临时外出见亲戚,并亲自向客人们解释之后再离开。随后,这些朋友们逐渐汇聚到由梨家这个场域,并展开了表面上其乐融融的对话。然而,由梨夫妇与他们的朋友,以及这些朋友之间,看似关系和谐,实则充斥着谎言与欺骗。由梨与文学研究家弗朗克有肉体关系,又与物理学家横田先生搞暧昧;她的丈夫武与歌唱家萨莎和松浦小姐暧昧不明;横田先生在妻子面前与萨莎调情;弗朗克当着武的面与由梨调情;萨莎与武、弗朗克、巴拉诺甫神父、横田先生等多名男性有肉体关系,他们一边"享用"她,一边嘲弄她;画家隆达与弗朗克等多位男性游戏人生……在由梨家这个屋檐之下,外表形式上的和谐与实质内容上的混乱产生了巨大的对立,无论是由梨一家三口内部,还是他们与朋友、以及朋友互相之间。而由梨的家这所建筑物恰恰成为了容纳这一切的场域。丈夫武想要维持的只是形式上的完整,正如建筑物外表的光鲜亮丽。这恰恰是由梨极为厌恶的,她由此产生了"想吐"这一最直观的身体反应。

"想吐,到了头晕的程度。让她想吐的毒气是从自己的身体里生出来的,要想把它止住,除了把自己的肝脏之类的脏器切除之外,别无他法。"(大庭美奈子:284)

面对这样伪装的人们,由梨选择离开。她不仅要逃离这表里不一的人群,更要逃离自家的房子,这一掩盖了所有污浊本质的场域。

二、由梨的逃离之路

由梨独自一人驱车离开,毫无目的。她知道自己想要逃离什么,却不知道自己想要得到什么。她无意间来到一处游乐园,这里正在举办阿拉斯加·印第安民间艺术品展览。在无人而昏暗的会场中,摆满了既像面具,又像帽子的各色头套,它们都有着动物头面的形象,如两眼放光的妖怪一样盯着由梨。

“一只乌鸦的头套，其眼睛上扬如人眼一般，长而恐怖的喙像帽檐一样从前额探出来，露出栩栩如生的温暖的红色舌头。（中略）这是一副将人类与乌鸦混同起来的有生命力的奇妙的面具。”（大庭美奈子：294）

乌鸦作为古印第安人的一种图腾动物，[④] 其本身体现了古印第安人对原始力量的信仰。而这个木质的乌鸦头套用抽象的图案化的线条雕刻出来，点缀的颜色也选用了红、黄、绿、黑等原色。面具本身也可被看作是一种图腾，正如由梨所感受到的一样，它体现了人类文化与自然范畴的融合。其形式不管是面具也好，帽子也好，原始之力都从中毫无遮拦的直接喷发而出。形式的重要性被其内容的冲击力所取代，这不再是表面的冠冕堂皇，而是呼之欲出的真情实感。由梨从中感到的是人类与动物共通的、来自自然界的真情实感。

“在灰暗的会场中，由梨听到了人类唱诵祈祷与咒文的低语。”（大庭美奈子：294）

“祈祷与咒文”来自原始人类的祭祀活动，溯其根源则是人类对于自然和超自然之力的敬畏与崇拜。[⑤] 这是人类原始的低吟，不同于丈夫武和那群朋友们拼命维护的表面形式上的光鲜，在这里，由梨看到了表面形式所不能提供的原始能量。在由梨徒有形式的生活里，这种原始之力离她太遥远了，她为之深深吸引。可以说，正是她自身对于摆脱形式、回归内心与原始欲望的渴求，才将她引向了这条逃离之路。

会场即将停止营业，由梨在此与身着粉衬衫的会场看守员偶遇。行无目标的由梨便与“粉衬衫”一起消磨时光。两人漫无目的地聊起了各自的出身、家庭和婚姻。

“‘你喜欢粉衬衫呀？’

由梨说。

‘也不是啦。我妻子给我买的。’

‘粉衬衫’说。

‘这颜色真好看。’

由梨看着‘粉衬衫’的结婚戒指说到。

‘妻子的活儿不好做吧。’

‘粉衬衫’说。

‘谁知道呢？大概跟丈夫的活儿差不多吧。’

‘都不是什么轻松活儿。’

‘粉衬衫’说。

‘是呀。’

由梨附和着。”（大庭美奈子：299-300）

在这段对话里，随着婚姻制度而来的“妻子”与“丈夫”的身份成了一种职业，但无论是哪一方都并不享受这份工作。由梨随之想起了她与武的恋爱往事，她带着爱情走进婚姻，却发现自己在婚姻制度冠冕堂皇的外表之下失去了相爱的实质内容。对此，丈夫武并不在意。婚姻让由梨痛苦，武却处之泰然。在桥牌会之前的闲谈中，武这样说到：

“‘我们离婚的判决—我是说假设呀—反正也不会在美国进行。在日本还是基本上对男方有利的。’

‘不。即使在美国，也是向着男人这方的呀。’

萨莎说。”（大庭美奈子：283）

武也好，萨莎也好，他们都看到了父权制婚姻制度对女性的不公。男性“在婚姻中寻找自

己生存的扩大和确认”,女性则成为男性的仆从。[6] 武深谙其道,享受着婚姻制度带给自己的利益,萨莎看清了这个事实,用行动拒绝了婚姻制度对自己的约束,而由梨则为其所困,痛苦不已。

与“粉衬衫”在一起时,由梨突然想起了大学同学 A 子。由梨记得她那如熟透了的草莓一般的红唇,记得她们一起赤脚走在茱萸原上,一起在乌黑的海中游泳。

“当夜色逐渐变亮之时,两个人都觉得自己如人鱼般美丽。那正是如人鱼般美丽的年龄呀。”(大庭美奈子:312)

由梨与 A 子的感情带着几分同性恋一般的情愫,但却显得如此“滑稽而可悲”(大庭美奈子:312)。她与 A 子并未展开彼此的关系,而是各自结婚。婚后的由梨对这一场景的回想,是她对现有亲密关系和婚姻状况的反观。显然,父权制所形成的异性恋霸权下的婚姻这一形式并不能容纳同性之间的爱情。

“粉衬衫”与由梨在游乐园里闲逛,并邀请她一起乘过山车。速度、高度与激情带来的冲击唤起了由梨心底被压抑已久的情感。这场逃离以由梨回归内心的原始渴望为由,她与“粉衬衫”的偶遇便必然走向了对身体原始欲望的追求。这一追求不受人类社会道德、法律规范、纲常伦理等的约束,是单纯的对身体本能的寻觅。这驱使着由梨终将与“粉衬衫”走进这家名为“三只蟹”的海边旅馆。

三、由梨与“三只蟹”

“‘三只蟹’的红色霓虹灯在灯心草丛深处时隐时现。男人并不渴望女人,只是这样做能感到愉悦。男人的空虚与哀愁传给了由梨,在这里转变成温柔的和谐。”(大庭美奈子:313)

对于“粉衬衫”来说,与由梨的相遇只是一个随机事件,他尽情地释放自己的负面情绪,而由梨却将其收纳并转换成了令男人愉悦的状态。正如婚姻之于男女的不平衡一样,哪怕是在这场游戏中,男女之间主动与被动的关系也被展现的十分明显。男性的享受建立在女性的付出之上,因而他们总是更容易主动出击。“粉衬衫”用下巴指了指“三只蟹”的旅馆招牌,无言地向由梨提出邀请,她对此不置可否。灯光时隐时现的招牌隐藏在草丛之中,在夜色中看不真切。

“由梨把脸颊靠在玻璃窗上眺望大海。她想起了弗朗克·斯坦因向外扩张的、皮肤很薄的鼻孔,想起了萨莎·拉普辛斯卡耶厚厚的嘴唇,想起了呼呼呼笑的横田夫人鼻翼生出的贫乏的皱纹。她接着又想起了武的砰砰砰压弯铝的声音,和梨惠的‘嗯,那可是不良少女呀’的像敲打黄铜般的声音。这父女俩都有一种带着金属性的声音。”(大庭美奈子:313)

“三只蟹”的招牌让由梨想到了很多人。按照时间顺序,这是作品中由梨与“蟹”第一次产生联系。其实,本作品采取倒叙的写作方式,在开篇处便对“蟹”的意象进行了符号化处理。

“那虽然是蟹壳,不是人脸,但不知为何,由梨总会把蟹壳和人脸联系在一起。”(大庭美奈子:260)

蟹的意象在作品一开始便被提及,却在全文的人物关系中不具备普遍意义。由梨将蟹壳与人脸联系在一起,生成了属于她自己的独特的蟹的符号意义。踏入“三只蟹”之前,浮现在由梨眼前的先是那些所谓的朋友们,之后才是丈夫和女儿。与这些朋友们的鼻孔、嘴唇和皱纹等的身体意象不同,丈夫与女儿给她了金属性的声音感受。肉体的意象是有温度的,是具

体、真实而可触摸的，而金属般的声音则是冷冰冰、飘渺而不可触及的。其实，文中给由梨带来“金属性”感受的声音不止这一处。次日清晨由梨独自一人走在海滩上时看到的水鸟也给了她相似的感受。

“大海在乳白色的雾中安静地沉睡。水草像灯芯草那么高，其间的水鸟早已醒来。它们扑扇着翅膀，发出了‘嘎嘎’的如同划过玻璃一样的啼叫声。灰色的海鸥毛色像是弄脏了的雪，它转动着橘色玻璃珠一样的眼球盯过来，傲慢地用脚刨一下沙子，又突然转过身去。”（大庭美奈子：259）

这是本作品的开篇。作品在金属性声音感受上首尾照应，由此可将水鸟的形象与由梨的丈夫和女儿相关联。核心家庭依靠性缘关系而建立，是组成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础单位，它强调夫妇与亲子之间的爱与关怀，家庭成员之间本该拥有最为亲密的联系。然而在由梨的三口之家里，丈夫和女儿给她的感受甚至不如那些表里不一、互相欺瞒的朋友来得真实。除了刺耳的啼叫声，沙滩上的海鸥动作机敏，转动着玻璃弹珠一样的橘黄色眼睛，像是在监视着由梨一样。她无法一直呆在自家房子这所空壳里。由梨通过一场逃离，离开家庭之场这个徒有虚名的空壳，而此时此地，她却望向远处的另一所建筑物。

‘三只蟹’是一座非常符合海边旅馆形式的原木小屋。它闪着绿色的灯光。”（大庭美奈子：313-314）

由梨即将踏入的这间名为“三只蟹”的旅馆，有着与人们所期待的名称相符合的形式。它在夜色中闪着的光吸引着人们走向其中。然而全文却在此处戛然而止，只着眼于其外观，对旅馆内部的样貌不做任何描述。仅凭其外表，由梨便要向其中走去。“三只蟹”的旅馆实则与由梨自家的房子无异，它用空洞的形式遮挡了内容物。作品结尾的这一处理方式也在预示着由梨次日清晨的失意离开。

四、“三只蟹”与“两只蟹”

由梨与“粉衬衫”在旅馆共度一夜。次日清早，她醒来时发现“粉衬衫”早已不见踪影。作为与由梨有大量对手戏的人物，“粉衬衫”不同于文中的其他人，他没有属于自己的姓名，仅依托衣着特点被指代。衣服也是一种外壳。可见，这个人物也是被作为一个空洞的壳的符号而配置的。由梨与他的性爱无关乎爱情，是对原始欲望的找寻与释放，是一种对本能的回归。对本能的追求本就不该期待其他的感情，抱着游玩态度的“粉衬衫”的行为也并不在由梨的意料之外。作品采取倒叙方法，从离开“三只蟹”旅馆的由梨独自一人走在被浓雾笼罩的海边沙滩上开始。然而，在全文中“三只蟹”的意象第一次出现之前，读者首先看到的是由梨脚边的两只蟹。

“仔细一看，两只蟹连在一起，在离由梨的脚趾只有二三十厘米的地方爬行。那虽然是蟹壳，不是人脸，但不知为何，由梨总会把蟹壳和人脸联系在一起。蟹的两只湿润的长长的眼睛凸了出来。两只蟹的脚纠缠在一起爬行。蟹壳两端尖尖的，整体呈现出和大海的颜色相似的暗紫色。”（大庭美奈子：259-260）

秉承着上述“蟹”的意象，眼前的两只蟹亦可是纠缠在一起的两个人。虽然雾霭浓厚，但它们是活生生的肉眼可见的真实，是可以被身体感官所察觉的实际存在。同时，它们拥有与大海相似的颜色，这正是它们与大自然的完美融合之处。而当由梨望向远处时，她看到了旅

馆“三只蟹”的霓虹灯招牌。不同于远处的灯光,眼前的两只蟹将脚部互相紧紧地缠绕。由梨作为旁观者,她看到的是两个人互相之间的羁绊。这既可以指向她与丈夫,也可以指向她与弗朗克,亦或是“女友”A 子,以及刚刚共度一夜的“粉衬衫”。同时,它们也可以指代由梨之外的任何一组一对一的人际关系,这是真实而生动的。由梨自己也是一只蟹。然而“三只蟹”的霓虹灯招牌,既遥不可及,又在浓雾中时隐时现。相比于眼前的两只蟹,“三只蟹”是不真实且无法抓住的虚无缥缈的意象,只是一所房子的名称,是一种形式,是一个空壳。“三只蟹”不具有特指性,既可以是这家海边旅馆,由梨只是一个过客,她走进去,又走出来;也可以是由梨自家的房子,笼罩住了一家三口,却徒有妻子、丈夫、孩子的人员构成和“家庭”之名,是一个单纯的形式,缺乏家之所以为家的内容;亦可以指代被父权制法律规定下来的婚姻制度,它用一个空壳掩盖了缺少爱情的实质。

夜色散去,白昼来临,之前的隐隐约约本该被清晰所取代,浓雾却又继续保持了这副空壳的朦胧。在由梨醒来的次日清晨里,雾的意象反复出现。由梨在浓雾中走向巴士站,听到一名陌生男子说着“雾散了就会有好天气吧”(大庭美奈子:259)。这名男子与由梨一起上车,他反复自言自语着“雾怎么这么浓呀”(大庭美奈子:260)。

“在渐渐消失于雾色中的深紫色大海和逐渐增强的光线中,由梨看到了‘三只蟹’的霓虹灯招牌若隐若现。不知何故,她感受到一种悲哀。”(大庭美奈子:262)

按照时间线,这是由梨在文中的最后感受。直到由梨离开之前,浓雾从未散去。但逐渐增强的阳光终将照散这场浓雾,“三只蟹”总会赫然伫立于由梨面前。她在一切都变得清晰之前乘车离开。在此之前,夜晚和雾色增加了这所旅馆的神秘,看不真切。一旦看清了,它便失去了吸引力。由梨所感到的悲哀,是因为她就要在逐渐增强的阳光中看清“三只蟹”这所空壳了,还因为她也要重新回到自己的家这所空壳了。由梨可以不去看清楚“三只蟹”的旅馆,却不得不回到被她看清了的如空壳一般的“三只蟹”的家。

结　语

大庭美奈子的作品《三只蟹》乍一看是在讲述一个家庭主妇通过出轨找寻自我的故事,但若从“两只蟹”和“三只蟹”的结构与作为符号的“蟹”入手解读,则可试图对文本进行更深入的探讨。眼前的两只真实的蟹相依相扶,这是人与人实际的羁绊。远处以“三只蟹”为名的建筑物徒有一副空壳,对局外人而言,外表的堂皇或许可以遮掩内容的一塌糊涂,但对于生活于其中的蟹来说,其中心酸只能自己消解。“蟹”的符号意义亦可带入到主人公由梨之中。她从家庭的逃离像是蟹脱离了旧壳,试图寻找新壳的一种尝试。对蟹而言,蜕壳意味着一种成长。蟹始终不能没有壳,就像人所受到的规训从来都在,只是改换了不同的形式而已。但这个壳总会随着其内容物的成长变化而被冲破。由梨踏上的逃避之路其实也是一条探寻之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形式之壳,所以她还在探寻的路上。对于没有经济来源和生存方法的由梨来说,“婚姻是她唯一的谋生手段和使她的生存获得社会认可的唯一方式”(西蒙娜·德·波伏瓦:201)。她只能在离开之后重新回到她旧的蟹壳里,她的探索之路一时间又指向了她曾经逃离的地方。但即便如此,这次短暂的脱壳也促使她对婚姻的形式进行思考。

本篇作品不同于其他大部分作品,选取了倒叙的叙述方式,先将结尾呈现出来,再一步步揭开其背后的具体内容。这一剥离的叙述方式本身也是蟹蜕壳的隐喻,“蟹”的符号意义实

则贯通作品始终。通过对“蟹”的符号意义的解读和与眼前的活生生的“两只蟹”在结构上的对比不难发现,作为旅馆名称的“三只蟹”实则指向了现代核心家庭的外在展现形式,是父权制婚姻的空壳。这种形式如蟹壳一样一直存在,蟹脱壳,依然会长出新壳。而对于由梨而言,要如何找寻一种令两性都感到舒适的婚姻之壳,这是一个漫长的探索之路。

注　　释:

①参考并总结自《群像》,2007 年 8 月刊,“大庭美奈子”特辑,第 239-278 页。

②参考并总结自自[美]贝蒂·弗里曼《女性的奥秘》,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年出版。

③本文所选取的原文引用皆由笔者所译,出自[日]大庭美奈子,《三只蟹》,东京:讲谈社,1968 年出版,下同。

④参考自[法]列维 - 斯特劳斯,《图腾制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出版。第 27 页。

⑤参考并总结自[英]詹·乔·弗雷泽,《金枝 - 巫术与宗教之研究》,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 年出版。第 1-16 页。

⑥参考并总结自[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 2》,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年出版,第 203 页。

(王天然:复旦大学日文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贺　平)

中心大事记

2019 年下半年

7 月 1 日	贺平专著《区域公共产品与日本的东亚功能性合作：冷战后的实践与启示》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7月1日	贺平主编《全球贸易摩擦：贸易政治学的新挑战》（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24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7月1日	王广涛专著《冷战后日本的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7月3日	胡令远出席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举办的“日本参议院选举与中日关系”研讨会，作主旨发言。日本原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等出席。
8月24日	贺平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主办的“东亚命运共同体与日本”研讨会。
8月30日	日本国际论坛一行来访，与中心及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日本研究学者座谈。
9月1日	王广涛译著《日本的选择》（小原雅博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9月15日	王广涛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第二届青年学者论坛，提交会议论文《中日历史和解的政治学》获得二等奖（一等奖空缺）。
9月19日	中心举办专题讲座“寻找聂耳：一个日本学者20年的研究之旅”，前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理事、中京大学教授冈崎雄儿主讲。
9月21日	胡令远出席上海外国语大学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举办的“中日韩合作与东北亚和平”国际研讨会，作《化解消极因素与中日韩合作》主旨演讲。
9月27日	中心举办系列讲座“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的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张季风主讲。
9月28日	贺平参加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主办的“水安全、水外交与区域水治理”学术研讨会。
9月28–29日	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编辑部联合举办“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的国家转型：经验与教训”学术研讨会。
10月12–13日	“中日关系青年学者国际研讨会”在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举

行。本次研讨会由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办、日本东芝国际交流财团资助，来自中日两国30余位青年学者就中日关系、日本政治外交、社会文化等议题进行了交流。

10月19–20日　徐静波参加湖北大学举办的“第九届东方国际美学大会”，发表大会演讲《日本食文化的审美倾向》。

10月26–27日　徐静波、王广涛参加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全球史中的东亚世界”学术研讨会，分别发表论文《吉野作造：一个宪政主义者的中国认知》、《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思想谱系与行动逻辑》。

10月28日　日本卫材医药有限公司董事长冈田安史一行4人访问中心，就双方合作事宜进行交流。

10月29日　中心举行复旦大学——三菱商事国际交流奖学金捐助仪式，三菱商事（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塚润一郎、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陆颖丰、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远教授参加捐助仪式并致辞。

11月1日　徐静波专著《解读日本：古往今来的文明流脉》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1月7日　贺平、王广涛参加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大国竞争背景下亚太地区的新形势与新动向”研讨会，并分别作发言。

11月8–9日　胡令远、王广涛参加在南开大学举行的中华日本学会年会，胡令远作年会主旨报告，王广涛提交论文并在分科会发言。

11月16日　上海市日本学会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胡令远当选新任会长。

11月23日　徐静波参加由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举办的“新中国70年来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发表主题演讲《关于中日饮食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11月23–24日　中心召开第29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次学术研讨会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提供后援，主题为“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合作”。来中国、日本、韩国、英国以及新加坡等大学以及科研机构的学者30多人参加研讨会。

11月24日　中心举办系列讲座“中美战略竞争与日本外交的选择”，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驻上海前总领事小原雅博主讲。

11月24日　胡令远参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市公共关系研究院举办的“第六届东北亚和平与发展论坛”。

11月24日–26日　贺平赴日本东京参加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主办的第二届“新一代日本研究者协同研究研习班”。

11月29日　徐静波参加由上海师范大学举办的《东亚学术体系的构建与发展 第一届脱亚入欧与近现代日本知识的转型》研讨会，发表主旨演讲《岩仓具视海外视察团在日本近代国家转型中的意义》。

12月1日　胡令远参加上海日本研究交流学会举办的“第7届中日关系上海

研讨会”，作《平成时代的中日关系》基调报告。

12月7日　王广涛参加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多元视野下的俄罗斯”学术研讨会，并以《日本战略视野下的俄罗斯》为题进行发言。

12月7日　贺平参加复旦大学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复旦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全球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办的“首届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理论”研讨会，并作发言。

12月9日　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麦克·望月（Mike Mochizuki）访问中心并于中心以及相关学者进行座谈。

12月11日　贺平赴韩国参加庆熙大学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东亚合作的未来”，并作发言。

12月11日　中心举办复旦大学·三井物产高端讲座“我与日本文学四十年”，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前常务副校长谭晶华主讲。

12月12-18日　中心主办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四十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冈崎嘉平太与中日关系”展览。

12月14-16日　贺平赴日本参加复旦大学-庆应大学-延世大学三方教学国际治理研讨会。

12月20日　日本瑞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兼副行长手岛彻也一行3人访问中心，就双方合作事宜进行交流。

12月24日　中央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李廷江教授带领中央大学师生一行来访中心交流。

12月27日　庆应义塾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高桥伸夫教授一行来访中心，参观庆应义塾大学上海事务所，并与中心交流合作事宜。

（王广涛）